

中国青铜器 概览

熊也 编



巴蜀书社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26.3293
X632
0037520

中国青铜器 概览

熊也 编



考古所图书馆



Z0037520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青铜器概览/熊也著—成都:巴蜀书社,2000.8

ISBN 7—80659—101—X

I. 中... II. 熊... III. 青铜器(考古)—概况—中国 IV. K876.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7775 号

策划组稿:陈大利

责任编辑:罗 红

封面设计:文小牛

中国青铜器概览

熊 也 著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邮编 610012)

总编室电话(028)6656816

发行科电话(028)6662019

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福利东方彩印厂印刷

成都神仙树南郊村工业小区(028)5183822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

字数 110 千

2000 年 8 月第一版

2000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7—80659—101—X/K·6

定价:14.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2001.3.20

中国书店

No. 9866027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一个被割断历史的民族或阶级，它自由的选择和行动的权力，就不如一个始终得以把自己置于历史之中的民族或阶级。这就是为什么——这也是唯一的理由为什么——古代的所有艺术，已经成为一个政治问题。

我们再也听不到他们的歌声，欣赏不到他们的舞姿，以及他们关于狩猎生活的哑剧了。所有这些都随着个体的消亡而消亡了。只有一种艺术，它的生命力几乎可以和化石相等，那就是以物质材料为媒介的造型艺术。

——题 记





△ 司母戊铜鼎 商后期 高 133 厘米、口长 110 厘米、口宽 79 厘米、重 832.84 千克。1939 年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出土。此鼎是中国目前已发现的最重的古代青铜器。





✧ 匭侯铜盂 西周 高24厘米。辽宁省喀拉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出土。
“匭”就是燕字，燕国是周初分封的诸侯国。





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贵族孟的史实。
传陕西省眉县出土。此鼎内壁有铭文19行291字，记载周
大盂铜鼎 西周 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



淮夷、东夷之间的关系以及西周军制的重要资料。
出土。禹铜鼎腹内壁有207字铭文，是记录周王朝与南
禹铜鼎 西周 高54.0厘米。传陕西省岐山县





- △ **龙虎铜尊** 商代 高 50.5 厘米、口径 44.9 厘米。1957 年安徽省阜南县出土。此尊当属淮夷文化系统，是商时期青铜器中难得的珍品。





○ 曾仲游父铜壶 春秋 高 66 厘米。1966 年湖北省京山县出土。此器盖内与壶口内壁均有铭文 12 字，为曾仲游父作器。





四羊铜尊 商代 上口最大径 44.4 厘米、
高 58.6 厘米。1938 年湖南省宁乡市出土。





铜冰鉴 战国 长宽均76厘米,高63.2厘米。
1977年湖北省随县擂鼓墩1号墓出土。铜冰鉴整体为
方鉴内套方壶形式,壶内装酒,鉴内放冰块,可使酒凉。



目
录

1

题 记	(1)
引 言	(2)
一 楚庄王问鼎中原	(1)
二 风胡子讲述中国青铜器的起源	(10)
三 中国伟大而辉煌的青铜时代	(16)
四 青铜冶炼的曙光	(23)
五 炉火纯青的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	(28)
六 青铜器的发展阶段	(43)
七 林林总总、异彩纷呈的青铜器	(68)
八 星罗棋布、百花齐放的青铜文明	(80)
九 文物鉴赏(附精美图片)	(106)



一 楚庄王问鼎中原

1

春秋时期，“天子微，诸侯僭；大夫强，诸侯胁”，社会政治和阶级力量与西周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王朝衰微，礼崩乐坏，诸侯称霸。楚国是江、汉流域的一个蛮族国家。公元前 613 年，楚庄王继位，以孙叔敖为相，内修政事，外争霸权。楚国在楚庄王领导下国势日益强盛，积极向中原扩张，怀有夺取周朝王权的野心。公元前 606 年，楚庄王乘着北伐陆浑戎的机会，兵临周境，故意向周朝人询问“九鼎”的大小轻重，一个叫王孙满的周朝大臣回答说：“鼎之轻重，未可问也。”那么，为什么不能问鼎的大小轻重、对鼎的大小轻重讳莫如深呢？这是因为，楚庄王问鼎犯了政治的大忌。

我国古代著名的史书《左传》记载了这件事，鲁宣公三年（606），楚庄王出兵攻打陆浑之戎，乘机抵达洛水，在周王室统辖的境内陈兵示威。周定王让大臣王孙满去慰劳楚庄王，楚庄



王向他问起“九鼎”的大小轻重。王孙满意味深长地说：（取得政权）在德不在鼎。过去夏朝在推行德政的时候，九州都贡献青铜，铸造九鼎，并且把远方的各种物像都铸在鼎上。后来夏桀王昏乱失德，鼎转往商朝，总共经过 600 年。商纣王暴虐无道，鼎又迁到了周朝。人君如果有德，鼎再小也是重的；如果说君主无德行，鼎虽大，也是轻的。上天保佑有美德的人，有固定的命数，不是可以随便改动的。现在周朝虽然衰弱，但天命并没有改。因此关于“九鼎”的轻重，是不能问的。“九鼎”的来历，古史传说为“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禹贡金九牧，“铸鼎于荆山下，各象九州物”。可以看出，原来是为控制天下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财富，将各地的重要资源和财富制成图像，铸于鼎上，以此作为垄断财源、征收贡赋的依据，所以说是“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由于垄断了天下资源和财富，垄断者必然具有最高统治者的资格和权威，而铸有天下资源和财富图像的“九鼎”也就成为权力和财富的象征。传说夏禹所铸“九鼎”在夏代灭亡后传到商王手里，过了 600 年，商朝覆亡，“九鼎”又为周王室取得。古代文献说明，中原夏、商、周三代每一次王朝代兴，“九鼎”便随之易手，“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史书记载周武王伐纣，“乃命南宫百达史佚迁九鼎三巫”；春秋时代楚庄王“观兵周疆”，“问鼎之大小轻重”；而秦图霸业，也要首先“据九鼎，案图籍”。可见，“九鼎”的转移实质上是权力与财富的再分配所带来的政权转移。“九鼎”在古代成为中央政权的象征，谁占有了“九鼎”谁就握有全国最高的政治权力。它们的制作年代，不少书认为是在夏禹时期，但《墨子》则说夏后



启命蜚廉采金（铜）于山川，在昆吾（今河南濮阳）地方铸成了“九鼎”。夏后启是禹的儿子，夏朝的第二代王。不管是禹还是启的时候，总之按照传说，“九鼎”的铸造年代是在夏朝初年，大约公元前 21 世纪的时期。在先秦两汉为数众多的古文献里，涉及“九鼎”的材料十分丰富。所有史料都表明，夏、商、周三代王朝都把“九鼎”作为权力的最高象征，称之为“神鼎”、“宝鼎”，概莫例外。

在西周时期的社会中，有一套严密的礼制，每人的衣食住行婚丧祭等一切行动都有规定，用来维持政治上的等级制度。在这套繁杂的礼仪制度中，体现天子、诸侯、大夫等级地位最重要的是用鼎制度。

鼎本是一种三脚炊器，用来煮食物的生活用具。在原始社会中是陶制的，到青铜出现后就用青铜制造。古时由于生产力不发达，对大自然产生迷信，以为地面生长的食物以及猎获的野兽都是祖先神灵的赐予，待食物在鼎内煮熟就食之前都要向祖先神灵举行祭祀，既是谢恩，也是请求更多的赐予。久而久之，鼎就成了祭器而具有神圣的意义。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古代社会中，祭祀与战争是国家最大的两件事，于是作为祭器的鼎就成了象征政权的重器，所以鼎的得失往往作为政权更迭的同义语。在日常的生活中，用鼎的多寡，也就成了地位高低的标志。按照周代礼制的规定，天子用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士三鼎。死后也用这个数随葬，以供他们在冥冥世界中享用。所谓“钟鸣鼎食”就是奴隶主贵族奢侈享乐生活的象征。奴隶主贵族不仅生前的用鼎呈现出



严格的等级观念，而且死后随葬的鼎也呈现出等级的森严不可侵犯。我们从他们死后随葬品的多少就可以看出墓主的身份地位。在一个王室的墓葬——安阳第四个商王武丁的妇好墓——里面殉葬的物品的清单，到了令人惊愕的程度：

木椁和涂漆的木棺

16 个人殉

6 只犬殉

几乎 7000 个子安贝

200 多件青铜礼器

5 件大青铜铎和 16 件小青铜铃

44 件青铜器具(包括 27 件青铜刀)

4 个青铜镜

1 件青铜勺

130 多件青铜兵器

4 个青铜虎或虎头

20 余件其他青铜器

590 余件玉和似玉器

100 多件玉珠、玉环和其他玉饰

20 多件玛瑙珠

2 件水晶物品

70 多件石雕及其他石器

5 件骨器

20 余件骨簪

3 件象牙雕刻



5 件陶器及 3 件陶埙。

这些殉葬物品是由商国内外收集而来的原料，在安阳和其他地区无数的作坊里由无数的工匠制作而成的。在这些随葬品中最令人咋舌的就是那批青铜器，而其中又最为令人叹为观止的就是那青铜妇好偶方彝。

商、周考古中，发现中原王朝的确有形制众多的青铜鼎，并且形成了基本与礼书相符合的鼎、簋相配的用鼎制度，证实了九鼎是王朝的正统性的象征，它们表示着实际的政治权力。

从西周中期开始，随着社会和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宗法等级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调整，从而在使用铜礼器上逐步形成一套比较系统的制度。《仪礼·少牢馈食礼》有所谓“羊饍”、“豕饍”，据郑玄的解释，饍是煮肉的；这种“饍”可能是一种大鼎，那就是煮羊肉的鼎。《仪礼·有司彻》记载：“卒熟，乃升羊、豕、鱼三鼎。”那就是把煮熟的肉盛在另一种鼎内，然后摆列，用来宴享宾客或举行祭祀等。上述考古发现成奇数的鼎，往往又是形制、花纹、铭文彼此相似，而大小则不同，即其尺寸依次递减，陈列起来，形成规律的序列，有的学者称之为“列鼎而食”的“列鼎”。

当时的奴隶主贵族用列鼎的数目因其身份的高低而有多少的不同，从而形成了一套比较严格的用鼎制度。关于各级贵族用列鼎的数目，按其规定，大体说来，可以分为 5 等。(1) 一鼎。一鼎盛的肉食是豚，即是小猪，并且规定是最低一级贵族——“士”用的。(2) 三鼎。三鼎的情况比较复杂，所盛的肉食也不完全一样，有说是盛豚、鱼、腊；有说是盛豕、鱼、腊；有说盛的



是羊、豕、鱼，即所谓“少牢”。这是“士”一级人物在特定场合下用的。(3)五鼎。五鼎所盛的肉食大概是羊、豕、鱼、腊等5种，亦称“少牢”。《孟子·梁惠王》下：“前以士，后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后以五鼎。”可见“五鼎”是“大夫”一级用的。(4)七鼎。七鼎所盛的肉食为牛、羊、豕、鱼、腊、肠等7种，即所谓“大牢”，是“卿大夫”用的。(5)九鼎。九鼎所盛的肉食有牛、羊、豕、鱼、腊、肠、鲜鱼、鲜腊等9种，亦称“大牢”。九鼎是天子用的。但东周的国君设宴款待卿大夫时也用“九鼎”。

奴隶主贵族不仅生前的用鼎呈现出严格的等级观念，而且死后随葬的鼎也呈现出等级的森严不可侵犯。下面对几个等级的随鼎墓加以简述。

1. 九鼎墓

西周中期及其以后的王陵至今也还没有发现，周王的埋葬情况还不得而知。近年来在湖北京山宋河坝苏家垅发现过一批东西周之际的铜器，出自一座残墓，其主要礼器的组合是九鼎。据铭文和地望推断，应该是曾侯墓。曾国是一个小国，但曾侯也能用九鼎，说明其国君的地位。尤其是在M29中还发现有两个青石制的编磬；据专门的审音，定为相邻的2音阶，其总数当不只此2件。编磬在这时并不普遍，就是具有虢太子身份的七鼎墓，也才只有编钟，而还没有编磬。天子或者诸侯集群臣举行大射时，是悬挂编磬的。清代学者金鹗考证说：“诸侯惟有编磬，以石为之。”看来正好合于此墓的实际情况。总之，九鼎是当时最大的一类墓，从其埋葬的规格说明这些墓主人是



当时最大的贵族。

2. 七鼎墓和五鼎墓

经过正式发掘的七鼎墓，目前还只有河南三门峡市上村虢太子墓 1 座。此墓随葬七鼎，与其身份正好相合，可见他还不是虢国的第一号贵族。在虢国墓地中，未被盗的五鼎墓有 2 座。同虢太子墓一样，这两座墓也都是双棺一椁，惟其规模稍小。但都有车马坑，各殉 5 车 10 匹马，比虢太子墓的恰好少一半。随葬物仅次于虢太子墓，除无乐器钟以外，其他种类与前者基本相同，只是鼎、鬲各少 2 器，即鼎 5、鬲 4。从以上可以看出，七鼎墓和五鼎墓的墓室规模都比第一类墓要小，但都有椁室，且多数是双棺，几乎都有单独的车马坑，礼器的组合也基本相同。这些主要共同点，说明这些墓主人的身份是相近的，他们大概都是当时公卿大夫一类的中等贵族；这两种墓可以归并为一个等级。但是，在墓室规模以及礼器、车、马的数量方面，两者也还存在一定的差别，可见他们之间也还稍有高下之分。

3. 三鼎墓和一鼎墓

这一时期，三鼎墓发现也不多，总数还不到 10 座。陕西长安斗门镇普渡村有名的一座墓是目前发掘的西周中期唯一的 1 座三鼎墓。该墓的墓室已被部分地破坏，但大体结构也还清楚。椁外夯成台，椁下有腰坑，坑内埋狗 1 只。2 殉人放在墓室北端，随葬器物集中放在南端。铜器中除成套礼器外，还有 1 套编钟共 3 件。可见当时的三鼎墓也能随葬乐器。虢国墓地中，未被



盗掘的三鼎墓共3座。其中有两座的规模与五鼎相似,另1墓较小,都有车马器而无车马坑。陕西宝鸡福临堡也发现了1座三鼎铜器墓,墓室也不太大,但有车马坑。另外还有1座仿铜陶器三鼎墓,规模更小。此2墓所出铜器或陶器显然具有秦器风格,再结合地望来考察,可以定此2墓为东周初期的秦墓。以上几座三鼎墓中,其主要铜礼器的组合,与五鼎墓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是鼎的数量相应的减少。说明这些墓主人也是贵族身份。不过,三鼎墓除秦墓外,都没有单独的车马坑,而只有车马器,且多半是单棺,不是双棺,这又是与五鼎墓所不同的。这些区别也正说明,他们的地位应该是在中等贵族之下的,大概相当于“士”之类的末流贵族身份。

现已发现的一鼎墓,约为三鼎墓的两倍还多,总共有20多座。属于西周中期的一鼎墓共5座,分布在甘肃、陕西、河南和北京几处。墓室面积都在10平方米左右,一般都是单棺,共同常见的铜礼器为鼎1。虢国墓地中,未经盗掘的一鼎墓共19座。墓室规模彼此相差比较悬殊,但都有椁,单棺或双棺。几乎都不随葬铜兵器,而常见的为石戈,也有骨戈。只有极个别的墓随葬车马器,都没有车马坑,可见死者生前一般都不具车马。也有奴隶一旁侍候,而随葬盘等礼器也正表明其贵族身份。

4. 不随墓鼎的小墓发现最多,据不完全统计,总数约有300余座,大体相当于随葬铜鼎墓的5倍左右。宝鸡斗鸡台的11座西周中期墓中,都没有椁,不随葬铜容器,而随葬陶器。其中有6墓随葬铜兵器,说明这些墓主人是士兵身份。长安沣西张家坡和客省庄的大批西周中、晚期小墓中,墓室面积多数在



5 平方米以下。主要随葬品是陶器,都不随葬铜礼器,也没有兵器和车马器,而有为数不多的贝和玉、蚌饰品。看来,这类墓主人决不会是贵族,大概属于平民墓。

以上四类墓葬中,最主要的区别在于随葬铜礼乐器与否及其多少。以随葬铜鼎的情况为标准,可以把西周中期至东周初期的墓葬分成大约 4 个不同的等级。这种丧葬制度的固定化,显然正是当时社会等级关系进一步制度化的反映。



二 风胡子讲述中国青铜器的起源

10

中国古籍《越绝书》里记载道，春秋战国之际，楚王铸造了几柄珍贵的铁剑。当时，大臣风胡子对楚王讲了一番自古以来兵器械和工具发展的历史。风胡子说，在遥远的轩辕氏、神农氏、赫胥氏时代，是“以石为兵”，用来砍伐树木，建造宫室；黄帝时期，是“以玉（可以理解为石器）为兵”，用来伐木，凿地建房；夏禹时期，是“以铜为兵”，决江导河，兴修水利；到春秋战国之际，方才铸“铁兵”，威服三军。风胡子描述的由石器进化为铜器再进化为铁器的历史进程，和历史文献记载是相符的。

据历史记载，人们在选择陶土烧制陶器的过程中，偶尔发现了铜矿石或孔雀石经过高温而变成铜块。中国在什么时候人们开始理解自然铜块，人们在远古时代制造铜器的情况究竟如何，考古发掘所提供的材料是极有限的。但是，可以肯定，中国的铜



器,夏代以前就出现了。早在四十年代偶有发现。解放后,经考古发掘,夏以前铜器的发现日益增多。

日前发现的我国最早的铜器,是1973年11月在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出土的一件残铜片,系出自29号房址的居住面上。经化验,含铜65%、锌25%,并有少量锡、铅、硫、铁等,证明是黄铜,距今6000多年。

1977年~1978年,在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发现一件完整的铜刀和铜器碎块(因氧化太甚已辨认不出器形),属马家窑类型的遗物。经化验铜刀是青铜器制品。据碳十四测定,铜刀的年代范围在公元3280年~2740年之间,按最晚的一个年代数据计算,距今也有4690年了,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一件青铜刀。

甘肃广河齐家坪出土有釜铜斧1件、铜镜1件。经化验,铜斧属红铜,铜镜属青铜。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约同时的齐家文化,发现了品种较多的铜器,其中有各种形式的铜刀、铜锥、铜凿、铜匕、铜指环,以及透孔片状装饰品等。这些铜器的制造,有的是经过冶炼用范铸造,有的是采用冷锻法制成,然后把铜器的表面磨光,将刃口磨治锋利。出土的这些铜器有的经过化验,含铜量为99%以上,铅锡含量不到1%。这些创造性的新工艺在中国金属史上是有特殊价值的。

如果从陕西临潼姜寨出土的黄铜片算起,距夏代约2000多年;如果从甘肃东乡林家出土的青铜刀算起,距夏代也有700年~1000年左右。可见,在夏代以前,中国制铜技术的发展已有1000年~2000年的历史了。这说明,夏代进入青铜时代并不是



偶然的,它是早期铜器经过长期发展以后才得以形成的。它是在继承多少年积累下来的生产技术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和发展起来的。

中国在经历了“石器时代”之后进入了“金石并用”时代。古代所讲的“金”,是指铜而言,“金石并用”就是“铜石并用”。关于“铜石并用”时代之“铜”,以前一般认为是指红铜。世界上许多地区的古代文化实例证明,在新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叫做铜石并用时代。这时期所使用的铜是红铜,所以又叫做红铜时代。红铜是指未经人工掺杂的自然铜,即纯铜,红褐色,质较软,不适于制作大型器具,只能作小工具和装饰品之类。因此,红铜器在生产中所起的作用并不太大。就中国历史而言,它应当泛指当时出现的铜器,其中既有红铜也有青铜,甚至包括有少数黄铜。原始社会被称为“石器时代”,中国的奴隶社会被称为“青铜时代”。考古学资料证明,铜器是在母系氏族社会发展到兴盛时期出现的。整个“金石并用”时代的前期处于母系氏族社会阶段,后期处于父系氏族社会阶段。所以“金石并用”这个名称的含义,是从母系氏族社会中后期起,包括整个父系氏族社会在内的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至于它的主要发展阶段,应该在父系氏族社会时期,也就是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时期。夏、商、周时期,在物质文化方面的一个突出的进步,就是先后开始使用两种金属器具——青铜器和铁器。夏、商、周(主要指西周)应该是青铜时代,而春秋晚期则已进入早期铁器时代了。

我国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齐家文化遗址中,曾发现了一批红



铜器，有刀、锥、凿、环等，从而证明齐家文化已进入红铜时代了。关于齐家文化的绝对年代，大体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代，或稍早于夏代。可是中原地区，属于夏代年代范围的二里头文化则已进入青铜时代了，因此中原地区的红铜时代应该在二里头文化以前的龙山文化时期，或者更早。

青铜是红铜加锡的合金，铜锈呈青绿色，因以得名。青铜比红铜有显著的优点：第一、熔点低；第二、硬度大；第三、青铜铸件不易出沙眼。青铜有这些优点，所以青铜器的出现，很自然地代替了红铜器。虽然还不能完全排挤掉石器，但对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无疑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在我国，青铜铸造业正在高度发展的同时，铁器就开始出现了。人类最早使用的铁器大都是用陨铁打制成器。铁在生产中产生巨大的作用，是在铁矿石冶炼技术发明后。我国最迟在春秋晚期已经发明了冶铁术，同时在农业、手工业等生产领域中开始使用铁器。但是铁器使用的进一步推广，却到了战国中期。

青铜时代第一阶段：初期奴隶社会——约相当于夏代（约公元前 21 世纪至公元前 16 世纪）

本阶段是我国历史上从氏族制社会过渡到奴隶制社会的时期。本阶段开始使用了青铜器工具，并有了专门的青铜武器。铜礼器开始出现。

第二阶段：中期奴隶社会前段——商代前期（约公元前 16 世纪至公元前 13 世纪）

本阶段青铜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后期开始使用陨铁、青铜合制的复合武器。手工业与农业分工的扩大，手工业内部也



有了分工,手工业作坊有了一定的布局。成套的礼器和多种的专门青铜武器大量出现。

第三阶段:中期奴隶社会后段——商代后期至西周早期(约公元前 13 世纪至公元前 10 世纪中叶)

本阶段是奴隶社会发展到鼎盛的时期。青铜器的制作达到了高峰,但铁器的制作并没有明显的进步。手工业的内部分工与协作已发展到新的阶段。

第四阶段:晚期奴隶社会前段——西周中晚期至春秋初期(公元前 10 世纪中叶至公元前 7 世纪中叶)

本阶段是奴隶社会开始走下坡路的时期。青铜器的制作已经呈现衰歇的现象,铁器的材料还有待发现。

第五阶段:晚期奴隶社会后段——春秋中晚期(公元前 7 世纪中叶至公元前 5 世纪中叶)

本阶段是奴隶制走向瓦解、封建制开始兴起的时期。冶铁术已经发明,铁器工具开始代替青铜工具。

听风胡子讲青铜器起源的楚王之所以对青铜器感兴趣,一方面是因为青铜器是王权的象征,另一方面楚国的青铜器制造业也非常发达。楚国是南方一个大国。从考古发掘的材料可以看到,楚国类型的文化以湖北省江汉平原为中心,北到河南南部,东到安徽中部,南达湖南的资兴、郴县。国都初在丹阳(今河南淅川县)。楚文王元年(前 689)迁都到郢(今湖北江陵县纪南城)。楚国有比较发达的采矿业。楚国铜质优良,是制造兵器的好材料,因而不许外流。鲁僖公十八年(前 642)郑文公到楚国,楚成王高兴之下送给他一些铜,后又反悔,于是与郑文公相约:



不准用这些铜造兵器,郑国只好用它铸造乐器。

在青铜铸造技术上,楚国当时更是处在领先的地位。现在出土的楚国青铜器,造型优美,花纹精致细腻、流畅而生动,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在河南省淅川下寺发掘的春秋中期的楚墓葬群中,共出土青铜器 700 余件,使用了浑铸、分铸及浑铸与分铸相结合的多种铸造方法。在 1 件铜禁和 2 件铜盨上还发现采用了失蜡铸造法,这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采用这一方法。在这批青铜器中还使用了铆钉冷焊技术和花纹上用漆、红铜、松绿石镶嵌技术,这些工艺都是当时最先进的。



三 中国伟大而辉煌的青铜时代

16

日出日落，斗转星移，沧海桑田，经过漫长的地质年代，人类跨进了文明的门槛。人类文明的开端，主要是在世界大江河流域发生的。中华民族的祖先，在黄河以及长江流域首先开创了辉煌的文明，源远流长，给人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文物遗迹。制作精美、种类繁多的青铜器，便是中国文物宝藏中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当你步入博物馆，凝视着一件件古色斑斓的青铜器时，可曾想到，这些精美绝伦的器物是中国古代能工巧匠的智慧结晶？中国古代青铜器不仅是驰名世界的美术品，而且在考古学、历史学以及科学技术史的研究上，都具有很重要的价值。中国青铜时代的青铜器可以从好几个不同的角度来研究和欣赏。由于其固有的了不起的品质，完全可以而且也应该当作精湛的技术和美术品来加以欣赏。中国青铜器所表现的中国文明是瑰丽多彩、博大精深的。



“青铜时代”这个名词是指公元前 2000 年到公元前 500 年这段时期，这一段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有人称之为奴隶社会，有人称之为中国文明的形成期。青铜器可作为文化与社会界说的标准。“青铜时代”这个词是舶来品。在西方，“青铜时代”这个名词最初是丹麦国家博物馆保管员克·吉·汤姆森（Christian Jurgensen Thomsen, 1788 ~ 1865）最早创用的。照汤姆森所著《北方古物指南》（Ledetraad Nordisk Oldkyndighed, 哥本哈根, 1836 年）中的定义，“青铜时代”乃是“以红铜或青铜制成武器或切割器具”的时代。中国青铜时代的最大的特征，在于青铜的使用是与祭祀和战争分离不开的。换言之，青铜便是政治的权力。如果在欧洲青铜时代的构想上，这种新的金属以其作为“兵器和切割器具”为准，则在古人的心目中只有兵器有特别地位。东周的风胡子和拉丁诗人鲁克里宙斯（Lucretius）都讲到历代用来作兵器的各种不同原料。古人大概知道这种新的金属的采用在兵器上要比在其他器物有更大的影响。在青铜时代的中国，所有的已知的主要兵器都有青铜制造的锋刃：青铜镞、矛、戈头、钺、大刀、剑和匕首。弓箭和戈矛等长兵器主要是与马拖的战车一起使用的，而剑和匕首则到了周代后期战士骑马之后才广为使用。大部分的兵器是诸侯战争中所使用的，但有少数如钺和大刀，则主要是砍头用的，有人认为中国古代的“王”字便是一个青铜钺的象形字，作为“内行刀锯，外用甲兵”的国王的象征。另一方面，既然人的劳动是农业生产的基础，而青铜的兵器一方面在新鲜的生产劳动力的获取上能起一定的作用，一方面又能保证既有劳动力的持续剥削，青铜



也可以说是在生产技术上的一次突破。青铜的另外的一个主要用途,即用在祭器上。青铜器用来象征一个王朝对国家的统治,照传说是始于夏朝。周朝大臣王孙满说:

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魑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皆乱,虽大轻也。

我们无法知道这种代表朝代正统的象征是不是可以在现有的三代铜鼎里面找得到,但每一件青铜器——不论是鼎还是其他器物——都是贵族地位的象征性的徽章与道具。青铜礼器与兵器是被国王送到他自己的领地,建立他自己的城邑与政治领域的象征性的礼物的一部分。说到底,青铜器是只与地位高贵的人有关的。青铜器本身是古代中国文明的突出特征。

“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就出土了青铜礼器和兵器。商代中期与晚期的文化显示出商代文明是中国青铜时代文明的一个辉煌时期。约600年之后,商朝则又被自西部来的周人所征服。在周代,青铜一直是礼器和兵器的原料,但东周开始以后不久便出现了铁制工具和器具。在整个中国青铜时代,金属始终不是制造生产工具的主要原料;这时生产工具仍旧是石、木、角、骨等原料制造。可是一旦铁出现以后,马上大规模地用于生产工具的制造。因为生铁是适合于大量制造的比较便宜的金属,它很快便对中国文化与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铁器时代的开始也就是中国青铜时代的终结。中国青铜时代便是历史上的



夏商周三代,从公元前 2000 年以前,一直持续到公元前 500 年以后。三个朝代都以拥有共同的青铜文明为特征。

由黄帝以来,经过尧舜禹的“禅让”到夏代“传子不传贤”,中国古代历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早期奴隶制逐渐形成和确立起来。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以“礼”为旗号,以祖先祭祀为核心,具有浓厚宗教性质的巫卜文化登台了。与物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相适应,出现了最初的一批思想家,他们就是巫师,是原始社会的精神领袖。他们在宗教衣装下,为奴隶主阶级的利益出谋划策,通过神秘诡异的巫术——宗教形式来提出“理想”,预卜未来,编造关于自身的幻想,把阶级的统治说成是上天的旨意。尽管青铜器的铸造者是奴隶,但它们毕竟主要是体现了早期奴隶制社会的统治者的威严、力量和意志。以饕餮为代表的青铜器纹饰具有肯定自身、保护社会、“协上下”、“承天休”的吉祥意韵。那么,饕餮是什么呢?这迄今尚无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是兽面纹。究竟是什么兽?可能是牛、羊、虎、鹿、山魈……。它实际是原始祭祀礼仪的符号标记。荒谬的、大规模残忍的屠杀,与“理想化”了的原始宗教崇拜相结合,其本质力量的表现也就表现为凝聚在青铜器上的那种森严、可怖、神秘、庄严交织在一起的造型艺术图案和纹饰特征的历史社会根源。它的制作者尽管是奴隶,但它所体现的都是奴隶主的威严和意志,以及当时那个社会的时代精神。随着奴隶制的统治的加强,这种令人望而生畏的艺术造型的威吓性、神秘性和恐怖性,就愈来愈得到了集中的表现。殷代后期和西周前期的青铜器,植物纹样是少见的。动物纹样,如象、龟、鱼、鸟、蝉、龙、



饕餮、夔等的纹样较普遍,反映了原始社会图腾崇拜的残余,但在这些动物纹样中占主宰地位的却是饕餮纹、夔龙纹和云雷纹。铸造鼎的最终目的,是要发挥和达到一定的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功用,这就是为了体现上天意志,协调天人,其作用无疑是神圣的。

殷周的青铜艺术,普遍地是以饕餮纹饰(以及夔龙等纹饰)为主要的装饰图案的。饕餮在传说中是“食人”的猛兽。以凶猛的饕餮作为祭器的铜鼎的纹饰。此纹饰对于这一神秘而又恐怖的时代是最有特色的象征,它是殷代社会君权神权合一的象征。为了突出这种恐怖性和神秘性,饕餮纹的形象塑造,非常重视最能传达情感、精神的面部造型艺术表现。在面部中,他们又非常重视和突出最能传达精神、情感的主要官能——口、目等来表现的。饕餮纹本是杂合虫、鱼、鸟、兽等“百物”的形象特征组成的,并且常以抽象和变形的手法表现的,但对于口、目之类的刻划,总是写实的,在写实中又包含着夸张,两眼比例扩大,球状的眼球高高突起,虎视眈眈,以加强形象的森严和恐怖感;多半缺省下唇的咀,同样在面部占有很大的比例,有的还突出长长的排列的獠牙,以加强其凶猛和恐怖的力量。特定的社会内容和特定的艺术形式,达到了这样完美融合,使整体造型洋溢着凶残而又恐怖的时代意识。最典型的,例如著名的人面铜钺,就是这种时代的审美意识的集中的表现。在人面纹方鼎、兽纹鼎,以至怪异鸱枭的形象中,都给人以突出的这样的感受。它是美的,又是恐怖的。由于此时的人类毕竟尚处在自身发展阶段的童年时期,因此,它尽管怎样森严、恐怖,却不可避免地带



有某种可爱的稚气。这一典型的具有强烈时代色彩的艺术风格，一直持续到了西周中期。因此，在西周中期，我们还可以看到典型的商周青铜工艺的特征。例如西周前期的“伯矩”鬲，主体部分是一个完整的兽面形象，又目睁得虎圆，两侧夸张地立着大耳，兽角突出，后面的两只鬲足作走动状，似乎向你扑来，给人以强烈的森严和恐怖感。为了加强这一艺术造型对人的心理效应，不仅整个造型浑然一体，虎虎有生气，甚至连鬲盖部分也用鲜明的牛首形象装饰起来，更加给人一种威严和恐吓的感觉。这件艺术品造型、工艺都是精美的，但它所要首先体现的，却是这种原始宗教的庄严、神秘和恐怖感。以举世闻名、标志着我国古代青铜工艺高峰的司母戊大方鼎来说，它重达 875 公斤，通耳高 133 厘米，横长 110 厘米，宽 78 厘米。铸造这样庞大的方鼎，不仅在技艺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而且它比例适度，棱角突出。鼎身四角精心地由两面合成一个兽形纹，周围以回纹来衬托几何化的作为主体的夔龙纹，加强整体的肃穆感；左右耳外侧上部，铸有两只张口的虎头，口中正吞噬着一个人头。整个造型气势雄浑，刚毅大方。它的第一目的，固然主要是作为奴隶制威严统治的精神象征，但为了体现这种君权、神权的精神象征，这里调动了多么丰富的艺术想象手段！你看那些著名的商鼎和周初鼎，你看那著名的人面大钺，你看那满身布满了的雷纹、夔龙夔凤，你看那各种变形的、幻想的、可怖的动物形象，你看那可怖的人面鼎，它们呈现的是一种神秘的威力和狞厉的美。杀掉甚或吃掉非本民族、部落的敌人是原始战争以来的史实，杀俘以祭本民族的图腾和祖先，更是当时的常礼。因



之,吃人的饕餮倒恰好可作为这个时代的绝妙象征。《吕氏春秋·先识览》说:“周鼎着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食人”一词恰如其分地表达出了凶怪恐怖的饕餮形象的意义。它对异氏族、部落是威惧恐吓的符号,对本氏族、部落则又具有保护的神力。在今天看来是如此野蛮,在当时则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在那看来狰狞可畏的神秘中,积淀着一股深沉的历史力量。它的神秘恐怖正是与这种无可阻挡的巨大历史力量相结合,才成为美——崇高的。当时社会必须通过这种种血与火的凶残、野蛮、恐怖、威力来开辟自己的道路而向前跨进。这个动辄杀戮千百俘虏、奴隶的历史年代早成过去,但代表、体现这个时代精神的青铜艺术至今为我们所欣赏、赞叹不绝。



四 青铜冶炼的曙光

中国手工业生产的历史很久了，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代。它是伴随着石器的出现而出现的。此后，经过了长期缓慢的发展历程。长足的发展要到在原始社会的后期。原始社会后期，手工业生产部门增多，分工细密，生产技术也有很大提高。我国的青铜器是伴随着奴隶社会的发生、发展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它也跟着奴隶社会的灭亡而逐渐衰落下去。因此，通常把我国的奴隶时代称为“青铜时代”。

金属的出现是比较晚的，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才出现的。人们在选择陶土烧制陶器的过程中，偶尔发现了铜矿石或孔雀石经过高温而变成铜块。或许在山林着火后出现了这种情况。中国在什么时候人们开始理解自然铜块，现在没有一点资料可以说明。究竟人们在远古时代制造铜器的情况如何，考古发掘所提供的材料也是极有限的。据说陕西临潼姜寨仰



韶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一个铜片,为铜锌合金。如果这一发现确凿无误,那么我们中国的铜器制造史即可上溯到 6000 年以前了。山东大汶口晚期的一座墓中,曾发现一件带有孔雀石绿色的骨凿,经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化验,含铜量为 99%,证明为铜质染污。这座墓没有被后代所扰动,因此这一现象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它告诉我们大汶口文化晚期可能已经有了铜器。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约同时的齐家文化,发现了品种较多的铜器,其中有各种形式的铜刀、铜锥、铜凿、铜匕、铜指环,以及透孔片状装饰品等。这些铜器的制造,有的是经过冶炼用范铸造,有的是采用冷锻法制成,然后把铜器的表面磨光,将刃口磨治锋利。出土的这些铜器有的经过化验,含铜量为 99% 以上,铅锡含量不到 1%。上述这些发现中创造性的新工艺,在中国金属史上是有特殊价值的。

“二里头文化”属于奴隶社会的考古学文化。在“二里头文化”的两个类型——无论“东下冯类型”或者“二里头类型”中,都发现了青铜器,显示出当时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

发现的“东下冯类型”的铜器有铜镞、铜凿等小件铜兵器和工具,总的数量和种类都不多。而“二里头类型”的铜器远比“东下冯类型”多,主要出自偃师二里头遗址。铜器种类有铜爵、铜钺、铜戈、铜镞、铜刀、铜鱼钩、铜椎、铜凿、铜铤、铜铃、铜条、圆形铜器、镶嵌圆铜器以及铜渣、陶范和坩埚片等。这些铜器的出土,确凿地证明了“二里头文化”的时代属于“青铜时代”。能够代表当时技术水平的器物,主要是铜爵。目前发现的几个铜爵,最大的通高 22.5 厘米,一般的通高 12 厘米~13 厘米左



右,这几件铜爵,是在“二里头文化”中发现的最大的铜器。经电子探针定量分析,其中的一件铜爵的含铜量为92%,含锡量为7%,证明是青铜。出土的铜爵都是属于“二里头文化”晚期的,在此以前应当有一段发展过程。铜爵的制造,在技术上还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原始性,例如:表面粗糙,无纹饰、无铭文,具有明显的早期铜器的特点。在出土的铜器中,有一部分是武器,如:铜戈、铜钺、铜镞、铜戚等。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青铜武器。

相传,夏启曾派人“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昆吾在今河南濮阳,是当时东方依附于夏王朝的一个小国。昆吾人擅长于手工业技术,相传启曾派人在此铸鼎。战国以来,又出现夏铸“九鼎”的传说。所谓“九鼎”,应指鼎的数量很多,未必是实数为“九”,也不似后世传说得那样神秘。目前在考古发掘中,只发现了陶鼎,尚未发现当时的铜鼎,但从生产力发展水平看,夏代有“铜鼎”,这是可能的。夏代,铜器已用于制造生产工具,除铜镞、铜鱼钩外,还发现有铜锥、铜凿、铜铤等。这些都是狩猎、捕鱼和手工工具。

夏代的手工业生产,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制造铜器在夏代的手工业生产中是个比较重要的经济部门。制铜技术,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出现了,但数量不多,而且产品多为铜刀、铜环、铜匕、铜锥等小件器物。这些多数属于红铜,青铜很少。夏代显然比以前有很大发展。在器物方面,有铜爵、铜铤、铜凿、铜锥、铜刀、铜镞、铜鱼钩和带有镶嵌的圆形铜器等。从铜器的制作工艺分析,当时的制铜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例如:



已发现的制作精美的圆形铜器，周围共镶嵌 61 块方形绿松石。这不仅反映当时有熟练的铸造技术，也反映当时有熟练的镶嵌技术。在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铜爵中，还有 1 件通高 13.3 厘米，流长约 5 厘米，含铜 92%，锡 7%。这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容器。这个铜爵的制作技术比较复杂，是采用多合范铸成的。根据铸痕来看，至少是用 4 块范铸成的。这些器物，已是青铜了。由红铜发展到青铜，在铜器制造方面是个很大进步。

铜戈为古代常用的武器，在二里头遗址中也有发现。已发现的戈，制造工整，戈刃也比较锋利，这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武器。文献中所提到的夏代“以铜为兵”的说法，也得到了实物证明。

先商时期的社会生产以农业为主，畜牧经济已降到了次要地位。这时的手工业生产除制造石器、骨器、蚌器、陶器外，还制造铜器。如在邯郸涧沟发现了小型铜刀，在下七坦遗址发现铜镞。虽然数量不多，又都是小型器物，但表明当时已经开始使用青铜了。

商的势力范围，西至今陕西西部，东至今山东西部，北至今河北北部，南至汉水以南的长江流域。至于商的文化对各地的影响，远远超过了这个范围。目前已发现的商代农业工具，石器最多，蚌器、骨器次之，青铜器最少。工具的种类，有以下几种：

石器：石斧、石镰、石刀、石铲、石镞。

蚌器：蚌刀、蚌镰、蚌铲。

骨器：骨铲。

青铜器：铜铲、铜斧等。



1976年在殷墟妇好墓中发现了大量青铜器，属于生产工具的共有41件，器形有铤、凿、刀、铲等。其中青铜铲7件，应属于农业工具。除此以外还有一些零星发现。商代已经普遍使用了青铜农具，只能说当时已用青铜制造农具，在生产上也已使用青铜农具了。而且由于数量太少，在农业生产中，它也起不了主要作用。

生产工具的改变，是个长期缓慢的过程。能够以较大的幅度提高生产力水平，从而取代木、石器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只有金属工具。而金属工具占据历史舞台，在中国，是经历了相当长的过程。最早出现的是青铜器，这本是贵重器物，即使在其最兴盛的时期，它的主要作用也是为奴隶主贵族的生活享受所需要的礼器、乐器、兵器和各种酒食器，生产工具极少。不仅如此，青铜本身质软，硬度不够，在生产中也起不了主要作用，因而它的发展也不足以引起社会的根本变化。青铜可以制造有用的工具和武器，但并不能排挤掉石器；这一点只有铁方能做到。只有铁器出现以后，才真正代替了木、石器。



五 炉火纯青的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

28

在早期的文明国度和地区，中国使用铜、铁等金属的年代相对说来是较晚的。埃及大约在公元前 5000 年时开始进入青铜时代，公元前 1000 年左右开始进入铁器时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大约在公元前 7000 年时开始利用自然铜，公元前 4000 年时开始进入青铜时代，公元前 1200 年左右开始进入铁器时代；爱琴海地区大约在公元前 3300 年时开始进入青铜时代，公元前 1000 年左右开始进入铁器时代；印度大约在公元前 2500 年时开始进入青铜时代，公元前 800 年左右开始进入铁器时代；而中国是在公元前 1500 年左右开始进入青铜时代，公元前 500



年左右开始进入铁器时代的。但是,由于中国在冶铸技术方面的发明和创新,使中国的冶金业很快就后来居上,跃升于世界的前列,并为中国古代文明的高度发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中国冶金史上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铸造技术占有重要的地位,以至于铸造既作为成形工艺而存在,又成为冶炼工序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达到了“冶”与“铸”密不可分的地步。因此在古代文献往往是冶铸并称,并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常用词汇“模范”、“范围”、“陶冶”、“就范”等,都是由冶铸技术衍生而来的。这种冶与铸密不可分的冶金传统,是古代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所无法比拟的。

从重 875 公斤的司母戊方鼎、精美的曾侯乙尊盘和大型的随县编钟群,以至大量的礼器、日用器、车马器、兵器、生产工具等,可以看到当时中国已经非常熟练地掌握了综合利用浑铸、分铸、失蜡法、锡焊、铜焊的铸造技术,在冶铸工艺技术上已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而《考工记》中所记载的:“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是世界上最早的合金配比的经验性科学总结,表明当时中国已认识到合金成分与青铜的性能和用途之间的关系,并已定量地控制铜锡的配比,以得到性能各异、适于不同用途的青铜合金。《考工记》中还记载有:“凡铸金之状,金与锡,黑浊之气竭,黄白次之;黄白之气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气竭,青气



次之,然后可铸也。”说明当时已掌握了根据火焰的颜色来判定青铜是否冶炼至清纯程度的知识,这是后世化学中火焰鉴别法的滥觞。用以比喻工夫达到纯熟完美境界的成语“炉火纯青”,就是由此引申出来的。

铜锡合金的青铜,使用价值远胜于红铜。这种合金究竟是怎样发明出来的呢?是谁发明出来的呢?至今还是一个谜。尽管如此,但我们可以从殷周发掘的遗迹遗物中,把当时人的炼砂、制范、熔铸等等程序以及青铜成品的遗存,描绘出一个大概情况来。商代手工业中最重要的部门是青铜铸造业。青铜是红铜和锡的合金,因颜色青灰,故名青铜。青铜铸造业能生产先进的武器来装备军队,能生产各种礼器、生活用器和装饰品来满足奴隶主豪华生活的需要,又能生产各种工具来武装其他手工业。所以,商代的青铜铸造业的发展在各手工业部门中一直处于领先的地位。在殷墟发现了很多铸铜遗址,如铁路苗圃北地发现的一个铸铜作坊遗址,规模相当大,面积至少在10000平方米以上。就已发掘的情形来看,这个遗址包括有不少房基,里面堆着许多铸铜陶范。在房基的附近也发现有大量的陶范碎片,同时还发现炼铜坩埚的残片。陶范包括外范、内范和陶模,由此可见商代的青铜器是用模型范铸出来的。一般都经过制模、翻范、合范浇铸等三大工序。各种器形又由若干块外范合成,例如爵就由16块外范合成。外范的繁复结构,说明商代的青铜铸造工艺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殷墟出土的商代炼铜的坩埚,是用草拌泥的泥条盘筑而成的,大口尖底,口径22.6厘米,能盛铜液12.7公斤。出土的还有容量较大的坩埚,直径为



83 厘米,基本上可以适应铸造大型铜器的需要。所以商代的青铜手工业,铸造的已经不只是小刀、小钻之类,更多更大的青铜器也都能够铸造出来了。殷墟出土的文物还表明商代青铜器的种类很多,差不多有二三十种。其中有生产工具铤、锯、凿、铲等;兵器戈、矛、刀、镞等;烹煮器鼎、鬲、甗等;酒器爵、觚、尊、壶等;储盛器簋、盘、孟等;乐器有铙,还有各种车马器、装饰器以及随葬品等。出土的商代青铜器不但种类繁多,而且产量更达到惊人的程度,现已出土的已达数千件,而兵器、车马器等则更是数以万计。镞即箭头,这种兵器、车马器等则更是数以万计。镞即箭头,这种兵器在战争中消耗量很大,射出后又不能收回,没有高度发展的青铜铸造业是供应不上的。欧洲在青铜器时代,大部分箭头仍是用骨或石制成的,很少发现青铜镞,而在殷墟却出土了大量青铜镞。这也证明,商代青铜手工业的产量是很大的。殷墟出土文物还证明,商代青铜器的质量也很高。铸铜器用红铜太软,加锡可以增加硬度;但锡的成分超过一定分量,又会太脆,铜和锡的比例必须适当。分析商代青铜器成分的结果表明,当时奴隶们在铸造青铜器时,已能根据器物的需要而增减铜锡比例,以铸造出不同要求的器物。商代铜器中,不但有圆形器、方形器,而且还有鸟兽形器。器物内部的气泡绝少,外表花纹清晰精致。在武官村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通耳高 133 厘米,横长 110 厘米,宽 78 厘米,重量达到 875 公斤,形制非常雄伟,是目前我国出土的青铜器中最大的一件,也是世界青铜器中所仅见的。当时熔铜的坩埚,一般只能盛铜液 12.7 公斤,因此,要铸造司母大方鼎这样巨型的青铜器,就必须用 70 个左



右的坩埚同时浇铸。每个坩埚由三四个人操作,则需要 250 人左右。即使是使用较大的坩埚,至少也需要六七十人之多。如果把制模、制范、运输等有关的人工也包括在内,那么所需要的人力就更多了。人多、物多、地方大,就不能杂乱无序,互相妨碍,而必须有组织、有布置、有条不紊,才能铸成大器。由此可见商代不仅有了高度的青铜制作技巧,而且能够大规模的从事劳动协作。商代高度发展的青铜文化,正是大量奴隶集体劳动和各工种之间周密协作所创造出来的伟大成果。商代的青铜铸造业虽然有了高度的发展,但使用青铜器的多是奴隶主贵族,奴隶和平民使用的大都是陶器。在殷墟的大司空村、薛家庄、高楼庄、小屯村等地,发现过制造陶器的工具,烧制陶器的陶窑遗址,以及大量陶坯碎片。分析出土陶片的化学组成和物理性质,发现当时所采用的陶器原料是经过选择的,在制作炊器的陶土原料中,配进了一定数量的砂粒,以调节陶土的成形性能和成品的耐热急变性能。作为现代陶瓷工业主要设备的陶车和窑,当时已经发明使用。陶车用以轮制陶器,修饰口沿与器壁。陶窑的烧成温度已经接近摄氏 1200 度。可见商代的制陶工业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的水平。商代艺术,达到了很高的成就。由于铸造铜器必须先雕刻模范,所以商代的雕刻艺术极为发达,成为晚商艺术的突出特色。就种类而言,有平面的浮雕或浅刻,有半立体的动物雕像,还有立体的雕像等等。冶铸青铜的过程是比较复杂的,一般来说,可分为冶和铸两大步骤。当时炼铜大概是把选好的矿砂放在炼炉内,爓以木炭,然后生火,也可能经过鼓风,铜即被还原为液体而流出,弃去炼渣,即得初铜。初铜是



比较粗的,再经提炼才能获得纯净的红铜。红铜加锡熔成合金,即是青铜。青铜合金中,铜和锡的成分,则依器物的用途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比例,通常是锐利的工具和武器加锡较多,而一般器皿则加锡较少。曾经用化学分析的沉淀法分析过 1 件铜尊,其结果是:铜 91.29%、锡 7.10%、铅 1.12%。含锡偏低,是早期青铜器应有的现象。

1. 古代采矿实况和技术水平

考古学可以为我们再现出由于时间久远而被淹没了的历史真实场面。现在湖北省大冶县的铜绿山,发现了一处春秋末到战国时代的采矿和冶炼遗址。这儿从 1965 年起,当地矿山的工人们在采矿过程中,就不断发现古矿井遗迹。1974 年,考古工作者在这里进行了探测和发掘。这个遗址面积相当广,南北长约两公里,宽约一公里。在这个范围内发现了当时的矿井支架、坑道,出土了不少采矿用具。同时还发现了大小炼炉数座和十多块饼状的铜锭,不少地方堆积着古代的大量矿渣,有的约数米厚,据估计约有 40 万吨左右。可以想见,这儿在春秋战国时代,曾经是规模宏大、开采时间相当长的一座矿冶基地。有的学者曾作过计算,就这 40 万吨的炼渣估计,当时提炼出来的铜当在万吨以上,如果用来铸造青铜生产工具和武器,以每件平均两公斤计算,即可制造 500 万件。根据当时人口推算,则可为全国每家铸造一件青铜器。遗址揭示的情况还使我们看到了古代文献所不能得知的许多宝贵情况。从发现的竖井、斜井、平巷、斜巷等,表明当时已采用这些方法,相互配合进行开矿。这



在古代是具有很高水平的先进方法。这里的竖井,直径为80厘米,可容单人上下。结构是采用四根圆木,每根的两端砍成台阶状的搭口榫,相互搭成方框支架,然后用这种无数方框层层迭压,构成竖井。这种井主要是供采矿工人上下和运取矿石、提取井下积水以及通风换气用的。斜井也用圆木构成,它是把两根圆木的两端凿成孔,再将另外两根圆木的两端劈成榫头,穿接成一个方框。然后用这些方框若干,沿着矿层的倾斜走向,由浅入深,节节伸延到需要的位置。在这些框架外面——左右和上方,又用小树棍排成一片,以便最大限度的抵抗左右和上方的压力,防止矿井坍塌。从这种结构来看,当时已经很好的解决了井下的支护问题。

发掘的情况还告诉我们:当时已经把矿井挖掘到了地下50多米深的地方,而且初步解决了井下的通风、排水、提升、照明等等复杂技术问题。在通风方面,当时的矿工们已知道利用井口内外自然形成的不同气压,封闭已经废弃的巷道,使空气沿着采掘方向前进。这就可能在没有鼓风设备给井下送风的情况下,也能使空气到达井下的工作地方,从而保证了采掘工人在井下对空气的需要。从发掘的坑道和辘轳看,当时对地下水的排除方法,是将水先引到积水坑,然后通过竖井,用辘轳把水提取上地面。在这儿还发现了不少当时遗留下来的采矿工具和生活用具。它可靠的告诉我们当时的矿工们在井下的具体作业情况和他们的艰辛生活。已经发现的采掘工具有铜斧、铜锄、木锤、筐篓、木铲等等,属于战国中后期的工具有铁斧、铁锤、铁耙、铁锄等。此外,还有一种特殊的船形“木斗”。生活用



具主要是简陋的陶制饮食用具。从上面这些主要遗物,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采矿工人是单食瓢饮,粗菜淡饭。矿工们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下将土和矿石一点一点地用锄和铲挖下来;遇到坚硬的岩石和矿石,又用斧、凿一点点地劈砍敲打成碎块,然后再一铲一铲地装进筐中运到竖井下,用辘轳提出矿井。不难想象,当时矿工们的劳动强度该有多大!摆在统治者庙堂上的精美青铜礼器,凝聚了多少劳动者的血汗!这里要特别介绍一下独特的船形“木斗”。它是用一大块整木挖凿成的。它的形状好似船,全长约 36.2 厘米、宽 14 厘米、高 7 厘米,中间挖凿有深 3 厘米、长 20 厘米、宽 12.5 厘米的“舱”,两头伸出成平板状。这件东西是作什么用的呢?后世民间淘沙金时,有一种“淘金斗”,为了把金子从泥沙中提选出来,就把含金泥沙装在木斗中入水淘洗。金的比重比泥沙重,在淘洗过程中泥沙被水冲走,金粒就沉积下来了。大冶铜绿山古矿井中出土的这只船形木斗,看来也是有这作用的。为了选择矿沙的品位,确定采掘的具体方向的地点,在采掘到一定时候,就将矿沙装进这种船形木斗中用水淘洗,比重大的金属矿沙沉积在“船舱”中。这类似于今天的“重力选矿法”。这样就可以确定矿的品位,矿工们就便于选择含金属量高的方位掘进,避免开采到含金属量低的地方。这只小小的船形木斗,就是一种原始的“重力选矿器”,它可以帮助人们选择矿的品位;这只小小的木斗,集中地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我们从冶炼遗物铜块、炼渣等,还可知道这处古矿井是开采铜矿的。铜绿山遗址的大小冶炼炉和铜块还告诉我们,这儿是就地开采就地冶炼的。在矿山附近先炼出粗



铜,然后将粗铜再运到手工业作坊进行加工,由铜器作坊根据所铸器物的不同需要,按一定铜锡比例炼成青铜,铸造成各种器物。我国青铜铸造业,从目前已出土的大量青铜器看,商代就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众所周知,当时的青铜器,铜质优良,造型优美,花纹极为精细工巧,由此不难想见那时的冶铸技术的工艺水平有多么高超!春秋战国时代,虽然青铜时代已近尾声,但科学技术水平却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从而也为铁器的更大发展准备了技术条件。

2. 炼砂

铜矿砂分为自然铜、硫化铜、氧化铜(孔雀石属之)三种。在殷墟炼铜遗迹中,曾发现过孔雀石一种。孔雀石留存的碎块很多,1929年秋还发现一块较大的,重18.8公斤,其中混杂着些赤铁矿,但无用的石质却甚少,可以说明殷人对于采取矿砂,是曾经过选择的。炼砂遗迹中还有炼炉的残迹。一般的散布着带麦秸印的红烧土,有些还粘着炼渣。有一大块炼渣,重达21.8公斤。这样大的炼渣,显然是炼炉中的产物。炼砂遗迹中还散布着大量的炼砂或熔铜的坩埚。坩埚大中尖底,倒视之,仿佛戏剧上的剧装“将军盔”,所以工人同志们都以将军盔称呼它。一般将军盔具有小而笨重的结构,正是为了炼砂或熔铜的适用。3公升的铜质,即令一半是纯铜,也有12.7公斤。若再加以炼渣及将军盔本身的重量,必在20公斤以上。如无这样坚牢笨重的结构,将不可能承受得了。在殷墟炼砂遗迹中,还散布着很多的木炭,长者二寸,短者一寸余,碎的均为粉末,与泥土混



合，这是殷人炼砂或熔铜所用的主要燃料。根据这些遗迹遗物，我们可以推证出殷人的炼砂程序，是先用孔雀石铜矿，选其中石质少的，加以破碎，加入熔剂木炭，再投入炼炉或炼坩中，燃木炭熔炼。迨火候成熟，然后取铜液精炼浇铸，炼渣弃去。这是一般炼砂的情形。

3. 制范

粗铜经过精炼，即可熔铸，但在精炼之前，必须先制范。根据殷代遗迹遗物，我们知道殷人制范须经过三步程序，即：(1)造型，(2)翻范，(3)合范。范经合成，始可进行熔铸。造型就是打样子的意思，想铸什么样的铜器，就先用泥土塑成一个什么样的形状，作为初胎。这种技术是从制陶技术提高而来的，因此古人常把陶铸连称。翻范是把澄滤过的细泥调制和润，拍为平片，附捺在前面所制模型的外部，用力压紧，使模上花纹反印在泥片内。等泥片半干，按耳、足、边、角或中点等处，用刀划整齐，使各片之间有榫卯可以紧密相合。合范是把分片作成的外范合拢在一起，叫它们合成一个器的外腔，再在中心加一内范，也叫泥芯，使它成为器的内腔。内范须比外范略小，两者距离为容纳铜液的地方。为使器壁厚薄均匀，在内范外范接触处各有子母榫眼相扣，以规定器的厚薄。

4. 熔铸

春秋战国时代对青铜的取材、配料、冶铸的火候等等，都已经有了相当精密的分析记录，已经总结归纳出了一套科学的



理论。有的论述用今天科学方法去检验,也证明是符合科学道理的。比如各种青铜器中铜与锡的成分问题有这样的记录,“金有六齐(金即铜,在化学上称铜锡合金为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其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这就是说,各种不同用途的青铜器,铜与锡的比例是各不相同的。据近代人实验研究,上面的这种比例是十分科学的。在冶炼熔铸过程中,对不同火候的辨认与掌握,当时也有了精细的记录。如说:“凡铸金之状,金与锡黑浊之气竭,黄白次之;黄白之气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气竭,青气次之,然后可铸也。”对于青铜的冶铸技术,从科学的角度去考察,确实又达到了一个高度。古人早已了解铜锡合金的性质,今天我们用仪器分析殷代铜器的结果:刀的铜锡比例是85%纯铜,15%锡;镞的铜锡比例是83%纯铜,17%锡;戈的铜锡比例是80%纯铜,20%锡;大司母戊鼎的铜锡比例是84.77%纯铜,11.64%锡(外有2.79%的铅)。可见我们的殷代先民,很早已经掌握了很好的铜锡比例的配合。经验积累到了青铜时代末叶,在《考工记》中更制成一种适合器类性能的调剂表:

钟鼎之齐,铜85.71%,锡14.29%。

斧斤之齐,铜83.33%,锡16.67%。

戈戟之齐,铜80%,锡20%。

大刃之齐,铜75%,锡25%。

削杀矢之齐,铜71.43%,锡28.57%。



鉴燧之齐,铜 66.66%,锡 33.33%。

这一张青铜调剂表,是很合乎今天科学上合金试验的结论的。今天大家知道:青铜中锡的成分占 17% ~ 20% 的最为坚韧,超过这个度即逐渐减弱。斧斤是工具,戈戟是兵器械,都需要坚韧,锡占 16.67% ~ 20%,正合于坚韧的标准。青铜中锡的成分占 30% ~ 40% 的硬度最高,超过此度又要减低。大刀、削、杀矢等兵刃需要锋利,又需要坚韧。锋利就需要硬度高,坚韧就不需硬度过高,高了反而刚脆。锡占 25% ~ 28.57%,保持着锡占 30% (硬度高)至 20% (最坚韧)的两个接近数,使具有两者兼顾的性能。一件鼎要想坚韧又要辉煌灿烂,具有赛黄金的橙黄金色,锡只占 14.29%,这时颜色橙黄,又接近 17% 那个坚韧数。2000 余年前我国先民已能创造出这样一张合乎科学试验的调剂表,正是劳动实践和伟大智慧的结晶。铜锡按所铸器类分剂调配适当后,就要装入坩埚精炼。精炼的程度,要看火候。青铜火候观察,《考工记》中也曾分出几种层次:

(1)“凡铸金之状,金与锡黑浊之气竭,黄白次之;”(黑浊气是挥发性的不纯洁物质的气化,黄白气是锡先熔化,呈现黄白色,因锡的熔点低的原因。)

(2)“黄白之气竭,青白次之;”(到温度上升,铜的青焰色也有几分混入,因而呈现青白气。)

(3)“青白之气竭,青气次之;”(温度再高,铜全部熔化,铜量大于锡量,只有青气了。)

(4)“然后可铸也。”(销炼火候已熟,可以浇铸了。)

这个次第,也是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站在熔炉前边,从实



践中等待、观察、考验，历经积累得来的，它成为今天表现功夫纯熟的成语——“炉火纯青”。下一步程序，只要把熔炼过的熟金，倾倒入已经布置好的合范中就成了器了。我们古人或许是用将军盔直接把铜液倾注到合范中。但只能是小件铜器可以这样做，要是大件铜器，如牛鼎、鹿鼎，都是三四百公斤，司母戊鼎是875公斤，那就不能这样简单了。殷代熔铜的坩埚每个只能熔铜12.7公斤。875公斤的大鼎，要有七八十个坩埚同时并熔，才能满范，否则不能同时并熟，连续浇灌，器要分裂。坩埚多，需要场面大，然后才能分布得开。又需要燃炭的、观火色的、运料的、运铜液浇灌等等劳动的分工，以一个坩埚配合一人至二人计算，也需要一百至二百人，即一二人掌握二三个坩埚，也要近百人方能周转开来。人多、物多、地方大，就不能杂乱无序，互相妨碍，又必须要有组织，有布置，有领导，有条不紊，才能铸成大器。这俨然是一个有相当规模的铜业作坊了。875公斤的大鼎，赫然呈现在我们眼前，是殷代已有一二百人的青铜铸造作坊的见证。

铜液浇灌后，器已经形成，等基本凝固，热未全散，即可脱范。脱范必须将泥范揭破，以免弄伤器物。范破不再用就罢了，保证器物完整才是主要目的，因此之故先秦无使用两次的泥范，也无同范的铜器。

青铜铸造的最后一段工夫是青铜成器后的最后修治。因铜器初下型，表面粗糙，棱角不明，暗然无光，必须经过砥砺打磨，才能砺磨锃亮，光彩焕发。

这样卓越的青铜铸造术，铸造成些什么成品呢？根据历代



记载及发掘所得,大约成品已超过万余件,概括而言,大约有六类:鼎彝等礼器为一类,钏铙等乐器为一类,戈矛等兵器为一类,车器为一类,刀铲等工具为一类,不属于上列五种的杂器为一类。从数量看,以礼乐器为最重,以兵车器为最多,杂器较少。而青铜时代之所以称之为青铜时代,正是以青铜生产工具和青铜兵器而得名,因生产工具是一切生产之母,所以应当说还是生产工具为重要,但出土数量却不比杂器多。殷周青铜农具出土不多是有其原因的:(1)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改进,对于商代农业生产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尽管从甲骨文“物”字的造型上未必能说明当时已有牛耕,但在农业中已经使用青铜工具却是无可置疑的。1953年在安阳大司空村晚商晚期层中曾发现一把青铜铲,全长21厘米、刃宽8.5厘米,上端有方鋈柄,可以安装木柄,有明显的使用痕迹。1960年在安阳苗圃也出土了一把青铜铲,长21厘米、刃宽11厘米。商代的奴隶主贵族不过把劳动者当作会说话的工具,但是劳动者自己硬要使动物和劳动工具觉得他不是它们的同种,而是人。他总是虐待动物,损坏器具,借以表示和纯粹的工具有别。所以,在这种生产方式内,有这样一个经济原则,只使用最粗糙笨重、并且因为笨重而难于损坏的工具。商代的奴隶主贵族就是死守着这个“经济原则”,不肯给奴隶使用在当时仍然是比较贵重的青铜工具。因此,至今在早商或晚商遗址或墓葬中,青铜农具的发现还是很少的。(2)今日大批青铜器的出土,十分之九皆出自贵族墓中,且多为礼乐兵车等类的享受器。贵族不作农事,因而没有铜农具的遗留。当时从事农业的人多为奴隶,生产资料不归奴



隶所有,奴隶墓中自然不可能有铜工具。就是当时的自由农,他们仅有少数的铜农具,而且为全家生活生命所依托,谁肯夺去子孙的命脉,拿农具去殉葬呢?且铜农具是劳动用物,并非享受用物,其祖若父从事农业,勤苦终生,从当时迷信的观念说来,死后可略得安逸,子孙又岂肯以铜农具随葬,让祖辈父辈再辛苦于地下?所以自由农墓中也不可能葬铜农具。墓中不存,自然出土不多。(3)因遗址的发掘刚开始,铜农具发现也少,铜质古称黄金,具有金钱价值,工具用坏,仍然可以改。(4)铜农具虽难保全,但并非绝无出土,如1953年考古所工作队在安阳大司空村遗址中所发现的大铜铲,长22.45厘米、重2.25市斤,刃已经用卷,是最好的实证。



六 青铜器的发展阶段

中国青铜文明源远流长，我们聪明睿智的祖先在原始社会后期就已开始了这一伟大的创造。考古工作者在上古文化遗迹中发现了青铜器物。究竟人们在远古时代制造铜器的情况如何，考古发掘所提供的材料也是极有限的。据说陕西临潼姜寨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一个铜片，为铜锌合金。如果这一发现确凿无误，那么我们中国的铜器制造史即可上溯到 6000 年以前了。奴隶社会的青铜文化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初期奴隶社会——约相当于夏代（约公元前 21 世纪至公元前 16 世纪）

我们知道，夏王朝是夏禹传位给儿子启而建立起来的我国第一个“家天下”的奴隶制国家。大约建立于公元前 22 世纪末，从禹传到桀共传 14 世 17 王。直到公元前 17 世纪为商汤所灭亡，历时大约 500 年。当夏族建国之时，商族就已展开了他们的



活动。据文献记载,在成汤以前的所谓“先公”时代,商族曾经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八迁其居,并且逐渐强盛起来;而到成汤之时,随着夏族势力的衰落,商族四出征战,灭了许多小国,最后灭了夏桀,取代了夏的统治地位。

本阶段是我国历史上从氏族制社会已经过渡到奴隶制社会的时期。本阶段开始使用了青铜器工具,并有了专门的青铜武器。铜礼器开始出现,杀人祭祀的现象已经存在,占卜之风已很盛行,表明奴隶社会的礼制已经产生。大量的陶器上的刻划符号已经非常接近文字,有的甚至就是文字。

第二阶段:中期奴隶社会前段——商代前期(约公元前 16 世纪至公元前 13 世纪)

商族战胜夏王朝的过程,就是商族本身的氏族公社制解体,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国家——商王朝建立的过程。据《竹书纪年》、《尚书序》和《史记·殷本纪》记载,从成汤灭夏到盘庚迁殷的所谓“先王”时代,商王朝又曾五迁其都,最后才定都今河南安阳小屯(即“殷墟”);直到帝辛被周族所灭,商王朝共经过了约 600 年左右的时间。整个商王朝的历史,是我国灿烂的青铜文化逐步发展到高峰的历史,也是我国奴隶制社会逐步上升的历史。

本阶段青铜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后期并开始使用陨铁、青铜合制的复合武器。手工业与农业分工的扩大,手工业内部也有了分工,手工业作坊有了一定的布局。成套的礼器和多种的专门青铜武器的大量存在,表明奴隶制的礼制已有所发展。

第三阶段:中期奴隶社会后段——商代后期至西周早期



(约公元前 13 世纪至公元前 10 世纪中叶)

《史记·殷本纪正义》引《竹书纪年》说：“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通过殷墟的发掘和对甲骨文的研究，已经完全确定河南安阳小屯一直是商代后期的王都。小屯位于今安阳市旧城西北 5 华里，北面、东面不远有恒水流过。

本阶段是奴隶社会发展到鼎盛的时期，青铜器的制作达到了高峰。由于在生产上大量作用奴隶劳动，奴隶制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手工业的内部分工与协作已发展到新的阶段。与早商铜器相比，晚商早期铜器有其明显的特点：早商铜器器壁一般较薄。晚商早期的铜器，器壁一般较厚。其中礼器除继承早商的外，又出现了一些新种类，例如炊食器中的罐鼎、鬲鼎、甗鼎，酒器中的方彝、鸟兽尊等，而各类器物中几乎都有方形的。有的鼎等已开始改为柱足，爵等多改作凸底，爵的柱都在口上而近流折处。武器和工具中，变化比较明显的是戈。

早商铜器花纹结构比较简单，线条显得粗笨，且多为单层，少有双层的。除常见的饕餮纹、云雷纹而外，还有夔纹、龙纹、虎纹等，也有用人形作为装饰花纹的。其中双夔合成的饕餮纹，尾部多半上卷，下卷者极少。晚商早期的铜器花纹结构比较复杂，线条显得秀丽，双层花纹极为习见，并出现了三层花纹，即用云雷衬底。双夔合成的饕餮纹，其尾上卷者渐少，下卷者渐多。

早商铜器的发掘品中尚未见铭文。在传世器中偶然见到有一个字的铭文。晚商早期铜器多无铭。其有铭者，多半是族徽或是其他图形文字，笔道刚劲，一般不作波磔。



晚商文化中、晚期,绝对年代约为廪辛、康丁、武乙、文丁时代,主要特征:晚商中、晚期的铜器,器质厚重,造型新颖、花纹繁缛,制作精巧,表现出高度发展的工艺水平。新出的器形,炊食器中有豆、匕,酒器中有筒状尊、觥等,水器中有壶、盂,杂器中有俎,乐器中有铙。花纹中,鸟纹、蝉纹开始盛行。饕餮纹、夔纹变化极多,不拘一格。三层花纹非常流行,一般均用云雷纹衬底。

商代后期的青铜工业,在继承前期的基础上,更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其分布地域比早商时期更为扩大了:北从长城以北的辽宁东部,南到长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区,西从陕甘一带,东至江浙沿海,在这纵横数千里的范围内,都有晚商铜器的发现。其影响所及,更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

晚商的青铜工业主要是由王室和大贵族所控制的,因而在王都殷墟集中了更多的作坊,成为全国青铜铸造业的中心地区。这些作坊的规模比郑州早商时期大得多,青铜产品的种类和数量自然都有增加。历年来出土的晚商青铜礼器,虽无精确统计,根据估计总可达到数千件之多;其他兵器、车马器、工具等或当数以万计。如果加上商朝亡国以后历代流失、毁坏的铜器,数目当更多了。

晚商铜器以厚重为特点,巨型铜器逐渐增多,特别像 1938 年在安阳武官村出土的司母戊鼎,通耳高 133 厘米、横长 110 厘米、宽 78 厘米,重竟达 875 公斤。这件巨型铜器,不仅是我国青铜时代最大的,也是古代世界青铜文化中所仅见的。司母戊鼎——这件将近 900 公斤重的庞然大物,出现在 3000 多年前



的商代,不能不令人惊讶!自然,它的闻名,不单是在它庞大的身躯,更在它的高度精湛的制作技艺。经过光谱定性分析和化学分析的沉淀法所进行的定量分析的结果,证明它是用青铜、锡和铅3种元素所熔成的铜青合金铸成。这3种金属元素所占的比例是:铜84.77%、锡11.64%、铅2.79%。又若把锡和铅加在一起则共占14.43%。《周礼·考工记》记载的“六剂”中,所谓“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剂)”,就是说,鼎、钟之类的合金比例中,锡占14%左右。《考工记》是战国时代的作品,其所记载的“六剂”,自然是商周以来长期铸铜实践经验的总结。现从司母戊鼎的合金成分得知,早在商代后期,奴隶工匠们就已经掌握了《考工记》时代所总结的青铜配剂法了。另外,巨型铜器的铸造,也要先制模,后翻范。根据司母戊鼎的铸痕观察,估计鼎身也用8块范,每条鼎足各用3块范,鼎底及鼎内各用4块范,鼎耳还需先用范另外铸成,和商代前期的大方鼎大体相似。我们可以设想,要将这种多合范拼合成一件整体,则更需要高度的技巧,没有长期的丰富的铸造经验显然是办不到的。

灌注铜液是铸铜过程中较后的一项工序。灌注一般形体较小的铜器是比较容易进行的,而像司母戊鼎那样的重器,显然非一般简单的操作方法可以铸成的了。由于铜液热得快冷却也快,就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注完,否则就会形成冷隔。我们知道,当时是用“将军盔”熔铜的,而一个“将军盔”一次只能熔铜12.5公斤,司母戊鼎共重875公斤,则需至少70个“将军盔”同时进行熔化。如果每个“将军盔”旁有三四人进行工作,则共需



250 人左右。但灌注只是铸铜过程中的一个工序,若再加上制模、翻范、拆范后的修饰以及运输、管理等,总共就需要至少是 300 人以上了。商代后期的青铜工业作坊,不仅规模宏大,而且组织严密,分工细致。显然,这只有在比较发达的奴隶制的基础上才可能出现的。司母戊鼎的铸造成功,充分体现了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无穷的创造力。

西周早期约当公元前 11 世纪至公元前 10 世纪中叶,即在周穆王以前。周族本是居于今陕西渭水中游以北的一个古老部落。相传周的始祖后稷,名弃,他的母亲姜嫄在野外踩巨人足迹而怀孕生下他。弃是周族的始祖,善于经营农业。帝尧让他担任农师。舜封他于郃(今陕西武功西南),“别姓姬氏”。夏代,周族一直以农业为主,在黄土高原上生活。大约在商朝初年,周族传至公刘时,迁居于豳(今陕西旬邑西),在那里立脚,开垦荒野,发展壮大,史称“周道之兴自此始”。以后再经九世传至古公亶父时(约公元前 12 世纪),为了躲避戎、狄的侵扰,周族又迁徙到周原(今陕西岐山县)。营建宫室都邑,周族从这里崛起。古公亶父后被周人尊称为太王。古公亶父死后,子季历继位。周族更趋强盛,先后征服了附近的一些方国部落,引起了商王朝的不安,商王文丁杀害了季历。季历死后,子昌立,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周文王。文王招贤纳士,扩张势力,为翦灭商朝而向外用兵,把都城从周原东迁于丰邑(今陕西长安县)。文王在位 50 年,成为西方部落联盟的霸主,形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局势。文王死后,由儿子姬发继位,即周武王——西周王朝的开国之君。这时,商纣王的残暴统治愈演愈烈,众叛亲离,民怨沸腾,又



恰逢商朝对东夷用兵,内部空虚。于是,武王东至孟津(今河南孟县西南),与各路反叛商朝的部落和方国的首领会盟,计划大举伐商。公元前1027年,武王率戎车300辆、虎贲(即勇士)3000人、甲士45000人,与庸(今湖北竹山)、蜀(在今川西、陕南)、羌(散布于今甘肃等地)、髡(今山西平陆)、微(今陕西眉县)、卢(今湖北襄樊西南)、彭(今房县)、濮(散布于今川东、鄂西)等族或方国联合伐商。最后双方对阵于牧野(今河南汲县北),商军在战场上纷纷倒戈,商纣王于火中自杀而死。商朝灭亡,周王朝正式建立,定都于镐(在沔水东,今陕西西安市西南)京。灭亡商朝后仅两年,周武王病死,其子成王继位。因为成王年幼,由武王弟周公姬旦辅佐摄政。商纣王之子武庚勾结管叔、蔡叔与徐、奄、熊、盈等东方夷族部落起兵反周。周公出师东征,两年平定叛乱。此后营建东都洛邑,成为周人控制整个东方地区的重要政治军事中心。相传周公旦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东征胜利后,为加强周人的统治,大举分封诸侯。当时重要的封国有卫、鲁、齐、宋、晋、燕等。成王、康王之际,天下安宁。昭王是西周建国后的第四位君王,经过数辈的创业努力,社会经济发展进入鼎盛阶段。随着楚国势力的发展,与周朝的冲突日渐增多。昭王曾多次亲自统兵征伐南方楚地,也多次取得胜利。但是在他晚年一次征楚战争中,竟死于汉水之滨。穆王时,周仍是盛世。穆王攻犬戎,俘获其五王,迁戎于太原(今甘肃东部邻接陕西的地区)。徐国(今淮河中下游,以江苏泗洪为中心)强大,徐偃王率九夷(淮、泗一带各部落)攻周,穆王命楚国攻伐徐国。穆王还曾攻打越国,东至九江(指今湖北广济、黄梅一带



诸水)。相传穆王还曾西行,周游天下。恭王、懿王开始,西周王朝内外矛盾日益加深,日渐走向衰落。

这一时期的铜器,大体继承了商制,无多大变化。从种类而言,常见的炊食器有鼎,鬲、豆极少见;酒器有觚、爵、角、尊、鸟兽尊、方彝、觥、壶等;水器有盘、壶;杂器有俎、禁等。周灭商之时,曾经俘虏了商朝大量的手工业奴隶。周王朝对这些工奴是非常重视的,除了大部分留在镐京和成周以外,也把他们赏赐给受封的诸侯。所以西周初年,无论是王都或者是诸侯国的手工业,主要都是靠这批商朝工奴创建起来的,基本上是承袭了商代晚期的手工业。西周手工业内部分工也很细,其中最重要的仍然是青铜工业。

西周早期还没有发现像司母戊鼎那样的巨型铜器,目前发现西周早期最大的铜器如大盂鼎,也只重 153.5 公斤,但发现铜器的总量却超过了商代晚期。可见西周早期的青铜工业,比商代晚期已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从器形而言,例如鼎,一般都是直耳立于口沿上,柱足或兽足,腹较浅,下腹微胀。西周早期的双耳一般无盖,为这时期新出现的形制。戈通常作长“援”短“胡”,一穿至三穿,也有无胡无穿的。本期新出现青铜匕首,而钩戟这种周族独有的武器,这时期特别盛行。从花纹而言,最常见的是饕餮纹,其次是夔纹,往往都用云雷纹衬底。另外,鸟纹也比较流行。从铭文而言,西周早期的铭文比商代晚期有了显著的发展。商代晚期最长的铭文也还不到 50 字,而周武王时的就有铭文达 8 行 76 字;康王时的大盂鼎铭文长达 19 行 291 字;小盂鼎铭文甚至竟达 20 行将近 400 字。在还没有发明



纸的周代,铜器上的长篇铭文,就如同后代的文书。

总之,这个时期的铜器,器形制作凝重结实,花纹造型庄严典重,文字结构工整谨严,说明西周早期,如同商代晚期一样,仍然是我国青铜时代的鼎盛时期。

第四阶段:晚期奴隶社会前段——西周中晚期至春秋初期(公元前10世纪中叶至公元前7世纪中叶)

本阶段是奴隶社会开始走下坡路的时期。青铜器的制作已经呈现衰歇的现象。西周后期,到周夷王时,诸侯不朝,相互攻伐。厉王即位后,因贪婪暴虐,任用谄媚的臣子为卿士,横征暴敛,激起国人暴动。厉王逃命,出奔到彘(今山西霍县)这个地方。其时为周、召二公共和行政14年。宣王时,西周王朝曾出现过一阵中兴景象。宣王刷新政治,任贤使能,国势一度得以振兴,史称“宣王中兴”。宣王对周边方国屡次用兵,取得一些胜利,也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西周社会的危机并未能逆转。到幽王时,严重的旱灾和大地震加重了政局的动荡不安。幽王宠爱美女褒姒,烽火戏诸侯,废申后和太子宜臼,引起朝政混乱。公元前771年,申侯(太子宜臼的外祖父)联合缙、犬戎进攻镐京,杀幽王,掳褒姒而去。西周灭亡。西周前后一共经历12王,约257年。

西周晚期,由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加剧以及统治阶级内部各方面势力的消长,王纲趋向松弛,礼制渐渐出现被破坏僭越的迹象。西周墓葬中的随葬品种类是比较多的,主要可分为陶器、青铜礼器、兵器、车马器、玉石装饰品、原始瓷器和漆器等几大类。随葬陶器的组合和器形演变对于墓葬年代的判断有



重要意义；随葬的青铜礼器，以鼎、簋为核心，有严格的定规，用鼎的多寡标志着墓主人社会地位的高下。按周礼规定，西周时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用簋的数目，往往与列鼎相配，仪次递减一件，即四簋与五鼎相配、六簋与七鼎相配等。有些学者根据考古发掘的资料结合文献记载，对周代的用鼎制度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了西周前期五等爵与天子所属各级贵族用鼎制度的对应关系。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政治秩序，由宗法制和等级制结合起来，就产生了一套完整的、严格的礼仪制度。礼，是当时统治阶级的行为规范。行动举止，待人接物，君臣、上下、父子、兄弟、亲疏、尊卑、贵贱都应有据有别，这些程序规范，笔之于书，即为典章制度，也就是所谓的礼制。西周礼制是我国礼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先秦礼制发展到周礼，进入最成熟、最完备的阶段。这是国家机器完备、文明高度发达的标志。相传周初由周公制礼作乐，经后世的充实发展，使之礼仪繁缛而大备。西周礼制，对于西周考古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如祭祖之礼中的宗庙制度、昭穆之制的形成，丧葬之礼中的族葬制度、棺槨用鼎制度以及封国锡命之礼，卜筮，青铜礼器的组合等。西周礼制问题，有两点应予注意：一是各种礼典仅盛行于各级贵族之间，士为最低等贵族，士以下为庶人、工商、奴隶。周人礼不下庶人。

西周铜器是中国古代铜器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西周的铜器，不仅种类和数量有所增多，冶铸工艺日趋成熟，而且引人注目的是，这时期的铜器往往铸有长篇铭文。这些铭文有一定的风格和程序，内容丰富详实，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军



事、法制、礼仪等重要情况。西周铜器最大的特点是多铭文,且不乏长篇。据不完全统计,传世的西周铜器有铭文者约有三千件之多;1950年以后,发掘出土的西周有铭铜器亦在六七百件之上。相传清道光末年出土于陕西岐山的毛公鼎,铭文有499字,是现存铭文最长的一件青铜器。1976年出土于陕西扶风庄白铜器窖藏的史墙盘,铭文有284字,是1950年后发现的铭文字数最长的一件青铜器。西周时期铜器铭文的大发展,是周人维护宗法制度、加强礼制建设的具体反映,是巩固其统治地位的一种手段。他们在青铜礼器上作器铸铭,表面上看来是“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着之后世者也”,实际上是造作器物的贵族借此以确立、显示他的名分和地位,并传之后世以严格其宗族的承袭关系。西周铜器铭文已逐渐形成一定的格式,大致可分以下几类,如:徽记、祭辞、册命、训诰、记事、追孝、药剂、律令、媵辞、乐律等。西周铜器铭文所反映的内容丰富多彩,有王室的祭典、戎事征戈、田猎宴飨、诸侯分封、政治大事、土地转让、奴隶交易、刑事诉讼、官制封赏、家史婚媾、纪年月相等。反映西周史实的重要铜器数量很多,仅举代表性的数例,介绍如下:

1. 利簋又名武王征商簋,1976年陕西临潼县零口镇西段村周代窖藏中出土,现藏临潼县博物馆。簋通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两兽头耳、有垂珥,深腹,圈足下附方座。饰饕餮纹、夔纹、蝉纹和云雷底纹。簋腹内底有铭文4行32字。大意为:周武王准备征伐商纣。在甲子日早晨,征兆很好,宜于征伐,因而周师一举打败商国。辛未日(克商后七天),武王在一师旅驻足,赏给又事(有司,官名)利(人名)以金(铜),利使用来作成这件宝



器以为纪念。此簋是现知最早的一件西周铜器。

2. 孟鼎又称大孟鼎，相传清道光初年出于陕西岐山礼村，现藏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鼎通高 101.9 厘米，口径 77.8 厘米，重 153.5 公斤。立耳，下腹微鼓，圆底，三柱足。饰饕餮纹、弦纹、扉棱。鼎腹内壁有铭文 19 行 291 字。铭文为康王对大臣孟（作器者人名）的册命，大意是：周代文武二王受命于天，有盛德，使周兴起。而殷商亡国在于纵酒不恭。王要孟以此为戒，继承其父祖的官职，并且赏赐给孟以香酒、礼服、车马及大量的臣民奴隶。王勉励孟要终身管理诸戎之事，克己奉公，不要背弃王命。孟感激王的册命，颂扬王的美德，并作此宝鼎告慰、祭祀其祖父南公。大孟鼎铭文所记西周开国以殷商酗酒为鉴的经验，可与《尚书·酒诰》的内容互为参照。

3. 史墙盘因作器者墙（微氏家族成员）为西周史官而得名。1976 年于陕西扶风县庄白铜器窖藏中出土，现存陕西省周原扶风文管所。盘通高 16.2 厘米，口径 47.3 厘米。敞口，浅腹，圈足，双附耳。饰垂冠分尾长鸟纹、窃曲纹，云雷纹填底。盘腹内底有铭文 18 行共 284 字。铭文分前后两部分，前半部分颂扬了西周文、武、成、康、昭、穆和在位的恭王七代的功德，如成王“肇彻周邦”、昭王伐荆楚等主要业绩；后半部分概述自己的家世，第一代高祖本居微国，第二代烈祖来见武王，第三代乙祖出仕周朝为周王的心腹大臣，第四代亚祖名折，第五代文考名丰，第六代即作器者墙，他们“夙夜不坠”全心事奉周王朝，世代深得周王的宠信。铭文最后说明，墙为了赞扬其先祖并祈求多福，而作器以为纪念。史墙盘铭文叙述了西周前期的一系列重要史



迹,可与现存史籍的记载相互印证。这篇盘铭是已知时代最早的一篇带有较明显骈文风格的作品。

4. 大克鼎又名善夫克鼎,相传是清光绪十六年(1890)在陕西扶风县法门寺任村窖藏坑出土,现藏于上海博物馆。鼎通高 93.1 厘米,口径 75.6 厘米,重 201.5 公斤。两立耳厚大,鼓腹宽体,柱足粗壮。饰窃曲纹、环带纹、饕餮纹。鼎腹内有铭文 28 行 290 字。铭文行间皆有细线相隔,故铭文十分整齐划一。铭文内容为:作器者克颂扬其祖父师华父谦逊、宁静的美德和辅协王室的功绩,并赞美周王的英明睿智;周王授册宣命提拔克为出纳王命为近臣,并赐以礼服、大量的土地和奴隶。大克鼎铭文,历来是研究西周历史、尤其是土地制度的重要资料。

5. 毛公鼎相传清道光末年出土于陕西岐山周原,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鼎通高 53.8 厘米,口径 47.9 厘米,重 34.7 公斤。大口立耳,半球状腹,兽蹄形足。饰弦纹、重环纹。鼎腹内有铭文 32 行 499 字,为现存铭文最长的一件青铜器。鼎铭文记述了周宣王的训诰:首先追述周初文武二王时,君臣相得、政治清平的盛世,继而以感怆时艰的语言,描述当今局势并不安宁。接着宣王策命毛公以治理邦国王室内外事务的重任,并授予毛公以宣示王命和督促执行的特权。为此宣王告诫勉励毛公,不要壅塞民意,不要鱼肉鳏寡,不要沉湎于酒,善效友正、忠心勤恳辅佐王室。最后为确立毛公的权威,赐毛公以大量礼器命服、车马和兵器。毛公对此感恩戴德,作鼎以为纪念。毛公鼎铭文皇皇巨制,反映了宣王中兴时的重要史实,对研究西周晚期的政治历史很有参考价值。



6. 散氏盘又称散盘、矢人盘,据传清乾隆年间于陕西凤翔县出土,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盘通高 20.6 厘米,口径 54.6 厘米。浅盘,附耳,高圈足。饰夔纹、变形饕餮纹及窃曲纹。盘腹内有铭文 19 行,存 357 字,是一篇完整的治地契约。内容大致为,因矢国侵害了散国的利益,散氏诉之于周王,在周王的调解干预下,矢人须付两大片土地给散国以为赔偿。铭文详述了矢人所赔田地的田界四至,并列记了矢、散双方参加勘界、订约、盟誓的时间、人员和内容,并由周王室中管理诉讼的王臣到场作证。散氏于是把誓约铸于铜盘上,以作为永久的证据。散氏盘铭详细记载了诸侯国之间争夺转让土地纠纷的经过,反映了西周晚期政治、经济制度已有所变化的情形。

国内阶级矛盾日趋激化,特别是西周最后一个统治者周幽王更是荒淫暴虐,民怨载道。公元前 771 年,西方另一个少数民族犬戎乘机攻入镐京时,幽王却得不到人民的支持,结果西周就被犬戎灭掉了。西周灭亡以后,周平王迁都洛邑,因在丰、镐之东,自此以后称东周。

西周中期约当公元前 10 世纪中叶至公元前 9 世纪中叶,即周厉王以前。本期铜器也有一些变化:从器形而言,柱足鼎逐渐少见,兽足鼎流行,鼎腹呈现长方扁形。“援”末作三角形的戈开始出现。从花纹而言,饕餮纹逐渐少见,鸟纹仍然盛行。新出现有“状甚长,上下皆曲”的窃曲纹、状如数瓦相从的重环纹以及身尾卷曲如 S 状的变形夔纹等。从铭文而言,长篇也比较常见。西周中期以后,青铜铸造业比西周早期又有了一定的发展。西周中期至东周初年,出土铜器的数量已经超过了西周早



期。例如在陕西长安、扶风、岐山等地历年来发现了好几批窖藏铜器，一窖少则四五十件，多至百余件，其中大部分是属于这一时期的。又如河南三门峡市虢国墓地，出土铜器器皿即达 181 件，其他大宗的工具、武器、车马器等，更不下 5000 余件。数量的增多，说明生产规模的扩大。

从铸造技术看，西周中期以后铸铜的进步，就是发明了一模翻制数模的方法。例如虢国墓出土的鬲、壶等器和其他地区西周中晚期常见的同类器物，往往都采用此法铸造。这种铸造法比之商代和西周早期的一模只翻一范的铸造法，其生产效率显然提高了好几倍。其次，虢国墓铜器的壶耳套环，是在壶身铸造成后焊接的，可见当时在铸器时已经使用了焊接技术。

不过，虢国墓铜器大部分是“明器”，没有使用痕，有的因铜液灌注不全而留下洞孔。这种粗制滥造的礼器，在西周中晚期常有发现，而在西周中期以前是极少见的。这一方面反映了铜器所有者的经济力量较差，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掌管青铜铸造的官员们敷衍了事、从中作弊的结果。这说明西周晚期铜器既承早期厚重典雅的传统，又开以后轻薄草率的新风，因而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的特点。

西周晚至东周初期，约当公元前 9 世纪中叶至公元前 7 世纪中叶，即晋文公重耳称霸以前。本期铜器有明显的特点。从种类而言，最常见的炊食器有鼎、鬲等几种，新出现的有盆。酒器有尊、鸟兽尊、壶等。水器类的盘极为常见。本期的编钟已增加到 7 件至 9 件 1 套，除甬钟之外，又新出现了钮钟。从器形而言，本期的鼎足，几乎全作中间细、两端粗的半筒状马蹄形，鼎



耳大多直立口沿上,有的作附耳。本期的铜戈,“援”部有的变短,“援”末多呈三角形,“胡”部、“内”部加长,多为二穿或三穿。从花纹而言,早期的夔纹、鸟纹逐渐绝迹,饕餮纹已变小作为器足上端的装饰,而窃曲纹、重环纹、垂鳞纹、变形夔纹等特别盛行。这些粗枝大叶的几何图案,一般都不用云雷纹衬底,显得有点潦草。从铭文而言,本期的铭文字体已经不常用肥笔,大半呈上下等粗的柱状,波磔不十分明显。行款排列比较整齐,但文字每每有夺落重复现象。不过,百字以上的长篇铭文在本期是比较常见的,最长者如厉宣时的《毛公鼎》将近 500 字。这件珍贵的文物在台湾。总之,本期铜器,器形制作,轻薄简陋,花纹造型趋向简单,铭文文体和字体往往呈现草率现象。所有这些,都说明了西周晚期至东周初期是我国青铜时代的中衰时期。我们知道,自周厉王以来,国内发生了剧烈的阶级斗争,直到最后西周灭亡。东周初年,诸侯国正在兴起,局面动荡。经过长时期的阶级斗争加上民族斗争的猛烈冲击,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权已经摇摇欲坠,整个奴隶制度自此也就一蹶不振了。本期铜器呈现中衰现象,正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反映。

第五阶段:晚期奴隶社会后段——春秋中晚期(公元前 7 世纪中叶至公元前 5 世纪中叶)

本阶段是奴隶制走向瓦解,封建制开始兴起的时期。冶铁术已经发明,铁器工具开始代替青铜工具(春秋中叶至春秋战国之际)。

公元前 7 世纪以后,东周已降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国,而齐、晋、秦、楚、吴、越等诸侯国却先后强大起来。奴隶们反抗统



治阶级的烽火遍及所有的国家，狠狠地打击了奴隶主贵族，从根本上动摇了奴隶主的统治地位。同时，由于私田的大批开垦，井田制度不断地遭到破坏，新的土地所有者与旧贵族的矛盾越来越大，逐渐形成所谓私门与公家矛盾日益激化的局面。

在春秋时期的诸社会变革中，生产力的发展及其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这一时期，生产力方面的一个重要进步，就是冶铁术的发明。由于冶铁术的发明与改进，当时逐渐地用铁器来代替青铜器。但是，也必须看到，春秋晚期至春秋战国之际，铁工具出上的数量毕竟太少，表明当时无论南方地区或中原地区，铁工具的使用还是很普遍的。青铜铸造技术还在向前发展着。

春秋中晚期，青铜铸造工艺的一个突出的进步就是分铸法的进一步发展。分铸法早在商代就已发明，到西周至春秋早期，绝大部分铜器的附件（如耳、足等）都采用了分铸法。但是制范时，仍然先作一个完整而具备附件的模（或叫“母范”、或“母型”），再从这样的整模上翻范。到春秋中晚期，才进一步发展到器身与附件分别单独作模。与分铸法密切相关的焊接法，虽然早在西周时期就已发明，但比较普遍地使用，似乎是从春秋中期开始的。春秋中晚期，铸铜工艺的另一个重要的改进，就是用方块印模来印铸花纹。从侯马发现的陶范花纹来看，当时已普遍采用印模花纹的技术。在春秋中晚期盛行的蟠虺纹，都是用此法印铸的。无论器身、附件的分铸法或花纹的印模法，都是充分发挥了母范的作用，把整体铸造改为分体铸造，显然是作坊内分工越来越细的一种表现。这一方面使得生产效率不断提



高,同时也使得铸件的个性逐渐消失,共性逐渐增强,产品就越来越趋于规格化。这种趋于规格化的产品,自然也就更加具备了商品的特征。因此,春秋中晚期铸铜工艺的改进,正反映了当时商品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分铸法的广泛应用,除使产品趋于规格化外,还便于处理形制极为复杂的铸件,创造出气派雄伟、结构复杂的艺术作品。新郑出土的立鹤方壶就是很突出的例子。该方壶二兽托底,四兽爬腹,盖立一鹤,振翅欲飞;满腹龙凤纹,交互蟠绕,造型极其生动,构图十分华丽,比之晚商时的四羊尊,又达到另一新的水平。如果不是充分发挥分铸法的优点,这种惊人的技艺是很难表现出来的。春秋晚期,由于铁器的使用,给手工业工人提供了坚硬而锐利的工具,从而就可以对青铜器进行更细致的加工了。春秋中晚期一种新兴的青铜工艺——镶嵌纯铜的工艺,就是在这种新的技术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以上各墓所出春秋中晚期铜器,虽有明显的地方特点,但其共同特征还是主要的。从种类而言,炊食器中,继承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的有鼎、鬲、盆、盘、豆等,新出现的有敦、带盖豆等。酒器中,继承上期的有尊、鸟兽尊、卣、壶等。水器中继承上期的有盘、盂、壶等。乐器中继承前期的有甬钟、钮钟等。兵器中盛行戟、剑及戈、矛。车马器中新出现盖弓帽。杂器中铜镜少见,新出现的有带钩。从器形而言,例如春秋中晚期的铜鼎大体分为无盖和有盖的两种:无盖的鼎,鼎耳或直立于口沿上,或旁生于口沿下;有盖的鼎都作附耳。鼎足一律作马蹄形,一般较为瘦长。春秋中期的鼎腹相对地较深,春秋晚期的较浅而呈现扁形。又如春秋中期的敦,腹皆作扁圆体,而春秋晚期的敦皆作球体。从



花纹而言,春秋中期沿袭上期的窃曲纹、重环纹、垂鳞纹,但结构已有所变化;春秋晚期则已不多见,且不居于器物的显著地位。春秋中晚期最盛行的花纹是蟠虺或蟠螭纹,多蛇(或龙)相互蟠绕,往往构成细密的宽幅画面,满布于器物全身。从铭文而言,其特点是:文体多用韵文,字体习用瘦长体,即所谓“玉柱体”,笔道纤细,往往故作波磔,有意求工,甚至任意增减笔画,或用鸟、虫装饰,成为极难辨认的“鸟虫体”。

中国铁时代的开始,也就是中国青铜时代的终结,这个分水岭可以放在公元前 500 年前后,虽然青铜礼器与若干青铜兵器的使用还要再继续好几百年之久。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很可能便是中国铁时代开始的政治上与社会上的结果,但即使到那时候青铜在兵器上仍有一定的重要性。在陕西临潼保护着秦始皇陵的兵俑便持着真正的青铜兵器。由此看来,中国青铜时代便是历史上的三代,从公元前 2000 年以前,一直持续到公元前 500 年以后。

西周末年,关中一带遭受到了战争和灾荒的严重破坏,周王室的实力已大大削弱。平王依靠晋文侯、秦襄公、郑武公等率兵护送才得以东迁,周天子的威信一落千丈。春秋初年,郑武公护驾有功,一度为王左卿士,子郑庄公则曾独霸王室权力。王畿之地本尚占有今陕西东部到豫中一带的地方,后来有些土地被一些诸侯国相继侵夺了去,仅局限于洛阳周围 200 来里的范围,不如中等的诸侯国。周天子失去了其天下共主的地位,大小诸侯不再听从天子的命令,也不再定期向天子述职和纳贡。周王室由于财源枯竭,不得不向诸侯“告饥”、“求金”、“求车”,而



逐渐成为诸侯大国的附庸,丧失了控制诸侯的能力。据《左传》记载,春秋时共有 140 余国。其中重要的是齐、晋、楚、鲁、秦、郑、宋、卫、陈、蔡、吴、越等国。由于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各国相互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一些小国成为大国的附属国,几个强国则为了夺取优越的政治经济地位,往往进行军事征战,胜者便取得霸主地位,实际上起到了“共主”的作用。这样的侯国春秋时期先后出现五个,即所谓“春秋五霸”。

齐国是春秋时首建霸业的国家。公元前 685 年,齐桓公即位,任用管仲为相,改革内政,发展经济,国力迅速强大起来。齐桓公打起“尊王攘夷”的旗号,积极从事霸业活动,曾打败侵燕的北戎,“存邢救卫”制止了狄人的侵袭,大大提高了齐国在中原的威信。当南方的楚国不断北侵时,齐桓公又举兵伐楚。公元前 656 年齐国迫使兵力强盛的楚国在召陵(今河南郾城东)议和订约,使楚北进的锋芒受到了挫折。公元前 651 年,齐桓公大会鲁、宋、郑、卫等国诸侯于葵丘(今河南兰考东),周天子也派人前往。这次盟会规定,凡同盟之国,互不侵伐,必须共同对付外乱,共推齐桓公为霸主。晋国是汾水流域的一个诸侯国。公元前 636 年,晋公子重耳在外流亡 9 年,备尝“险阻艰难”,在秦的援助下回国继位,是为晋文公。晋文公得位时已 62 岁,执政后任用有才干的赵衰、狐偃等人,推行改革,发展经济,扩张武力,从而使晋国出现“政平民阜,财用不匮”的局面。公元前 632 年,晋会合秦、齐、宋之军,与楚军大战于城濮(今山东鄄城西南临濮集),楚国战败。战后晋文公又大会诸侯于践上(今河南原阳),与会的有鲁、齐、宋、蔡、郑、卫、莒等国,并得到周王的策



命。晋文公成为中原霸主。晋文公在位期间,先后灭掉 30 多个小国,曾成为当时土地辽阔、兵力最强的国家。楚是江、汉流域的一个蛮族国家。公元前 613 年,楚庄王继位,以孙叔敖为宰相,整饬内政,兴修水利,国势更加强盛。公元前 606 年,楚庄王率军至洛邑的郊外,迫使周定王为他举行慰劳欢迎之礼,庄王问鼎大小轻重,暴露出北上称霸的意图。公元前 598 年,楚围郑,晋救郑。次年,晋、楚军战于檇(今河南武陟东南),晋军大败。公元前 594 年,楚又围宋达九月之久,宋向晋告急,晋畏楚而不敢出兵。从此,中原各国背晋向楚,使得楚庄王饮马黄河,称霸中原,“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可谓盛极一时。平王东迁,秦襄公因护送有功,被封为诸侯,周将岐(岐山东北)以西之地赐秦,使其自行从戎人手中夺取。秦在西方经过 100 多年的发展,至秦穆公(前 659 ~ 前 621)时“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吴、越都是长江下游的国家,春秋晚期时两国分别强盛起来。公元前 506 年,吴王阖闾用楚亡臣伍子胥率军伐楚,楚军大败,吴军直入郢都。公元前 494 年,吴王夫差出兵伐越,越王句践大败求和,请为属国。公元前 482 年,夫差大会诸侯于黄池(今河南封丘),与晋争当霸主。越王句践卧薪尝胆,集十年实力乘夫差北上会盟,出兵攻吴,吴军大败。公元前 473 年,越再次伐吴,夫差战败自杀,吴亡。句践灭亡吴后,率师北上,与齐、晋等诸侯会于徐(今山东滕县),一时号为霸主。礼者政之舆,春秋时期政治形势的变化必然会带来礼制的演变。周天子地位衰落,但名义上仍有一定的影响,诸侯争霸还不时打出“尊王”的旗号,人们对周礼还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有所保留。而强大的



诸侯尾大不掉,可对王室颐指气使;再后公室衰微,卿大夫夺权欺主,又不免会出现一部分礼典被破坏僭用的情形。还有春秋时因产生新的社会关系而可能存在原来周礼所没有的礼仪内容。总之,春秋时期周礼的演化是呈没落的趋势,其结局也就是当时孔子所愤愤然的“礼崩乐坏”的景致。

春秋时期“天子微,诸侯僭;大夫强,诸侯胁”,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经济文化和阶级力量发生了变化,政治形势的发展演变必然反映在物质文化面貌上。

春秋时期青铜器有一个显著变化,即王室和王臣之器急剧减少,列国诸侯和卿大夫的铸器增多。1950年以来,考古发现春秋铜器的国别就有吴、越、徐、楚、江、黄、莒、邓、蔡、陈、郢、宋、曾、邾、纪、齐、鲁、郑、虢、晋、燕、代等,各诸侯国铜器虽然也表现出明显的地方特点,但彼此间的共同性还是主要的。春秋早期青铜器基本上承袭西周晚期的体系。春秋早期纹饰与西周晚期相似,变化微小,早期偏晚出现了蟠螭纹。此时的铭文长篇甚少,铭辞书体也无显著变化。春秋中期纹饰仍沿用早期的窃曲纹、重环纹、垂鳞纹,但显得规矩和精丽。春秋晚期青铜器的情形略趋复杂,地区间的特点较之前二期为多。鼎的组合可分为专门烹饪的铍鼎,供席间陈设牲肉的升鼎及备加餐的羞鼎三类。每种器类之间,还有若干变化。春秋晚期的纹饰,以各种形状交缠的蟠螭纹和蟠虺纹占主导地位,往往构成细密的宽幅画面,满布于器物全身。纹饰总的风格倾向是追求精丽细密,繁缛为美。

侯马铸铜遗址,是东周时期晋国铸造青铜器的手工业作坊



址。位于山西侯马市西,侯马晋城遗址牛村古城之南。遗址面积约20万平方米,已发掘5000平方米。从出土遗物来看,这个铸铜遗址是春秋中期以来长期形成的。遗址内发现有居住址、窖穴、水井、道路、陶窑、熔铜炉、墓葬等,遗迹分布相当密集。遗址中出土有不少与铸铜手工业有关的遗物,如雕刻花纹用的骨质雕刀、青铜小刀,熔铜用的坩埚碎块,铸造青铜器的陶范及铜锭、铅锭等。陶范出土最多,总数达3万余块,其中有三分之一刻有各种装饰纹样,如夔龙、夔凤、蟠螭、蟠虺、云纹、雷纹、饕餮、环带、垂叶、贝纹、涡纹等,尤以前几种花纹的数量居多;有1000余块陶范尚可辨认器形,能够配对成套,复原器形的约有百余套,可辨器形的有鼎、豆、壶、簋、匜、鉴、舟、敦、匕、匙、铲、斧、刀、铍、钟、镜、带钩、空首布、车马饰、镞、镞等。陶范的制作有严格的要求。选用黄粘土和细砂,并含有一定数量的植物质,陶土可能还经淘洗,按一定的配比制作模、范和范芯。范制成以后,不仅要阴干,还要入窑烘烤,以排除范中的水分并使之定形。烤干后的陶范往往趁热浇铸,以免浇铸时爆裂。形制简单的铜器,一般用单范或合范铸造;比较复杂的器形则用复合范铸造,这时除了使用浑铸法(整体浇铸)外,附件与器身分别铸造的“分铸法”的应用更加普遍。侯马铸铜遗址的发掘,揭示了东周时代铸造青铜器时,要经过塑模、翻范、烘烤、合范、浇铸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春秋时期,青铜铸造工艺技术水平在前代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焊接技术的运用。春秋时许多铜器因形制复杂,都采



用分铸法。为了将器身和附件连接成一体,除用铸接(把预先铸好的附件嵌入器身范上,然后一次浑铸)的办法外,还普遍使用焊接法,用锡、铜、铅锡合金将附件直接焊接到器身之上。例如新郑铜器群中。焊接法不仅用于簋、簠之类的器耳,也用于鼎足。浙川下寺楚墓出土铜鼎的鼎足及一些附件,就是用金属锡焊接的。

(二)失蜡熔模工艺的出现。这种工艺是将易熔化的黄蜡制成蜡模,用细泥浆多次浇淋,并涂上耐火材料使之硬化,做成铸型。烘烤后黄蜡熔化流出,形成型腔,用以浇铸铜汁。下寺楚墓出土的铜禁和鼎表面的兽头及足、耳等附件都是用失蜡法铸成的,是迄今发现的我国最早的失蜡工艺的标本,年代属春秋晚期。

(三)模印法制范。在铸造用的范上,用模印的办法印出连续的花纹,每一印形成一个图案单位。在春秋中晚期盛行的蟠螭纹或蟠虺纹,都是用此法印铸的。

(四)镶嵌和线刻工艺的兴起。前者是指在青铜器表面镶嵌金属,使其因不同质泽而显现出花纹。这种工艺较早见于辉县琉璃阁甲、乙墓出土的扁圆形壶。春秋晚期的蔡侯墓铜器群中,更开始广泛使用,其中在敦、豆、缶、方鉴、四耳盘等共7件铜器上均用纯红铜镶嵌花纹,图案是龙纹界以菱形纹。错金银的技术也在该时发现,如晋国铜器栾书缶,除花纹外有错金铭文40字,工艺水平已经很高。后一种工艺,是用极锐利的锋刃在铸好的铜器上刻划成细如发丝的画像图案,内容多为宫殿建筑、宴乐歌舞,也有神话性质的人物或鸟兽。例如六合程桥二号墓中



发现的一件残品,镇江王家山东周墓出土的匜、盘、鉴等。

(五)吴越铸剑工艺。《周礼·考工记》说:“吴粤(越)之剑,迁乎其地,而不能为良,地气然也。”《庄子·刻意篇》,也提到“干(吴)越之剑”。可见,吴越所铸铜剑在当时是名闻遐迩的,今从考古上已经得到证实。对吴越铜剑进行的研究发现,铸剑时在剑的不同部分使用了不同成分的铜合金。如中脊用低锡或含铅较多的合金,提高其韧性,不易折断;两镞则用含锡量 19% 左右的铜合金,保证其坚硬锋利。山西原平峙峪出土的“吴王光剑”,剑身有火焰形的花纹;湖北江陵望山发现的“越王句践剑”,剑身有菱形的花纹。这些花纹不是突出的,究竟如何造成,存在不同意见:有人认为是硫化物腐蚀出来的,有人则认为是使用不同的铜合金嵌出的。这两把剑铸造得十分精美,已历时二千几百年,出土时不仅保持光亮不锈,而且可说是明洁如新,至今尤能断发,确实令人惊异。



七 林林总总、异彩纷呈的青铜器

68

中国是东方文明古国，我们的祖先给人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文物遗迹。制作精美、林林总总、异彩纷呈的青铜器，便是中国文物宝藏中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已发现的古代青铜器多得不可胜计。中国的青铜器不仅数量惊人，种类和用途也极为广泛。从礼器到兵器，从生产工具到生活用品，许许多多都是用青铜制造的。中国有句话，叫做：“地不爱宝”，意思是说土地不爱惜所蕴藏的珍宝，只要人们勤于探索，终究能发现它们。我们的祖国幅员广大，地下不知埋藏了多少珍贵的宝藏，其中当然包括大量的青铜器。这样众多的青铜器是怎样保存下来，又重新与世人相见的呢？中国古代青铜器，主要出土于古人的墓葬。墓中的种种青铜器物，有的是墓主人生前使用的用具，有的是祭



祀宴享时陈设的礼物,也有些是专为随葬制造的明器。古代的王公贵族,葬制极为奢侈,国家越大,家族越富,葬礼就越厚,随葬的玩好货宝、钟鼎壶鉴不计其数。身份较低的士和平民,他们的墓中也要随葬少量的青铜器。另一个来源是古代的窖藏。比如在出现战争动乱的时候,器物的主人仓皇出走,不得不把无法携带的青铜器埋入地下,准备在适当时机回来挖取。这样,便形成了青铜器窖藏。窖藏青铜器数量有时也很多,有时在一个窖穴里存放着一个家族历世铸造的器物。还有一些青铜器是在其他情况下保存的。古代建筑的遗址中,会发现青铜器的建筑装饰件和原来陈放于建筑屋内的器物;古代祭祀山川所用礼器,有时会在山端水底发现出来。一开始,有些重要的青铜器发现被人们视为祥瑞,看成一件大事。公元前116年夏,在现在的山西省汾水流域,发现了一件铜鼎。事情传到朝廷,汉武帝认为是祥瑞,因而把年号改称为“元鼎”。此后,在统治者心目中,青铜器常被当成祥瑞的象征。发现了青铜器,地方官员常把它上献朝廷,史书也将这种事记为一种“符瑞”。有见识的学者们并不同意所谓的“符瑞”的观点,而是对出土的青铜器进行客观的研究。汉宣帝时,美阳地方发现了一件有铭文的铜鼎,送到朝廷,大臣们大多数主张是重大的祥瑞,应该遵照武帝时的做法,举行隆重典礼。对古文字深有研究的张敞却力排众议,他对鼎铭作了释文,指出这件青铜器不过是周王奖赏其臣尸臣,尸臣铸器作为纪念的,没有什么特殊的神圣意义。

中国青铜时代的青铜器可以从好几个不同的角度来研究。它们可以而且也应该从它们固有的品质上当作技术和美术



来看和加以欣赏。它们的特别用途可以从它们参与的各种活动（如餐食、仪式和战斗）的背景上加以理解。青铜器也可以根据它们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上加以考察。从社会的意义来理解中国青铜的关键是三代的权力机构。代表青铜时代的中国文明要依靠当时物质财富的分配方式，而权力是用来保障财富之如此分配。中国青铜器便是那政治权力的一部分。

中国青铜器大致上可以分为礼器（包括烹炊、食器、酒器、水器四类）、乐器、车马器、兵器、工具、计量器和杂器等十类。其中以礼器最具有代表性。

（一）礼器

“礼器”也称“彝器”，是古代贵族在进行祭祀、丧葬、朝聘、征伐和宴享、婚冠等活动时举行礼仪所使用的器物。礼器又可分为炊器、食器、酒器、水器和乐器等。炊器有鼎、鬲、甗等；食器有簋和豆；酒器有爵、觚、觥、斝、卣、盂、尊、壶、觥、方彝等；水器有盘和盂；乐器有铙，是持柄敲奏的，有的是单个的，也有三五成组的。礼器是在古代繁文缛节的礼仪中使用的，或陈于朝堂，或用于宴饮、盥洗，有一些还是专门做来殉葬的明器。应该说明，古人日常饮食时，主要使用漆木器或陶器，很少用笨重的青铜器。青铜礼器带有神圣性，是不能在一般生活场合应用的。烹炊器主要有鼎、鬲、甗3种。鼎是青铜的最重要的器种之一，是用以烹煮肉类的器具。有三足的圆鼎和四足的方鼎两类。两者又分有盖和无盖的两种。无盖的，器耳立在腹壁上，叫立耳；有盖的，器耳多自腹壁外伸出，叫附耳。不同种类的鼎有



不同的名称,在文献和铭文里都有好多种,如方形的鼎就叫“方鼎”。鼎有很小的,也有极大的。有一件羸灵德鼎,高度不到四寸,铭文自称为“小鼎”。鼎中之王应推 1939 年殷墟武官村出土的后母戊方鼎,高 133 厘米,长 110 厘米,重达 875 公斤,形制非常雄伟,不但在中国,在世界考古学中也是最大的青铜器。殷墟侯家庄北冈 1004 大墓出土的牛方鼎和鹿方鼎,形制虽只有后母方鼎的一半大,但已经可以用来烹牛煮鹿了。《竹书纪年》载,周夷王三年,“烹齐哀公于鼎”,鼎可以用来烹人,作为刑杀的工具,一定也是很大的铜鼎。鼎的铭文有时很长,如现存中国台湾省的毛公鼎,出土于陕西岐山的周原遗址,属于西周晚期,铭文共 497 字,是青铜器铭文中最长的,鸿文巨制,不亚于《尚书》中的一篇文章。但是,不一定大型的鼎就有较长的铭文。有些大鼎,却没有任何文字。有一种成组的鼎,形制由大到小,成为一列,称为列鼎。列鼎的数目,在当时有标志所有者身份的意义。在礼书的记载中,有的认为天子用十二鼎,有的认为天子用九鼎。

自西周中期以来,丧葬制度发生了许多变化,礼器的组合与“列鼎”制度也随之变化。其中礼器组合的变化尤其明显。西周早期,埋葬情况大体与商代后期相差不多,这大概是“周因于殷礼”吧!从西周中期开始,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宗法等级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调整,从而在铜礼器上才逐步形成一套比较系统的制度。从西周早期以后,礼器中食器的比重逐渐加大,酒器则相对地减少。到了西周晚期和东周初期,最常见的礼器是鼎、盘、壶等 5 类,鬲、豆次之,酒器则居于更次的地位。根据



礼书的记载,当时的奴隶主贵族用鼎的数目因身份的高低而有多少的不同,从而形成了一套比较严格的用鼎制度。关于各级贵族用列鼎的数目,按其规定,大体说来,可以分为5等:一鼎是“士”一级用的;三鼎是“士”一级在特定场合下用的;五鼎是“大夫”一级用的;七鼎是“卿大夫”用的;九鼎是天子用的。但东周的国君宴卿大夫时也用“九鼎”。

簋是用来盛黍稷的,用簋的数目,往往与列鼎相配合,四簋都与五鼎相配,六簋与七鼎相配,八簋与九鼎相配。其他有关盘、壶等器的数目也都有相应的规定,不一一枚举。

(二) 食器

民以食为天。人离开饮食就不能生活,所以饮食是生活中第一大事。饮食情况取决于生产的发展和文化的高度。吃什么?怎样作法?怎样吃法?这都是很有讲究的、很有学问的。青铜容器首先是饮食器具。固然有些是仪式用器,但是它们在仪式上的作用是建立在它们在饮食上的用途之上的。总而言之,要研究青铜容器,我们就得研究古代中国饮食习惯。《论语·卫灵公》记载,卫灵公曾向孔子请教军旅之事,孔子回答说:“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学也”。事实上,中国士大夫阶级的一个很重要的资历是他饮食上的知识和技能。照《史记》和《墨子》的说法,商汤的宰相伊尹原来是个厨子。照有些资料上说,伊尹之所以能获得商汤的赏识,最初是由他烹调技术的高超。在帝王的宫殿里,厨房的重要性可以自《周礼》所记载的人员名册上充分地反映出来。在服务帝王居住区域的约



4000 人中,有 2200 多人,占 60% 以上是管饮食的。这些个专家所管的不仅只是帝王的口腹之欲而已,因为饮食还是非常严肃的事务。周代的《左传》和《墨子》都提到烹饪用的鼎是国家的最高象征。根据过去青铜容器各种分类以及文献中所记的饮食器具的名称,我们可以将饮食器具分为下面几类:1. 餐具:①炊具:鼎、鬲、镬、灶等。鼎、鬲和镬,大概是用于煮和炖的。②保存与贮藏器:这是贮藏粮食的瓮罐和腌制器具。若干酒器和水器也可能用于保存与贮藏。③盛食器:这一类器皿主要有 4 组:箸筷、勺子、盛谷类饭食的器皿和盛肉食蔬菜的器皿。2. 饮具:①贮水、酒具:用青铜、陶、木等制作。②饮酒具:用青铜、漆器和陶器制作。③盛水、酒具(勺):青铜、木制作。青铜器主要用于盛放谷粒作出来的酒。用盛肉食的两种主要器皿——笱和豆,都是用木头、编织物和陶器做的。它们在商代和周早期是不用青铜做的。在周代后期一度有青铜豆出现,但为数远不如陶豆和木豆的多,而且到汉初以后豆又恢复木制。

青铜酒器种类繁多。商朝人好饮酒。在商代青铜器中,酒器已经有五花八门的种类和形制。周初厉行限制饮酒,风气稍转,酒器的花样品种随之减少。商代酒器,最简单的组合是一爵一觚,用来斟饮。爵这种饮器的命名,是由于它的造型好像一只雀鸟。前面有流,好像雀喙,后面有尾,腹下有细长的足。古代“爵”字和“雀”字是同音通用的。爵和觚到西周早期以后就消失了。

作为饮器的青铜杯、樽出现很迟,其兴起约在战国中期,到汉代而盛行。樽有的还有温酒的作用。储酒器主要有尊、卣、



甗、方彝壶等器物。一组尊、卣或尊、方彝，在古代是尊贵的酒器，日常用词——“尊贵”之“尊”，就是由此引申而来的。水器之中，最常见的是匜、盘。古人盥洗时用匜浇注，以盘承水，所以盘、匜是互相配合的。盘有很大的面积，适合长篇的铭文。因此，古时常把盟约的文字铸在盘上，垂之永远。著名的西周时期青铜器散氏盘，有铭文 357 字，是散、矢两家转让土地、制定边界的契约。这便是文献讲到的铭文盘盂的实例。鉴也是重要的水器，或无耳，或有两耳、四耳，它是一种大盆，有三种用处：第一，盛水用以洗浴；第二，贮水用以照面；第三，盛冰即《周礼》所说的冰鉴。盘、鉴等青铜水器，内底每每铸有龟、鱼、蟠龙之类的花纹。北京故宫博物馆收藏的战国前期龟鱼方盘，底上有流水和鱼、龟等纹饰。可以想象，如盘中满贮清水，会显现出水波涟漪、龟鱼游动的生动景象。汉代流行一种圆形的水器，形状就像现代的面盆，称为洗，其内底也常常铸有双鱼的形象。

（三）兵器

军队是从事防御和进攻的武装力量，是靠武器来装备的。在侯家庄西北冈的一座商王陵墓中，发现有带秘的戈和成捆的铜矛层层迭放在一起，都数以百计。另外，还有六七种不同形式的铜盔数十具也堆放在一起。这表明商代的军队已用当时最先进的青铜器装备起来了。武器的种类，除戈、矛、铜盔以外，还有镞、大刀、钺等多种。商代大量饲养六畜，马已逐渐使用到军事上了。在殷墟发掘中，发现了不少车马坑。有的车马坑里，埋有车 1 辆，马 4 匹，人骨架 3 具，武器 3 套。这显然是军事上的一个



战车单位，表明商代的军队，至少已具有两个兵种，不仅有步卒，而且还有车兵。商王征兵的数目是很大的，商王武丁曾下令征兵 5000 人征伐土方；另一次，武丁在 3 个月连续征兵，在 38 天内，征兵之令七下，征兵总数竟达 23000 人之多。商对西部的羌方，也进行过长期的战争，有时出兵达到 3 万多人。殷纣王时，曾用 2 年的时间，倾全力去征伐东夷。据甲骨文记载，在战争中有一次就俘虏了 3 万人，可见战争的规模是相当大的。由于商代王室和大小贵族奴隶主垄断了青铜器的制造，当时的士兵都用青铜武器装备起来了。由于强化奴隶主专政的需要和战争经验的积累以及冶铸技术的改进，青铜武器的铸造很快发展起来。不仅种类繁多，数量庞大，而且形制也富于变化，制作技巧也不断提高。

商代盛行车战，因此青铜兵器的制作和使用多与车战联系紧密。商代的兵器按用途可分为远射兵器、格斗兵器和卫体兵器 3 类。最早的青铜兵器，出土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早商遗物，有远射兵器中的箭镞和格斗兵器的戈。商代进攻性兵器主要有镞、戈、矛、戟、钺、刀等。

商代的青铜武器，用途有了明显的分工。戈是中国青铜兵器最常见的一种，也是最具特色的。戈是从收割农作物的镰刀发展来的，其使用方法与镰刀相仿，是用戈援或啄、或钩，因而又号为“勾兵”。最早的戈是直接援的，然后在援下延伸出胡，加长了起杀伤作用的利刃。用于刺杀的有矛，即所谓“刺兵”。矛身也是双面刃，矛的上端有尖锐的“前锋”，可以向前直刺。把矛装在戈秘的上端，能钩刺两用。商周兵器质料以青铜为主，不过仍



有石、骨等质料的兵器。用于钩杀的有戈，即所谓“勾兵”。戈的“援”部有锋利的双面刃，可向前推搡，也可向后钩杀。为了使戈身牢固在木柄上，戈的尾部都有呈棒状的“内”，“内”上有孔以便绑绳；“内”、“援”之间有凸起的“阑”，以阻挡戈向后脱。商代的戈主要有直内、曲内和銎内3种。但是由于后来直内戈发展为短胡，短胡一穿、二穿，与銎内戈有同样优点，且其形制简易，便于铸造，故逐渐代替了銎内戈。用于斩杀的有斧，均作宽刃，形制有大有小，适于砍伐。安阳殷墟、山东益都和湖北盘龙城等地都出过大钺。这种大型武器，未必用于战场。益都大墓的墓室后壁并列两把大钺，象征后门的警卫；犹如《书·顾命》“一人冕执钺，立于西堂”，以炫耀威武。因此这些大钺上往往铸有狰狞的饕餮纹，显示统治者的无上权威。

刀因用途不同，形制有了分化：有的凸刃，有的凹刃，有的柄作环状，有的柄作兽头，有的刀背有扉，刀尖上翘。这些不同形制的刀往往都出于战车之上，确是兵器无疑。扉刀一般较大，有的长约80厘米、宽约12厘米，是用于砍杀的武器。

春秋战国之时，剑在战争中大量使用，社会上也盛行佩剑的风气，不仅军士佩剑，而且贵族、官吏甚至庶民亦佩剑。宝剑则被君王、贵族用作护身的佩剑。君王以佩剑为爱好，除护身外也常作为礼仪上必佩之物。当越王句践接见孔子时“乃身披赐夷之甲，带步光之剑，杖物卢之矛”，以表示礼仪上不可缺少的佩饰。越王剑有铭文的很多，无铭文的越青铜剑数量更多。自铸铭文的宝剑，象征镇国之宝。它代表一个国家、一朝君主。是越国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用于防御的武器有胄(头盔)和盾。殷墟西北冈 M1004 中发现的数十具头盔中,样式很多,大体作圆帽形,前额有兽面纹,后有护项,两边有护腮,顶有圆管直立,可插丝纓或羽毛,是保护头部用的。

除了上述青铜武器以外,还有一些复合武器和专门用作仪仗的武器。

商代的复合武器有两种:一种是青铜复合武器,即把两种青铜武器结合使用。河北藁城台西商代前期墓葬,曾发现一件戈、矛连装的武器。这种既可刺又可钩的复合武器,就是周代及其以后常见的戟。通过这一发现,把我国用戟的历史至少提早了约 300 余年之久。

另一种是不同质料合制的复合武器,前面已提到的藁城出土铁刃铜,就是用铁和铜合制的。用铜、玉(或石)合制的复合武器,在殷墟常有出土,但不少精品都已流出国外。在传世品中,还可见到一些用玉石镶嵌的青铜武器,制作非常精美。这些精致的武器,大概不会用于战场,多半是用作仪仗的。

(四) 金属货币

我国的金属货币(即铸币)究竟起源于何时,目前还是个谜。安阳大司空村曾经发现三枚铜贝,但数量太少,还不足以说明商代已有铸币。战国时通行的布币与刀币,其最早的来源可以追溯到商代。《国语·周语》中有周景王二十一年(前 524)“铸大钱”的记载。春秋时期,以工商业官营为主,但也出现了像郑国弦高那样的大商人。金属货币的出现,是商品交换发展的



必然结果。春秋中晚期,商品生产已经发展到比较高的阶段,商品的交换也有了相应的发展,从而铸币就产生了。在侯马晋国都城的铸铜遗址中发现了铜币——空首布。这里不仅发现了空首布的成品,更重要的是发现了大批的空首布内范。这样就直接证明了至少在春秋晚期,晋国已经有了铸币。空首布的形制都作尖肩尖足,长柄方釜,釜上大下小,内范呈现楔形;一般通长 13 厘米,素面,背面有三条垂线纹。其中有一件铸有铭文。这种空首布在河南汲县山彪镇第 1 号大墓中曾经发现 674 枚之多,其形制与侯马出土的相同。这种空首布,按其形状、大小、重量,是一种专门铸造并且已经具备一般价值尺度功能的货币了。空首布这种货币样式最早大概是从商代和西周的一种青铜工具——镈(铲子)演变而来。因为镈、布古音相同,于是这种金属货币借用了“布”的名称。

(五) 青铜镜

我国何时开始有铜镜,向来为中外学者所关注。一般认为,中国的铜镜出现较晚,大约在战国时期。现在通过考古发现,把我国使用铜镜的历史至少提前了三四个世纪。考古发掘中,早已有了更早的有关铜镜的材料。例如河南浚县辛村西周早期墓中,就曾经发现了一件铜“镜面”,虽然无光,面平而不凸起,显然具有铜镜的特征。比这再早,就是河南安阳侯家庄商代墓中发现的那件所谓“圆形片”了。这件背面有钮的铜片,主持侯家庄殷墓发掘的梁思永先生曾经推测它是镜。后来在安阳小屯墓中出土的 4 面铜镜,形制均与此相仿,证明梁思永先生的推测



是很有见地的。这 5 面铜镜的发现,把我国用镜的历史提前到了商代末期。

当时青铜铸造的新产品中,首先应该提到的是在三门峡市上村岭虢国墓中发现的我国较早的 3 面铜镜。第 1650 号墓出的两件都有弓形钮,但没有纹饰。第 1612 号墓出的一件,其背面有虎、鹿、鸟纹,构图简略而生动,别具风格。铜镜是一种生活用具,它的出现表明在当时的青铜工业中不仅铸造礼器、武器,而且有了生活用品的铸造。



八 星罗棋布、百花齐放的青铜文明

80

华夏族以外的青铜器也是中国整个青铜文明的一部分。中原地区以外的古代边远部族铸造的青铜器，有着浓重的地方风格和独特的形式，也体现了与华夏族之间的文化交融。商周时期，在中原地区以外的中国其他地区，有一些与中原青铜文化既有联系、又颇具地域特征的青铜文化。这些文化遗存主要有长江上游的三星堆文化、长江中游的楚文化、长江下游的吴越文化、长江下游的湖熟文化和马桥文化、北方地区的夏家店上层文化、河西走廊地区的四坝文化、赣江流域的吴城文化以及几处周边地区的方国青铜文明。



(一) 吴越青铜文明

“吴王夫差鉴”出于山西代县蒙王村；“吴王夫差剑”出于湖北襄阳蔡坡和河南辉县琉璃阁；“吴王光剑”出于山西峙峪；“吴王光鉴”出于安徽寿县蔡侯墓；“越王句践剑”出于湖北江陵望山等。由于交往、嫁女、出亡以及战争等原因，这些著名的吴越铜器传到吴越以外的地区。这些铜器的形制，大体与中原地区的相似，而“吴王光剑”的火焰状花纹和“越王句践剑”的菱形花纹，却表现出明显的地方特色。这两把铜剑铸造都十分精美，剑锷锋芒犀利，银光闪耀，保存如新，至今尤能断发，代表了吴越青铜工业的高度水平。建国以来收藏的春秋战国时期越国的青铜兵器，总数 50 多件，其中剑 18 件、矛 20 件、戈 2 件、矢鏃 13 件。绍兴文物部门收藏的越国青铜剑 20 多把，即以“越剑”为例，可见越国高超的军事工业和铸造技艺。春秋战国之时，剑在战争中大量使用，社会上也盛行佩剑的风气，不仅军士佩剑，而且贵族、官吏甚至庶民亦佩剑。宝剑则被君王、贵族用作护身的佩剑。君王以佩剑为爱好，除护身外也常作为礼仪上必佩之物。当越王句践接见孔子时“乃身披赐夷之甲，带步光之剑，杖物卢之矛”，以表示礼仪上不可缺少的佩饰。越王剑有铭文的很多，无铭文的越青铜剑数量更多。自铸铭文的宝剑，象征镇国之宝。它代表一个国家、一朝君主，是越国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剑这种兵器是由远古的生产工具演变而来，经历过石制兵器、青铜兵器、铁制兵器的发展过程。西周至春秋时期兵器中最



为突出的是剑的出现。西周的青铜剑较短,在战争中不起决定作用。其他如戈、矛、铍等兵器都有改进,以加强杀伤能力。到了春秋列国,战争频繁,促进了兵器铸造业进一步发展,春秋时期青铜剑的剑身加长了,刃部锋利,装饰华丽,涌现了许多精湛的工艺。特别是吴、越两国相互攻伐数十年之久,促使越国铸剑工艺迅猛发展。众所周知的“越王句践自作用剑”于1956年12月在湖北江陵春秋战国时代楚国郢都纪南城遗址7公里处望山一号墓出土。这是一柄装在素漆木剑鞘里的青铜宝剑。全剑长55.6厘米,剑身长47.2厘米,把长8.4厘米,剑格宽5厘米,重857.4克,柄上缠以丝绳,又称为“缯”。剑格两面嵌以蓝色琉璃,整个剑身满饰菱形暗纹,出土时剑身插在素漆木鞘内,深埋2400多年而不锈,出鞘时寒光闪闪,毫无锈斑,剑身一面近格处有美丽猷劲的鸟篆铭文两行八个字。此剑的出土曾轰动全国乃至世界。据《越绝书》记载:“昔者,越王句践有宝剑五,闻于天下。”分为大型三、小型二。一曰湛庐,二曰纯钩,三曰胜邪,四曰鱼肠,五曰巨渊。而胜邪、鱼肠、湛庐三剑已为吴王阖庐所得,并以鱼肠剑刺死吴王僚,湛庐剑后又为楚王所得。后来,秦王闻而求之,不能得,因而兴师动众击楚国,楚王不从。又记载楚令风胡子到吴国去请欧冶子、干将铸铁剑——龙渊、泰阿、工布三枚,晋郑王闻而求之,未能得到,兴师围楚城三年不解。由此可见各国君王竞相争夺的武器,就是越国的宝剑。越王句践还把宝剑作珍贵礼品馈赠与吴王及贵宾。越国宝剑在当时身价高贵。欧冶子、干将与莫邪等良工巧匠能用几种不同成分的青铜合金熔铸或嵌铸成器,不但注意装饰性,同时也提高其实用效



果。青铜剑集冶炼、铸造、绘画、书法、雕刻于一身，融政治、经济文化于一体，是丰富多彩、独具特色的越国青铜文化的最高成就，也是中国古代兵器中的“奇宝”。

1982年3月绍兴坡塘乡狮子山306号墓中出土的伎乐铜屋模型可谓越国青铜器的绝妙之作。它高17厘米（其中图腾柱高7厘米），面宽13厘米，进深11.5厘米。屋平面接近正方形，3开间，明间较次间宽0.3厘米。正面敞开，无墙、无门；立圆形明柱两根。东西两边为长方格透空落地式立壁。北墙在中心部位设宽3厘米、高1.5厘米的方形小窗，分成四格。屋面呈四角攒尖顶，中立图腾柱，顶端立大尾鸮。屋下有四阶。屋顶、后墙及四阶均饰方形结构的勾连回纹，图腾柱通体饰S形勾连云纹。室内跪有乐伎6人，分前后两排分别为鼓师、吹笙、琴师和两个跪像。这件独一无二的铜屋其形制独特，大体与南方庙堂建筑格局相似，即平面接近方形，内部厅堂式的宽敞空间，外有四阶，室内地面高于室外，似为高台建筑。屋顶树立的图腾柱，呈八棱形柱，顶端置一大鸮，认为与图腾有关。越先民有崇拜鸟图腾的习俗。屋内跪坐的几种乐人，均作跣足跪坐状，前排置一鼓架，上悬一腰形鼓，东一人面向西，右手执槌击鼓，左手作节拍状，应是鼓师兼作指挥；前排中、西两人面向南，双手交于腹部跪坐而歌，后排三人均面向南而坐，东一人手捧笙，正在吹奏，中一人膝上有一长条形四弦琴，右手执一小棍，作击筑状，左手抚弦，正在演奏，西一人膝上亦放有一四弦琴作弹拨状。六人都赤身露体，不见衣饰。因此，有人认为有悖于中原礼仪，有人却认为正好反映未驯野性的“越之常性”。其他如歌者形态、装束，



歌女束发于顶，男的四人结发于脑后，以及所持乐器等皆有浓厚的越民族风格。铜器上所饰勾连纹、云雷纹、S纹均为越器常用纹饰，具有鲜明的越文化特点。伎乐铜屋的发现为研究越国文化，如青铜冶铸技术、“文身断发”等习俗、建筑结构、装饰以及音乐、乐器等多方面提供了十分丰富而珍贵的资料。

（二）巴蜀青铜文明

巴蜀大地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之一。在古代，巴、蜀是族名、国名，后来又作为地名。今日之四川和重庆在古代主要是蜀郡和巴郡的疆域，所以被称为巴蜀，至今仍然以巴山蜀水、巴蜀大地来代表四川。从文字记载来看，确切可知的蜀人的历史是从商王武丁时期（约当公元前13世纪末叶）开始的。蜀人最早的活动也就是蜀人的发祥地并不在今天的川西平原，而是在平原西部的岷山山区——岷江上游流域。据古史传说记载，继蚕丛氏之后王蜀的为柏灌，该部落应系以柏灌鸟为族名的部落。在传说中，柏灌的史迹缺乏记载，仅知其为继蚕丛之后治蜀的第二代蜀国统治部落。继柏灌氏之后统治蜀的是鱼凫。鱼凫即鱼水鸟，民间俗称鱼老鸱，以善于捕鱼而闻名，因而在古代四川长期为渔人饲养作为重要的捕鱼工具。从四川汉代画像砖石上常见到以鱼水鸟捕鱼的情景。捕鱼能手鱼水鸟因此被视为神鸟而受到鱼凫部落的特别尊崇，以至于以鱼凫为部落名号。自鱼凫之后统治蜀的为“杜宇”。

巴蜀文化很早就接受了中原地区商周文化的影响，同时又



影响了其南部的夜郎、滇以及西部的邛笮、冉駹等少数民族的文化，形成了沟通古代黄河流域文化与西南边疆文化的桥梁。巴蜀青铜器向以制作精美，神秘奇诡，具有显著的地方特色和独特的艺术魅力而著称。特别是近年来四川广汉三星堆蜀国遗址的重大考古发现，震惊了世界，被誉为“比有名的中国兵马俑更非同凡响”，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神秘而辉煌的青铜艺术宝库，揭开了中国古代青铜文化新的一页。

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史籍里，对于僻处西南一隅然而却称雄称长的古蜀王国的记载，可以说寥若晨星。由于历史记载的稀少，使本来就知之不多的古蜀历史又披上了一层更加神秘的面纱。从三星堆发掘出土的文物来看，古蜀王国原来是一个拥有灿烂青铜文化的文明古国。三星堆遗址的发掘，揭示出了商代蜀王国的王权与神权之谜及古蜀神秘王国的面纱。20世纪80年代中叶（1986年7月25日）的中国川西平原的三星堆遗址考古发现，给我们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这一天，天大的奇迹出现了！金杖、黄金面罩、青铜人头像、玉璋、玉戈和象牙等400多件珍贵文物，异彩纷呈地出世了！那纯金卷包的金杖，长1.42米，净重约500克，其上平雕有戴冠的人头、鸟、鱼图案，这在我国尚属首次发现。那黄金面罩，则与常人面庞大小相当，眉、眼、口部镂空，鼻梁突出。那13件青铜头像，与真人头部一样大，空心铸造，头戴平冠，高鼻阔目，耳大颐丰，表情各异，在我国也是首次发现。另有数十件青铜面具、青铜人坐像、青铜龙头、青铜虎，一大批青铜礼器、玉器、兵器，10多根亚洲象牙。其出土的青铜头像造型独特，线条优美流畅，比例适当，表现准确，在雕塑艺



术和铸造技术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令人惊奇的是，离此发现不到一个月，在离它二三十米远的地方，又发现几个青铜人头像和面具。考古学者随即循踪挖去，花了30多个昼夜，又发现一座长5.3米、宽2.3米、距地表深约1.55米的“宝库”。这里有一尊2.62米高的青铜人像躺卧着，它那巨大的双手似乎在拥抱周围那一大堆价值连城的黄金面罩、六七十根约1米长的象牙以及罕见的青铜人头像、青铜面具、青铜鸡、青铜蛇、青铜鸟、青铜铃、青铜树与玉器等瑰宝。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广汉县城的西北部，遗址发现于1929年，1980年~1981年进行大规模的发掘。以三星堆遗址作为典型文化遗存的“三星堆文化”，其公布范围以成都平原为中心地区，西起汉源、雅安一线，东到长江三峡两岸，北到陕西汉中，南到长江两岸。

1986年12月10日，《光明日报》记者激动万分地报道：“迄今我国发掘的数量最多，型体最大的古代青铜雕像群——四川广汉县三千年前青铜雕像群室内清理工作已经展开……这个青铜雕像群和与它们同地点出土的数量众多的其他重要文物的发现、清理，对研究中国巴蜀地区青铜器时代的历史提供了罕见的实物资料，填补了中国青铜艺术和文化史上的一些重要空白，其中最大的青铜人头像，是我国所发现的商周时代最大的青铜制品之一。已清理出的十几个青铜人头像中，尚未发现用同一模子制成的形象相同者，这说明三千年前的我国古艺术家之青铜雕塑技术已十分成熟。”

距今三四千年以前，在今天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先蜀文化



的废墟上，耸立起一圈坚固而厚实的城墙，城墙外围掘有深深的壕沟。城圈内分布着密集的生活区、手工业作坊区、宫殿区，出土大批玉石礼器、容器、陶塑工艺品和雕花漆木器。在南城墙外的两个大型“祭祀坑”内，发现数以千计举世罕见的诸如纯金制品、大型青铜器群、玉石器、海贝和象牙等宝藏。几乎同一时期，在成都也出土了大型木结构宫殿建筑群，发现青铜器和玉石器。在三星堆和十二桥出土的一些器物上，还赫然醒目地刻划着一些图符甚或可能属于早期的巴蜀文字。这一切，都确凿无疑地表明，城市、文字、青铜器和大型礼仪中心等各个文明要素，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标志着古蜀文明时代已经来临。

巴和蜀是中国古代生活在今天四川地区的两大部族。殷周之际，蜀族以今成都一带为中心，巴族以今重庆一带为中心，先后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于是“巴”和“蜀”就成了国名。公元前316年，秦国出兵灭掉了巴蜀，在这里设置了巴郡和蜀郡，这样“巴”和“蜀”又成了地名，并且一直沿用至今。巴蜀青铜器，是古代巴蜀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以显著的地方特色和独特的艺术魅力闻名于世。而对它们的了解与鉴赏，也是余味无穷，可以唤起人们对悠悠远古的向往。据不完全统计，巴蜀青铜器出土地在四川已近百个县市，除开川西北高原山地之外几乎遍及全省。在临近省区，鄂西、湘西、陕南、甘南及贵州、云南靠近四川的地区亦有发现。在四川省内，巴蜀青铜器出土比较多的区域主要在成都平原，以及成都——重庆——巫山一线。成都平原气候温润，土地丰腴，适合古代先民居住，而川东与川西之间



沿长江、岷江流域的交通,自古为民族迁徙的重要路线。到目前为止,四川省巴蜀青铜器出土与收藏总量已达到数千件。根据已有的资料,大致可以分为三期:

第一期商周时期,以广汉三星堆遗址、新繁水观音遗址及彭县竹瓦街遗址为代表。广汉三星堆两个商代祭祀坑出土各类文物达千件,其中有中国目前数量最多、形体最大的青铜雕像群。最大青铜立人像连座高在260厘米以上,头顶高冠,身着华服,浓眉大眼,尖耳宽唇,双手握成圆筒状,赤足而立;最大的铜面具高65厘米,宽138厘米,双眼瞳孔呈现柱状外突达16厘米;54尊人头像造型生动,神态各异。另有高380余厘米的铜神树,枝干挺拔,树上硕果累累。

第二期为战国中期,以新都马家乡出土的铜器最为重要。文化内涵既有巴蜀传统也含有部分楚文化及中原文化的因素,铸制精致的“邵之食鼎”即为楚器。至此,具有独特风格的后期巴蜀文化已基本形成。

第三期为战国后期,少数可晚至西汉初年,比较集中的出土地点有涪陵小田溪、成都西郊百花潭及犍为、峨眉等处。巴蜀青铜器与中原相比有明显不同,中原商周礼器以鼎、簋为主,尤其西周以后,鼎与簋的数量还依据主人的身份不同而有严格的规定,如九鼎八簋、七鼎六簋、五鼎四簋等。但在巴蜀,以鼎为代表的三足器则少有出土。三星堆的铜器绝大部分系首次出土,其青铜面具、人像、立人、神树等诡奇神秘,不仅在国内其他地区,而且在巴蜀文化遗存中也缺乏相似的铜器。兵器在巴蜀青铜器中数量最多,形制也尤具特色,这大约与史载巴蜀之民“多



悍勇”有关。巴蜀兵器最常见的是戈、剑、矛、钺。巴蜀青铜给我们带来了意外的收获,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诸多令人费解的谜团。当读者朋友看过下面这些奇迹之后,不知会作何感想?

1. 金杖之谜

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的1柄金杖,极为引人注目。这柄金杖是用较厚的纯金皮包卷而成的金皮木芯杖,杖长142厘米,直径2.3厘米,净重500克。杖的上端有一段长46厘米的平雕纹饰图案,分为3组:最下一组线刻两个前后对称,头戴五齿高冠,耳垂系三角形耳坠的人头。上面两组图案相同,下方为两背相对的鸟,上方为两背相对的鱼,鸟的颈部和鱼的头部压有一穗形叶柄。这柄金杖,由于它与大量青铜礼器、青铜人头像、人面像、玉石器、象牙、海贝等巨大的物质财富同出一坑,也由于用杖象征权力这一司空见惯的文化现象,因此人们很容易把它称为“王权杖”,或简称“权杖”。三星堆文化时期的古蜀王国,是一个实行神权政治的国度。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大量青铜器、青铜礼器、黄金面罩,无一不与宗教息息相关,本质上都是神权政治的产物。因此很明显,出土于一号坑内的金杖,实际上就是一柄标志着王权、神权和经济、社会财富垄断之权的权杖,为古蜀王国政权的最高象征物。

古蜀王国用金杖标志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力,这同中原夏、商、周三代的最高权力标志物——鼎是全然不同的。根据古文献记载,中国夏、商、周三代王朝都用“九鼎”象征政权,在历史上形成了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根据记载,中原王朝也用杖,



《礼记》和《吕氏春秋》中曾讲到用杖的事,称为“几杖”,但它与古蜀国的“权杖”用途迥然不同,因为它是由王朝授予70岁以上大夫退休的官员,以示尊荣,却无半点权力可言。

同中原王朝用鼎不用杖相反,古蜀王国正好是用杖不用鼎。在有关古代蜀人史迹的文献材料中,丝毫没有用鼎的片言只字记载。三星堆遗址中,虽然出土有商文化常见的青铜尊、罍等器物,却绝无鼎出土。无论在古代蜀人的观念还是实际政治生活中,鼎是无足轻重的,不把它当作权力与财富的象征。

三星堆金杖上端的三组人、鱼、鸟图案,说明金杖既被赋予着人世间的王权,又被赋予着宗教的神权,它本身既是王权,又是神权,是政教合一的象征和标志。金杖上的人头像,头戴五齿高冠,耳垂三角形耳坠,与二号“祭祀坑”所出土蜀王形象造型——青铜大立人相同,表明杖身所刻人头代表着蜀王及其权力。鱼、鸟图案的意义在于,鱼能潜渊,鸟能登天,它们是蜀王的通神之物,具有龙王的神化般功能。而能够上天入地,交通于神人之间的使者,正是蜀王自身。所以,金杖不仅仅是一柄王杖,同时也是一柄神杖,是用以沟通天地人神的工具和法器。

2. 雕像之谜

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内出土了大量青铜雕像,分为人物雕像、动植物雕像等两大类。其中,青铜人物雕像有82尊,包括各种全身人物雕像、人头;动植物雕像包括鹰、鸟、鸡、蛇、夔、龙、凤等造型,还有3棵青铜神树,高达3.5米以上。

三星堆出土的这些青铜人物雕像、青铜神树以及黄金面



罩,不但在古代巴蜀地区,而且在夏商时代的整个中国范围内,都是前所未闻的。不论文献还是考古资料,都丝毫找不到这些文化因素的来源,也丝毫找不到它们发生演变的任何序列痕迹。从雕像人物的面部形态上看,三星堆青铜人物雕像中除开那些具有典型西南夷特征的形象外,高鼻、深目、颌下留一周胡须等特征给人以深刻印象。这类人物,不仅与同出的西南夷雕像面部特征不同,而且与成都指挥街发现的扁宽鼻型的土著居民人头骨的特征不同,也与商代和商周之际华北长江中下游的各种人面像不同。显然,此种风格的人物面部形态造型,来源于中国以外的文化。三星堆一、二号坑出土的数百件青铜人物雕像、人头像、人面像、兽面像,各种各样的动植物雕像以及黄金面罩、青铜神树等,五光十色,光怪陆离,构筑成一个阴森、威严、凝重、恐怖而又庄严肃穆的巨大青铜世界,处处充溢着令人望而生畏的神秘王国氛围。

3. 神树与众帝

三星堆出土的3棵青铜树,两大一小。树座呈圆型,有的座上还有武士形象的铜人雕像。背朝树干,面向外下跪,俨然一副虔诚的神树守卫者形象。青铜神树上,有茂盛如锦的枝、叶、花卉、果实,还有飞禽、走兽、悬龙、铃等挂饰。从它们的形态看,有可能就是所谓“建木”,是著名的神树。三星堆位于成都平原中部,出土的青铜神树在形态上大体与文献所说“建木”相合,而且因为用铜制成,枝叶中有铜制的铃,所以能够“呼而不响”。又因神树置于高高的城墙之上,自城下望见,即使日当午



时,也能够“日中无影”。并且,三星堆古城为蜀王之都,是古蜀国的神权政治中心之所在,所以又被称为“天地之中”。可见,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极有可能就是所谓建木,也就是蜀人的天梯。古蜀文化具有强烈的扩张性或辐射性。在商代蜀汉历史文化区的基础上,又继续沿嘉陵江向北延伸;西周时期,强烈地浸染并影响了渭水上游文化。在成都平原西南,越过边缘,便是青衣江流域和大渡河流域。当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明刚刚确立不久,便开始了向青衣江流域的移民和扩张。

(三) 荆楚青铜文明

楚国是南方一个大国。从考古发掘的材料可以看到,楚国类型的文化以湖北省江汉平原为中心,北到河南南部,东到安徽中部,南达湖南的资兴、郴县。国都初在丹阳(今河南淅川县),1978年到1979年在淅川县丹江水库西岸的下寺发现了一批春秋中期楚国贵族墓葬,出土一件鼎,其上有王子午的名字。王子午即楚康王理的令尹(相当于中原国家的执政卿官)子庚。在下寺东北不远处有一座长900米,宽400米的古城,很可能就是楚国最初的都城丹阳。

楚文化因楚国和楚人而得名,是周代的一种区域文化。它同东邻的吴越文化和西邻的巴蜀文化一起,曾是盛开在长江流域的三朵古区域文化之花。当楚文化迹象初露之时,它只是糅合了中原文化的末流和楚蛮文化的余绪,特色还不多,水平还不高,几乎无足称道。春秋中期是楚文化际会风云之时,从此,



它便领异标新,而与中原文化竞趋争先,还有后来居上之势。

根据现有的资料,楚文化有六个要素:其一,是青铜冶铸工艺;其二,是丝织工艺和刺绣工艺;其三,是髹漆工艺;其四,是老子和庄子的哲学;其五,是屈原的诗歌和庄子的散文;其六,是美术和乐舞。

滥觞期的楚文化,从青铜器看,属于周文化的范畴。楚文化的滥觞期,始自西周早期,楚国始封之时,迄于两国之交,楚国将盛之际,历时近三个世纪。周成王把鞭长莫及的一块蛮荒之地封给熊绎,只是对既成事实的认可,而且不无画地为牢之意。熊绎的部众在睢山、荆山之间的穷乡僻壤耕垦,过着古朴的生活。熊绎对周天子应尽的职分,主要有列三项:其一,是守燎以祭天。楚人崇奉火神,他们的酋长是正统的火师。为祭天而守燎的火师,要通晓巫术,善于做神与人之间的媒介。其二,是贡苞茅以缩酒。由巫师主持,办法是在地上先铺一层茅,在茅上加铺一层沙,把酒泼在上面,让它经沙和茅的过滤下沥,也算是“象神歆之”。其三,是贡桃弧、棘矢以禳灾。桃弧即以桃木为弓,棘矢即以棘枝为箭,都是用来驱恶鬼、除邪祟的。

楚人长期在睢山和荆山之间拓荒,生计是相当艰难的。楚人少国小,但带着华夏的先进文明而来,如一颗良种落进了南土的沃壤。楚人在睢山与荆山之间,度过了大约一个半世纪惨淡经营的岁月,就显出了转弱为强的势头。熊绎五传至熊渠。熊渠以胆气和勇力著称,在江汉之间很得人心。趁着周夷王时中原动乱的良机,征讨蛮夷,扩大了楚国的疆土,揭开了吸收蛮夷文化的序幕。楚文王元年(前689)迁都到郢(今湖北江陵县纪



南城),这座古城遗址比丹阳龙城规模宏大,东西长9里,南北宽7里,面积达40平方里。

楚文化的主要来源可推到祝融,祝融部落集团属崇火尊凤的原始农业文化,它左右着楚文化的发展方向,楚文化的干流是华夏文化,楚文化的支流是蛮夷文化,三者交汇合流,就成为楚文化了。楚国有比较发达的采矿业。在湖南麻阳县九曲湾发现了春秋时楚国开采的铜矿井五口,由山顶开口,顺矿脉走向,采用斜井法开采。井宽2米~4米,高1米~1.5米,用15厘米~20厘米直径的圆木作井中支柱,以保证安全。矿井内还发现当时采矿用的各种工具。湖北大冶铜绿山铜矿是楚国重要的铜产地,在春秋时就开始开采一直延续到战国时期。从留下的炼渣估计,这里开采矿石达40多万吨,可炼铜10多万吨。地下开采用竖井、斜井、斜巷、平巷相结合,初步解决了通风、排水、提升、照明和井架支护等一系列复杂的技术问题。在炼铜时用竖炉,高1.2米~1.5米,可以断定属于春秋时期的炼铜竖炉就有3座,竖炉炉身升高就是炼铁的高炉。楚国铜质优良,是制造兵器的好材料,禁止外流。鲁僖公十八年(前642)郑文公到楚国,楚成王高兴之下送给他一些铜,后来又反悔,于是与郑文公相约:不准用这些铜造兵器,郑国只好用它铸造乐器。

历经商代和西周,下至春秋早期,楚人的青铜冶铸工艺是从中原学来的,春秋早期以前限于客观条件,水平比中原低得多。不仅如此,春秋早期以前,在青铜冶铸方面,楚人甚至也赶不上越人。湖南安仁县的何古山新石器时代遗址,所出器物有越文化特征,其中发现了青铜管和青铜牌。这个遗址的年代,



与中原的商代相当。由此可见,早在商代,当地的越人已掌握青铜冶铸技术了。湖北大冶县的铜绿山,最迟从周初起,就是一个产铜基地。以铜绿山为中心,北至英山县,南至通城县,西至武昌县,东至黄梅县、阳新县和江西九江市,已发现数十处古文化遗址。上起新石器时代,下至春秋战国之际,从文化内涵看,主人应是越人。在铜绿山东北坡春秋时代炼铜遗址中发现的大量陶器残片,也有越文化的特征。扬越的青铜冶铸技术,最初可能是向殷人学来的。商代,殷人南进,跨越大别山,渡过长江,经过洞庭湖,把他们的青铜文化带到了南方。

楚国的青铜冶铸业,在熊渠时,由于一度进兵到包括铜绿山在内的鄂地,打开了原料的来源,获得了初步的发展。从武王和文王起,灭亡周围列国渐多,又掳掠了不少铜器。然而,楚国青铜冶铸业的突飞猛进,却是在成王时。成王奋武、文王威服汉阳诸姬之余烈,北收弦、黄,控制了大别山南北的通道,铜绿山和附近地区就落进楚国的势力范围中去了。上古的青铜生产,铸造与冶炼通常不在一地,即采掘之后就地冶炼,冶炼之后易地铸造。楚国占领铜绿山和附近地区之后,生产出大量优质的青铜器,使自己成为当时生产青铜器最多最好的一个国家。从这时起,楚王就阔绰起来了。成品与原料同步增长,楚国冶炼的红铜锭多了,它铸造的青铜器就也多了。丰富的铸造实践,使得楚人在铸造工艺上迅速进步,以至超过了北方的中原地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楚文化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史记·楚世家》记楚庄王观兵于周郊,问九鼎的大小轻重,扬言:“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周室的九鼎象征着王统和国祚,可谓宝



之尤宝者，诸侯是不应该去打听它们的大小轻重的。楚庄王居然要问，可见他自信已有足够的力量去实现五世祖——熊通的未遂之志——“观中国之政”了。那时，铜的多少与国的强弱大致成正比。楚国产铜最多，楚庄王因而志骄气盛。假使当真把楚国所有的戈喙都折下来，铸九鼎大概是不成问题的。楚庄王以后，约当春秋中期与晚期之际，楚国的铜器生产，从采掘、冶炼到铸造、焊接，都已超越华夏和吴越，居于列国之首了。铜绿山古铜矿，是我国现已发现的年代最早、规模最大而且保存最好的古铜矿。楚国的铜锡资源可谓得天独厚。铜多、锡多，铸造技术又高，楚国的青铜生产自然领先于列国了。

成王中叶以后，楚国在青铜冶铸方面具备了特殊优越的条件，加以楚人的审美心理倾向于纤丽奇诡，他们的铸造匠师能发明失蜡法或漏铅法是不难理解的。在楚文化的茁长期，从世界范围来看，楚国青铜铸造工艺的水平是第一流的。

楚国的贵族所用礼器分铜礼器和陶礼器两大类。贵族墓葬所用的礼器，主要是铜礼器。河南淅川下寺1、2、3号楚墓所出的铜礼器，林林总总，异彩纷呈，令人目不暇接。鼎居铜礼器之首。楚国的鼎有富于个性的形态，以致我们可称之为楚式鼎。春秋早期的楚式鼎，仅见于赵家湖的楚墓，是稍有点楚化的周式鼎。然而，进入春秋中期以后，此型鼎由不束颈变为束颈，由不折肩变为折肩，足渐高，壁渐直，有些还加了圈顶盖，全器轮廓由简单变为复杂，体态由浑朴变为精巧，与中原风格大异其趣，形成了名副其实的楚式鼎。升鼎器型最特殊，体形较高大，折沿，立耳外撇，束腰，浅腰，平底，蹄足。腹周有攀附兽六只或四



只,作等间距排列,首近沿,尾近底。升鼎在各型楚式鼎中不但形制独异,而且地位突出。通常组成列鼎,成奇数,多寡与墓主等级的高低相称。因此作为列鼎的升鼎,仅见于大型的楚墓中,如下寺2号墓所出列鼎为升鼎7件,与墓主的令尹身份相称。其最大者通高67厘米,口径66厘米;其最小者通高60厘米,口径58厘米。每件升鼎的盖、颈、腹和内壁上,都有铭文。纹饰繁缛,耳、沿和腰部圆形凸带上都饰有浅浮雕花瓣纹,腿部饰有兽形扉棱,六只攀附兽为凸雕夔龙。这组列鼎虽比战国初期曾侯乙墓的列鼎少两件,但壮美过之,显示了楚长期楚文化的气派。除鼎而外,其他铜礼器有盃、簠、浴缶、尊缶、匱、盃、盘、簠、鬲、敦、鉴等,形制与中原同期同类器相似。这个时期楚国铜器上的纹饰,有窃曲纹、蟠螭纹、蟠虺纹、夔龙纹、变形饕餮纹(兽面纹)、环带纹、重环纹、云雷纹、勾连雷纹、鳞纹、瓦纹、乳丁纹、圆涡纹、花瓣纹、S形纹、贝纹、鸟纹、象首纹等,这些都是中原常见的纹样,然而在表现形式、组合关系和装饰手法等方面却有不少中原罕见的特点。楚国铜礼器的装饰,还较多地运用了浮雕、圆雕、透雕等技法,在盖、耳、环、圈顶、扣卜、提梁、足等附件上,这些技法运用得尤广泛而娴熟,可使中原的铜礼器无法望其项背。这些雕刻技法的集中运用,是在龙、虎之类攀附兽上。其中,用失蜡法或漏铅法铸成的镂空攀附兽是当时科技与艺术融为一体的典范。

楚人有舍身赴敌的猛志,但也不乏赏曲辨音的闲情。况且,祀与戎同为国家大事,礼与乐也不可偏废。因此,在大型的楚墓中常有乐器与礼器、兵器同时出土。春秋时代楚用青铜铸



造的乐器,笼统说来,只有一样——钟。至于铙、钲、铎之类,尚无实物出土。文献所记有钲(丁宁),而无铙和铎。但楚国的钟洋洋大观,音色特好,造型也精妙绝伦。钟又分为甬钟、钮钟、编钟3类,各有从大到小不可颠倒的组合关系,因而又称为编钟。下寺1、2、3号墓出土编钟4套共52件,其中:

甬钟1套,26件。最大的一件通高1.22米,重160.5公斤;最小的一件通高24厘米,重3.1公斤。

钮钟两套,每套9件,最大的一件通高21.1厘米。

簠钟1套,8件,最大的一件通高26.3厘米。

铸钟有其特殊的难点。钟的器形不像镂空的铜禁、铜尊那么复杂,用不上失蜡法或漏铅法之类的绝技。可是,钟的铜、锡配比与礼器、兵器不同,配比不当带来的后果又比礼器、兵器严重,一点微细的瑕疵就会使音质为之减色。浇铸虽不很费事,然而事先必须设计好各件钟的不同音响,制作好各件钟的不同铸模,分寸稍有不当之处便会因其音不调而报废,难就难在这里!古人没有现代的科学仪器,全得凭经验,这是非有精深的音律知识、敏锐的辨音能力和娴熟的加工技艺不可的。钟与磬是相配的。钟发音洪亮,磬收韵清越,所谓“金声玉振”,就是这个意思。但玉器难得,而石磬常用。古代的“八音”,金为第一,石为第二,金即钟,石即磬。八音,除金、石外,还有土、革、丝、木、匏、竹。《国语·楚语上》记伍举回答楚灵王的询问,说到了“金、石、匏、竹”,这是取八音的头尾来代表八音的全体。看来,春秋时代的楚国是八音俱全的。

楚文化鼎盛时期的青铜生产,就器类而论,编钟、列鼎是必



须精心铸造的重器，然而真正得到长足发展的是兵器。战争次数的增多和战争规模的扩大，促进了兵器的发展。战国中期，楚国号称“带甲百万”。公元前312年的秦楚丹阳之战，秦军击杀楚国甲士8万。由此不难想见，楚国需要的兵器数量是何等巨大！在战国七雄的军备竞赛中，楚国长期占着上风。当时的兵器，主要还是用青铜铸造的。楚国兵器工业的最大成就，是铸造了大量优质的青铜剑。历年出土的战国中期以前的青铜剑，以“越王句践剑”、“吴王光剑”和“吴王夫差剑”为最好。楚国的地理条件和资源条件与吴越两国相近，但为争霸中原计，以车兵为主力，在青铜剑生产方面曾落在吴越两国的后面。进入战国时代以后，步兵和骑兵逐渐取代了车兵，青铜剑成为将士的必备兵器。已知最早的吴越青铜剑属于西周中期，最早的楚国青铜剑属于春秋中期。楚国的铸剑技术是向吴越两国学来的，所以楚式剑与越式剑（吴式剑）的剑身形制几如孪生兄弟。到现在为止，已出土的先秦青铜剑大半是楚国的。春秋末，越灭亡吴。战国中，楚灭亡越。从此，吴越的铸剑绝技为楚人所用，楚国的青铜剑就技甲天下了。社会的发展、风气的改易以及铸造工艺的革新，促使青铜器的风格与时俱迁。在楚文化鼎盛时期的中叶以至后叶，出现了一些形制精巧、纹饰华美的铜壶。凤纹的流行是楚文化鼎盛期装饰艺术的一个显著而明显的特点，鸟纹和凤纹同类，这与楚人的信仰有关。楚国铜器的总体风格是纤丽清秀，可是楚人也喜爱拙中见巧的铜器。如望山2号墓出土的人驼铜灯台1件，骑驼人捧持灯盏的长柄，灯盏大于灯座，驼和人都维妙维肖，驼憨然而人怡然，造型浑朴，手法简洁，然而形



象生动。粗与精,朴与华,拙与巧,两种不同的风格,彼此协调,甚至令人觉得缺一不可,这与急管繁弦之中必有希声杳渺之处是同样的道理。

(四) 长江下游的湖熟文化与马桥文化

1. 湖熟文化:在江苏、安徽的长江两岸发现一种以几何印纹软陶为特征的青铜文化,考古工作者叫它“湖熟文化”,这是因为首次发现的地点在江苏江宁县湖熟镇。湖熟文化应该相当于商代和西周时期。该文化主要分布于以宁镇山脉为中心的长江两岸,西起江苏和安徽的接壤地区,东达江苏的镇江地区。湖熟文化大体可以分为早、晚两期,早期的年代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代,晚期相当于西周早、中期。生产工具有石器和青铜器,以石器为主。青铜工具多为小型器物,如镞、小刀、斧、凿、鱼钩等。容器有鼎。晚期青铜器有所发展,但大型容器仍少见。长江下游的一些地方是西周王朝的分封范围,从而也就可以把湖熟文化归入西周统治区域内的一种地方性文化了。在商代和商周之际,恐怕与西周有些不同,而湖熟文化也许是同商文化平行发展、又受到商文化一定影响的一种文化共同体。这两处遗址中,除出土有小件青铜工具如镞、鱼钩、刀等之外,还都发现有铜炼渣,表明当地已有铸铜工业。铜镞和铜刀的形制与商代的并没有什么两样,显然是受了商文化的影响。最近在江苏漂水乌山镇湖熟文化晚期墓葬中发现了1件铜鼎,它的简化的夔纹,显然具有地方特色,应该是湖熟文化独有的东西。



2. 马桥文化的年代,大致处在商代中晚期至西周早期,与湖熟文化的年代相当。其文化特色有三:(1)陶器以几何印纹陶为特色;(2)作出少量铜器,青铜器的制作处在早期阶段;(3)石器是生产工具的主体。

(五) 北方草原地区的青铜文化

101

西周至战国时期,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青铜文化主要有辽西地区的夏家店上层文化,辽东与松花江上游之间的西团山文化以及含青铜短剑的文化遗存。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存最早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市的红山后遗址。夏家店上层文化分布的中心地区是西辽河流域,北达西拉木伦河以北,南到燕山地带,东抵教来河、孟克河及凌河上游。青铜器多为工具、武器及饰物,炊器和容器较少。常见的工具和武器有刀、锥、斧、镢、凿、铍、矛、短剑等。斧、凿、锥的形制与北方其他文化中所见的同类器物相似,常见的器物为短柄一侧有齿的小刀,与松辽平原的铜刀形制接近。短剑以身和柄连铸的最多;剑柄和柄首常铸出动物形或几何形图案;剑身有直刃和曲刃。青铜炊器与容器有鼎、鬲、豆、罐等,其形制与同类陶器几乎完全相同。青铜器中有些器形,如铜戈和鼎、簋、簠等礼器,与中原地区西周晚期至战国初期的同类器物相同,表明这一文化与中原地区的周代文化有密切的关系。根据分布地域和文化年代来看,此文化可能是《史记》中记载的山戎和东胡部族所创造的文明。

西团山文化是以最初发掘的吉林市郊的西团山遗址而得



名。该文化分布于东辽河与松花江上游之间的长春、吉林地区。青铜工具发现得较多,主要有小刀、斧、凿和锥等。作为武器的矛、短剑和镞发现得较少。矛分为直刃和曲刃两种,前者接近于中原式矛,而后者则近于曲刃青铜短剑,具有东北地区的特色。

含青铜短剑的文化遗存,分布于中国东北地区的青铜短剑,大约从西周中晚期出现,一直延续到秦汉之际,经历了七八个世纪的发展过程。青铜短剑中最具特征的是曲刃青铜短剑。根据与曲刃青铜短剑共存的遗物(青铜器群、陶器、石器)在器类、形制、纹饰等方面存在的差异,葬俗(包括殉牲)存在的差异,可将含青铜曲刃短剑的文化遗存分为四个地区:辽西地区、沈阳地区、辽东地区、吉长地区。辽西地区,包括西拉木伦河、英金河、老哈河、大凌河及小凌河流域一带。这一地区是曲刃青铜短剑的中心分布区和发源地。

(六) 西北地区的青铜文化

中国西北地区的青铜文化,主要有四坝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卡窑文化、沙井文化。辛店文化是1924年首次在甘肃临洮县辛店村发现。主要分布于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洮河、大夏河和湟水的中下游流域。

四坝遗址位于甘肃省山丹县四坝滩。1948年在这里发现遗址和墓葬,1949年以后又进行过多次调查。因首先在四坝遗址发现这类文化遗存,命名为四坝文化。1976年在甘肃省玉门市火烧沟发掘了300余座属于四坝文化的墓葬,出土大批青铜



器、彩陶及其他遗物。四坝文化主要分布在甘肃永昌以西的河西走廊地区，主要遗址有山丹四坝滩、民乐东灰山、酒泉干骨崖、玉门火烧沟，后三个遗址已经过发掘。四坝文化的遗物主要有以彩陶为特征的陶器、石器、铜器和金银器等。火烧沟墓地清理的 312 座墓葬出土铜器的有 106 座，随葬铜器共 200 余件，种类有斧、钺、镰、刀、凿、匕首、矛、镞、锥、针、泡、钏、管、锤、镜形物等。还发现铸镞的石范。铜器的质地，红铜和青铜均有。中国古代羌族被称为“西方的牧羊人”，火烧沟墓葬用羊随葬甚多。在葬俗上用金银或铜制作鼻饮，金耳环男女都有佩戴。很多墓葬的男女头骨上都有粗状的骨针，作为束头发之用。这都说明，四坝文化可能是古代羌族文化的一个分支。

辛店文化居民的经济生活以农牧业为主，兼营狩猎。生产工具主要为石器和骨器。冶铜业制造小型生产工具和装饰品外，还制作铜容器，张家嘴遗址曾出土铜容器口颈部残片。铜器的种类有锥、凿、矛、匕、铜扣和铜泡等，均为青铜器。辛店文化与中原地区同时代的青铜文化有密切的联系，如该文化中常见的双耳袋足鬲与西周早期的陶鬲相似，彩陶上的连续回纹与云雷纹等彩纹，与中原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的纹饰雷同，这都是受到中原青铜文化影响的结果。

寺洼文化，因最初发现于甘肃省临洮县寺洼山而得名。主要分布于今兰州市以东的甘肃省境内，陕西省西部的干水、泾水流域也有发现。青铜器有戈、矛、镞、刀、铃、镯、铜泡等。庄浪徐家碾的寺洼文化墓葬中出土的铜戈等兵器，形制和殷周时期相同。



卡窑文化的遗物首先在青海湟中县云固川卡约村发现而得名。卡窑应作卡约,为藏语地名。这种文化主要分布在青海东部、甘肃青海交界地区的黄河上游沿岸及其支流湟水流域。其年代约当公元前 900 年~前 600 年。铜器有斧、刀、镰、镞、戈、环和铜装饰品等。

沙井文化 1924 年首次在甘肃民勤县沙井村发现,主要分布于甘肃河西走廊的永登、天祝、古浪、武威、民勤、永昌、张掖等地。年代约公元前 800 年~前 600 年,是甘肃地区青铜文化中较晚的一支。铜器有铜刀、三棱式铜镞、带翼铜镞、铜扣、铜铃,以及鹰头饰、鹿形饰、犬形饰、铲形饰、轮形饰与连珠形铜牌饰等各种饰物。

(七) 云南地区的青铜文化

云南境内的属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文化遗存发现很多,但经过考古发掘的只有楚雄万家坝墓群、祥云大波那墓葬。万家坝墓群万家坝墓地发现墓葬 79 座,其中大墓 13 座,小墓 66 座。墓葬均为土坑竖穴墓,墓室基本为长方形。大墓一般长 2 米,宽 2 米,深 5 米以上。大墓中有丰富的随葬品,例如 1 号墓,共出土青铜器 110 件,其中有 1 面铜鼓、1 套编钟、3 件铜釜、28 套生产工具;23 号墓出土各种铜器 577 件,多为矛、戈、钺、镞、斧等兵器。1 号墓出土的 6 件 1 套的编钟呈圆筒状,大小一致,钮作羊角状。另外一些墓出土的铜剑,除少数为扁茎外,剑格大都作花蒂形;数十件铜斧和铜锄也颇具特色。这些兵器和工具,



在形制上自成体系,与中原及巴蜀的青铜文化区别较大。万家坝所出的5件铜,是迄今中国经科学发掘所获铜鼓中最原始的。

(八) 赣江流域的吴城文化

吴城文化是以江西清江吴城遗址的文化遗存作为典型遗存。该文化主要分布于赣江中下游地区。吴城文化的青铜鼎、鬲也颇具商文化的作风。吴城文化在年代上相当于商代,与商文化有密切的关系。青铜器的铸造和使用是吴城文化的第二个特征。1989年在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发现一座商代大墓,其文化时期相当于吴城文化第二期。墓中共有青铜器480余件,其中礼器50件,器形有鼎、鬲、豆、簋、壶、甗、甬、盂、瓿;乐器4件,器形有铙、镛;工具127件,器形有犁、耒、镰、铲、斧、锛、镰、刀、凿、锥、砭等;兵器273件,器形有矛、戈、勾戟、刀、剑、匕首、镞、钺、胄、镞等。这些青铜器的形制和纹饰与中原地区的殷商文化近似,如圆鼎、方鼎、鬲、甗、甬、盂、瓿等,其器形和花纹都与商文化相似。但有的器形,如异形剑、匕首、柳叶形矛、四棱锥形矛、长铤单翼镞等,均不见于中原地区的商代器物中。器物组合中缺乏中原地区商代礼器中最常见的爵、觚、斚等酒器。



九 文物鉴赏(附精美图片)

1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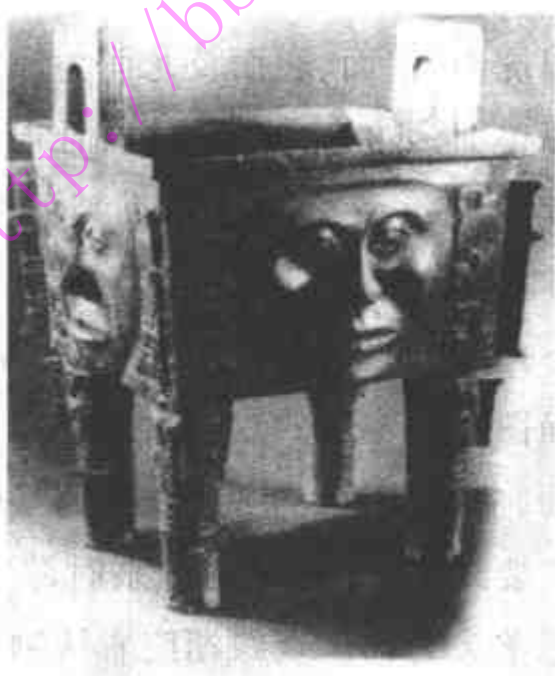
司母戊方鼎 又称后母戊方鼎。商代后期。1939年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吴家柏树园。高133厘米，横长110厘米，宽78厘米，重875公斤。为长方体深腹空柱足式。鼎有一对立耳，体呈长方槽形，腹较深，四柱足粗而中空。四腹壁稍向外倾斜。鼎双耳外侧饰有一对虎纹，口间有一人面。耳缘饰有类似鱼形的花纹。鼎之四壁为夔纹带构成的方框，两夔相对，作饕餮形，中间隔以短扉棱。鼎之四隅皆饰有扉棱，上端为牛首纹，下端为饕餮纹。足上部饰有兽首，下部有三道弦纹。其腹内



壁有铭文三字，曰“后母戊”。此鼎岿然屹立，庄严庞伟，气势宏大，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也是世界上所能看到的最大的青铜礼器。该器体和足部都是采用多块陶范浑铸，立耳则采用分铸法。该鼎形体巨大，铸法先进，充分体现了商代青铜冶铸技术的高度水平，显示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博大精深。鼎铭中“后母戊”之“后”即王后，“母戊”是商王武丁一个妃子的庙号，此器应为武丁的子辈祖庚、祖甲所制。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107

大禾人面方鼎 商代后期。1959年出土于湖南省宁乡县黄村。高38.5厘米、口长29.8厘米。体呈长方槽形，立耳，深腹，柱足，四壁稍向外倾斜。耳侧沿饰有简化的夔纹。腹部饰有人面，人面颧部较高，脸较宽，表情肃穆。其耳部下为手爪。鼎足上部饰有饕餮纹，下部有四道弦纹。器身四隅及足上部皆饰有扉棱。鼎腹内壁有铭，



曰“大禾”。在青铜纹饰中，人面纹饰盛行于商代后期，以后各时代较为少见。一般来说，人面纹或多或少都带有半人半兽的特点，有的虽为人面，但或加饰兽的身躯，或在头上口中加饰长角、獠牙，像此器则加饰有兽爪。这一切，大概与商文化中众神崇拜、万物有灵及其动物图腾有关。不过，鼎壁以人面为主题纹



饰，仅见此器。有学者认为此器造型与古书记载的黄帝四面的传说有关。该器的人面，不仅有高度的艺术价值，而且为古代湖南民族人类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三羊鬲 商代后期。1958年征集于湖南省。高22.8厘米。方唇，立耳，束颈，分裆，袋足，柱形足根。器颈部饰有日雷纹，袋足饰有羊面形纹。从此器形制看，显然是商代后期制作的。在中原出土的青铜礼器中，一般以虎面、牛面、鹿面及龙面为饰。此鬲以羊面为主饰，与众不同，且很少见。此羊面纹大概是羊角型饕餮纹的变体写实。商代后期出现角根上翘并向



下内卷的羊角型兽面纹，其平面犹如许多尊器上立雕的羊的平面图，但一般都有变形，以锋利的兽爪代替羊蹄。羊为温驯性动物，古人尚武，崇尚勇敢、凶猛的野兽，故一般不以写实羊纹为主要纹饰。但古人在献祭时常用羊头，故在表现献祭时，常以立雕羊头为饰。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涡纹豆 商代后期。1957年出土于山东省长清县兴复河。高10.2厘米，口径19.8厘米。侈口，深腹，高圈足。腹部饰有涡纹，夹以凹弦纹，上有两道，下有一道。圈足上饰有弦纹两道。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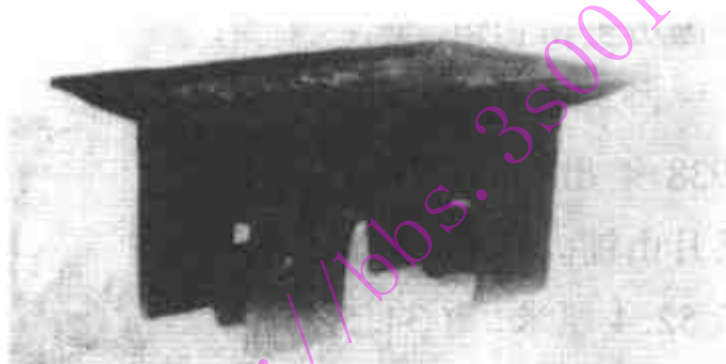
在商代青铜器中是罕见的器种。它出现在商代晚期,盛行于春秋战国,是一种专备盛放腌菜、肉酱等调味品的器皿。它也是礼器,常以偶数组合使用,故有“鼎俎奇而笾豆偶”的说法。豆在周代已普遍使用,但当时人们可能多用陶豆、漆豆和竹木质豆,使用青铜豆较少。现藏山东省博物馆。

饕餮纹俎 商代

后期。1979年出土于辽宁省义县花儿楼。

高14.3厘米,长33.6厘米。其长方形的案面中部下凹,呈浅盘形。

案底有二半环形鼻连铰状环,环上分悬有二铃。案足饰有饕餮纹。铃上亦饰有花纹,现已不清楚。俎系切肉、盛肉的案子,亦为礼器,祭祀时常与鼎、豆合用。大概先秦时所用的俎大多为木制,因此,传世和出土的青铜俎极少,所以此器显得特别珍贵。现藏辽宁省博物馆。



妇好方罍 商代后期。1976年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殷墟妇好墓。高68.8厘米,口长25.1厘米,为高体分段式。其口为长方形,外侈,口沿上有双柱。柱帽顶为四阿形,束腰。长颈,腹下微侈,平底。有较高的四足,足呈四棱锥形,外撇。罍较细,上饰有兽首。罍四角及无罍的三面中央均饰扉棱,柱帽四隅也有扉棱。器内底



有铭文二字曰“妇好”。此器形体偏狭而高,但重心适中,装饰以扉棱为主,廓线以劲健的直线和弧线为主,这既增添了该器造型上的气势,使整器显得刚劲沉稳;又掩饰了铸器合范时的痕迹,用心十分巧妙。方罍是很少见的青铜器,像此器这样大的更少。妇好墓中方形铜器出土不少,方罍共3件,当为1组。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四羊方尊 商代后期。
1938年出土于湖南省宁乡县月山铺。高58.3厘米,口长52.4厘米,重34.5公斤,是现存商器中最大的方尊。方口,大沿,长颈,高圈足。颈部饰有蕉叶纹及夔纹带;肩部立雕有四条蟠缠的龙;自



肩到足的四隅饰有四个大卷角羊,其形象十分宁静、威严。卷角羊背及胸部饰有鳞纹,前腿为精丽的长冠鸟,圈足上饰有倒夔纹。全器上下都以细雷纹为底,纹饰线条刚劲光洁。方尊的边角及每一面中心线的合范处都饰有长棱脊,其作用是以掩盖合范时可能产生的对合不正现象,同时也用以改善器物边角的单调感,增加其造型气势。方尊肩上的龙及羊的卷角都用分铸法制成,羊角是事先铸成后再配置在羊头的陶范内,再合范浇铸而成的。要使整器达到如此浑然一体的效果,必须有高超的合范技术及铸造工艺。该器造型雄奇,纹饰精美,其工艺设计集线雕、浮雕、圆雕于一器,把平面图像和立体雕塑结合起来,把器



皿和动物形状成功地融为一体,并以非常杰出的铸造技术加以表现,是商代青铜器中的精品。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妇好壶 商代后期。1976年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殷墟妇好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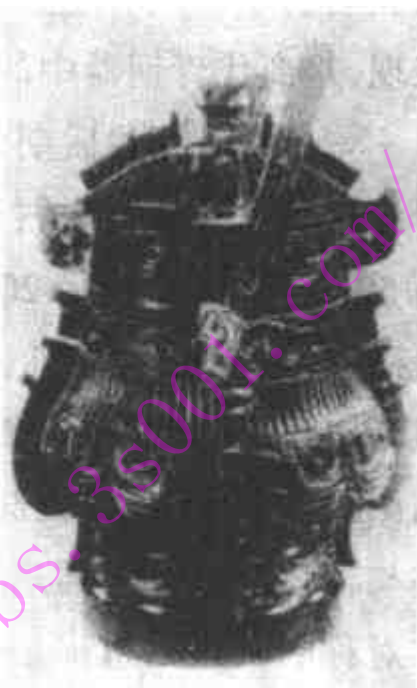
高50.9厘米,口长径20.2厘米,为宽口椭扁体式。壶口呈椭圆形。有盖,盖钮为四阿式。长颈,双贯耳,腹下垂而两侧鼓出,口宽小于腹部宽甚多。圈足亦与器体一样呈扁圆形。自盖至足饰有对称的两组四道扉棱,圈足上端有镂孔。器盖饰饕餮纹。口沿下亦饰饕餮纹,两侧加饰倒夔纹。颈部饰以夔纹带,与圈足相对应。腹部纹饰和口沿下相同。贯耳上也有兽首形纹饰。器内底



有“妇好”铭文。此器出自妇好墓,共两件成对。该器造型优雅,纹饰精致,铸造工艺相当成熟。从妇好墓出土的众多的青铜器大都是商王室的祭祀、生活用器,故皆为精工细作,有着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戈卣 商代后期。1970年出土于湖南省宁乡县商代窖藏。高39厘米,口径15.4厘米,为扁圆体斜肩宽垂纵向提梁式。颈稍收小,肩微斜,器的最宽处在其腹部中线以下,整器有下垂感。盖、腹及圈足均饰有鸟纹,腹上高浮雕鸟纹尤为醒目,其钩喙利爪,头上有冠,是典型的猛禽形象。器颈饰有鸟头兽身纹一周。此器造型极尽变化,想落天外,纹饰繁缛富丽,争妍斗奇,可

谓戛戛独造。因器型特殊，四条大棱脊随物赋形，更加强了器物庄严肃穆、沉稳而又神奇的气氛。此卣提梁位于器身的正背面，这和通常提梁位于两侧者有明显的不同，这是商末卣类特有的一种形式（少数也可能沿用至周初）。此器盖及器有对铭 1 字曰“戈”，这可能是制器者的氏族名或姓名。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鸟兽纹觥 商代后期。传世品。

高 31.4 厘米。盖前端为露齿兽首，兽面似犬，但有一对大卷角。

盖背饰有一条伏龙，后端饰有牛首。盖两侧高浮雕有夔、象及顾首有鳞异兽。其中央有扉棱，爪在器前足上。器后部饰有饕餮纹，后足为人面蛇身形。罍为立鸟形，其上部饰有兽首。整器由众多的神异动物所装饰，有条不紊，不显杂乱。这些



神异动物大都是神话中的传说动物，集中装饰在一器之上，使该器既富丽华美，又给人一种神秘莫测的感觉。现藏美国弗利尔美术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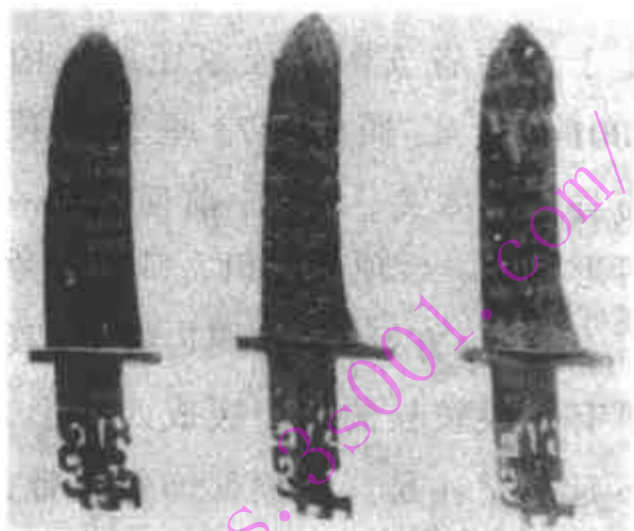
左方盃 商代后期。相传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侯家庄西北冈1001号大墓。通盖高73厘米,为顶流袋足方体式。封顶,前顶部有一管形斜流,后顶部有口,口后腹旁有盃,体呈方形,其口周边特大,其下有一段较长的颈,腹成四袋形,下延长呈柱足。盃顶部饰夔纹带,上加蕉叶纹。袋足饰有饕餮纹,上加鸟纹带。盃盖及器体均有扉棱,管流和盃上均加饰有兽首。其四足的横断面呈方形,此器造型独特,方形盃在青铜器中不多见。相传与此器同出现的形制、纹饰相同的盃还有两件。此器的盃内花纹上有一铭“左”字,另外两器铭文分别是“中”、“右”字。1001号大墓是商王室的墓,此盃应为商王室所有,故盃之纹饰极其华美,其通体有雷为底,花纹之上还有线状纹饰,构成所谓三层花,使青铜刻纹装饰艺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因此,此器是青铜器中难得的珍品。现藏日本国根津美术馆。



鸟纹三戈 又名商三戈。商代后期。相传出土于河北省保定市。此三器为一组,分别长27.5厘米、27.6厘米、26.1厘米。其形制纹饰完全相同。戈内作岐冠鸟形,有上下阑,直援微胡。援正面有刻铭,分别为22字、24字和19字。戈铭记载了器主的祖、父、兄各世的庙号,为我们研究商代亲属称谓制度提供



了实物资料。商人的亲属称谓大概与周人不同,其祖父辈的父系血缘亲属,父辈的父系血缘亲属,同辈的比自己大的父系血缘亲属,皆以祖、父、兄加以概括,这和西周复杂的亲属称谓完全不同。从三戈铭文看,加秘时刃朝上,与常例相反(戈



为钩兵,刃应向下),这可能即《尚书·顾命》所说的“执戈上刃”。此三戈应为祭祀时的仪仗用器。有学者认为此三器为伪器,但无确切证据。现藏辽宁省博物馆。

人面钺 又名兽面钺。商代后期。1966年出土于山东省益都县苏埠屯。长31.8厘米,刃宽35.8厘米。宽体扁内式。其体型纵向短于横向,两侧稍作斜直,两肩不等长,稍长的一肩为钺下端,内肩宽,方内,本部有两长穿。钺身作镂空人面纹,有人认为是兽面纹。其眉、瞳、鼻部突起,刃外侈。钺为兵器,用以斩杀,但它更具有权杖的性质,象征权力,故多饰以狰狞可怖的人面或饕餮纹,



以增加威严和令人敬畏的感觉。此钺和另一钺同出于益都人墓的墓室后壁，两钺并列，大概是象征着墓室后的警卫及墓主人的无上权威。现藏山东省博物馆。

青铜头像 商代后期。1986年出土于四川省广汉县三星堆。残高29厘米，头纵径18厘米，宽15厘米。头上部为子母口形，原应套接顶饰或冠。圆眼外凸，蒜头鼻，高鼻梁，大嘴紧闭，下颌宽圆，云雷纹形竖直耳，耳垂有穿孔，颈较粗。此器出土于广汉县三星堆一号祭祀坑中，与此同时出土的还有金杖、金面罩，与此相似的人头像、青铜容器、兵器及玉石礼器等。这种青铜头像系国内首次出土，其面容与中原人像完全不同，它是研究西南古代民族的重要资料，具有极其珍贵的文物价值和历史价值。现藏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115

成王方鼎 西周早期。传世品。高28.5厘米，口长18.1厘米。浅腹柱足式。方唇，折沿，双耳上分别雕一对伏虬。器体为长方槽形，浅腹，四柱足较细长。器口沿下饰有鸟纹带，下饰乳钉纹框，中填有直纹，其上还饰有八道对称的扉棱。足上部饰有卷角兽面及短扉棱，下部有一道弦纹。器内壁有铭3字曰：“成王隳”。这并非成王制作，



按西周金文惯例,此应为祭祀成王之器,大概铸于周康王时。此器形制与天津艺术博物馆所藏太保方鼎相似,其器形承袭了商代方鼎的传统风格,但腹较浅。纹饰极其精美,特别是双耳上的雕龙,做工精细,显示了高超的制作水平。现藏美国纳尔逊美术馆。

伯簠 西周早期。1974年出土于北京市房山县琉璃河。高27.5厘米,口径19.7厘米。鸟耳式。侈口鼓腹,盖隆起,盖捉手作圈状,盖可却置。盖面饰有象纹,并有四道对称的扉棱。器腹亦饰象纹,并有两道对称的扉棱。低圈足,其上饰有日雷纹。两耳为鸟形,垂珥作象首卷鼻形着地当足,圈足上另有两象首卷鼻形,与象首珥合成四足将簠体撑起。器上有铭文6字:“伯作乙公匱簠”。



商代簠器较少,器形也较单调,西周早期后,青铜簠开始向多种形式发展,像此器这样的四足簠便是新出现的一种式样。此簠造型以鸟为耳,象鼻为足,真是匠心独运,构思绝妙。纹饰也极为细腻精致,在四足的象首鼻之出口中,还似怪兽吞食龙蛇形,其构想可谓出神入化。这件器物是西周早期青铜器的杰作。现藏首都博物馆。

鸳鸯尊 西周早期。1982年出土于江苏省丹徒市母子墩。高22.2厘米,口径18.3厘米。通体作鸳鸯形。尖喙,圆腹,



双爪有蹼，形象生动逼真。鸳鸯背上有高大的侈口尊口颈。鸳鸯后端有一螺旋形支柱，与双爪形成三足支撑尊身。此器与辽宁省喀左县马厂沟所出的凫尊类似，只是口颈更长而已。中原地区商代后期与西周早中期鸟兽尊的造型十分严肃，带有神秘色彩，用在庄重场合。此器



与之相反，采用写实手法制成，步态蹒跚，形神兼具。这大概与文化背景有关。中原地区商周文化以崇尚自然、崇尚祖先著称，祭祀十分频繁。礼器自然会带有祭祀色彩。地方土著文化与之完全不同，故所制铜器带有轻快的写实性。现藏江苏省镇江市博物馆。

调色器 西周早期。1966年出土于陕西省岐山县贺家村西壕周墓。高15厘米，重1.8公斤。器身由四个筒形器组成，中间连接处有圆孔，上下贯通，前有昂起的兽首，下有四足，两侧各设兽首粗耳。类似器物商代已有。此器在其出土时，筒内留存有矿物粉末，说明此器应为调色之用，但其具体用途及使用方法尚不清楚。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器与此相似，广州市



文物商店亦有一件带铭文“木”字的调色器。这种器形的青铜器发现很少,故此器极为珍贵。现藏陕西省博物馆。

饕餮云纹铙 西周早期。1974年出土于江苏省江宁县塘东村。高46厘米,柄长19.5厘米。长柄无旋式。其口沿呈凹弧形,横截面呈叶形,两侧自下向上斜张,每侧倾斜约8~9度。柄长如圆柱,甬与铙腔相通。器体饰有以联珠纹衬底的由云纹构成的饕餮纹。饕餮双目很大,上加饰有云纹。饕餮纹下缘及中间饰有云纹带,上与口沿下的小饕餮纹相接。这种



造型的铙最早出现在商代,商代后期及周代早中期流行于我国南方地区。古书记载,铙是用于军旅战争之器。从考古发掘情形看,它亦用于祭礼和宴乐。此器上的饕餮纹结构与江苏丹徒市母子墩所出的鸟盖壶上纹饰相似,具有地方特色。现藏南京博物院。

墙盘 又名史墙盘。西周中期。1976年出土于陕西省扶风县庄白铜器窖藏。高16.2厘米,口径47.3厘米。方唇,浅腹,附耳,圈足。盘身以云雷纹填底,腹部饰有垂冠分尾长鸟纹。圈足花纹似夔纹但不见其首,可能是窃曲纹的原始形态。盘内底有铭文18行284字,其中重文、合文3字。这是建国来发现的最长的西周金文。铭文记述了西周文、武、成、康、昭、穆六王时的重要史迹以及作器者墙的家世。其内容可分为两部分:前半部歌颂了文王至穆王的功德,后半部是作器者墙自叙其家族自远



祖以来的历史周王朝的历史。墙的远祖系商末由商投奔周武王的微子启，微子的子孙即墙的先祖们历任西周的史官，此盘系史墙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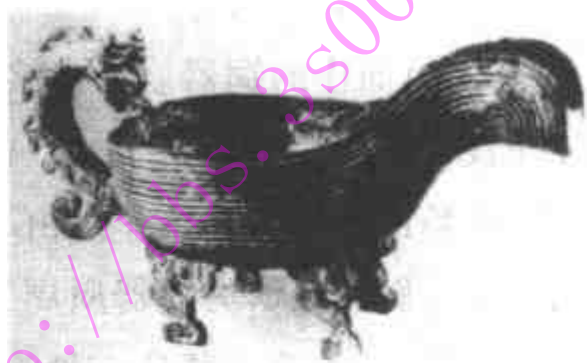
纪念其先祖而作的铜器。墙盘铭文书体工整秀丽，文字精练简要，并且有许多用语用韵精妙。整篇铭文既是学术价值极高的史料，也是古典文学的佳作。由于盘铭记述的西周历史止于周穆王，学者们一般认为此器属周共王时代的标准器。此盘纹饰精美，造型典雅，铸工精良。盘铭内容又十分丰富，是西周青铜器中的精品。现藏陕西省周原扶风文管所。

毛公鼎 西周晚期。相传出土于陕西省岐山县。高 53.8 厘米，口径 47.9 厘米。立耳较高，深腹，蹄足。口沿下饰有一道重环纹，下加一道弦纹。器腹为素面，腹内有铭文 32 行共 497 字，铭文记述了周王的诰诫，是一篇完整的册命文书，其文体与《尚书·文侯之命》近似。铭文首先回顾了西周文武二王建国治邦的丰功伟绩，感叹当时时局的不安；然后记述了周王策命毛公治理家邦内外，给毛公以行政大权，并告诫希望毛



公克职尽守，不辜负周王的期望；最后是记述周王赏赐毛公大量器具，毛公为感谢和称颂周天子的美德作了此器，以为纪念。此器时代至今尚有争议，有学者认为是周厉王时所作的铜器；有学者认为是周宣王时的铜器。它是现存铭文最长的一件青铜器，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物价值。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

齐侯匜 春秋早期。传世品。高 24.7 厘米，流至鋬长 48.1 厘米，重 6.42 公斤。形制较大，仿兽形，匜鋬为龙形，龙首连接匜口，好似探水，匜之四足为小龙形。器身纹饰较简单，通体饰沟



纹。与复杂精细的龙鋬龙足恰成对比。匜内底铸有铭文 4 行 22 字，其大意是：“齐侯为虢孟姬良女制作了此匜，希望良女万寿无疆，子子孙孙能永远用它。”良女是虢国人，姬姓，出嫁前大概是虢国公主，齐国国君为姜姓，姬姜通婚在西周及春秋极为普遍。此器系良女嫁与齐侯为妻时，齐侯为之制作的。春秋时，诸侯通婚主要是为了保护彼此的政治利益，通过婚姻关系来维护他们的地位和势力。虢国于春秋早期为晋国所灭，此器铸造时间应为春秋早期。现藏上海博物馆。

莲鹤方壶 春秋中期。1923 年出土于河南省新郑市李家楼郑国大墓。高 118 厘米，口长 30.5 厘米，为方体高莲瓣盖鼓腹式。器盖为双层镂空莲瓣形。莲瓣之中有立鹤作展翅飞翔的神态，形象生动逼真。器之双耳为镂耳顾首伏龙。壶口微侈，下



腹外鼓。其颈面延及腹四隅饰有四条立体怪兽。器通身饰有互相缠结的蟠龙纹。圈足上饰有似虎的兽形纹。圈足下为一对咋舌怪兽，兽首的两角突伸。郑国大墓共出土形制相同的一对方壶，此为其中一件。此壶在设计造型纹饰方面较春秋早期又进了一步。各种繁多的龙螭鸟兽雕饰造型生动，虽繁复而见统一。器腹的最大径虽下移但腹不下垂，这增加了全器的稳定感。纹饰风格的最大特点是使庄严的器形上出现了



旋律感较强的动态装饰，这与商周时期静态的严肃格调的装饰图案形成鲜明的对比。此方壶的装饰设计的构思，反映了当时一种新的艺术革新精神的出现。现藏故宫博物院。

浮雕人面罍于 春秋晚期。1985年4月出土于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县谏壁镇王家山东周墓。高43厘米，口径16.9厘米。弧形，无盖，顶端有虎形钫。圆突肩，斜弧腹渐内收，近口处稍外侈，口呈椭圆形。侧视罍于，器体上部向前倾斜，具有不等称的特征。器腹正面饰有兽形扉棱，腹内有两个三角形矫音孔。虎钮饰有雷



纹。器顶面纹饰可分为三圈,内圈为云纹,外两圈为三角云纹。器身正面肩腹间突出处饰有一浅雕人面图案;下腹部与人面纹相对有一方框,框内有四组变体云纹。以人面纹和方框为中线,两侧各有三列凸列的螺旋纹,间以三角纹。其下饰有鸟纹和变体云纹。王家山东周墓共出土 3 件簪于,大小成序列,形制纹饰基本相同,另 2 件有残损,此为完整的 1 件。这种弧顶无盘式簪于与春秋中期的山东省沂水县刘家店子所出的簪于相近似。该器最大的特点是其不等称的形制及所饰的人面纹,这是前所未见的。此器主人可能是吴国一位统兵贵族。现藏江苏省镇江市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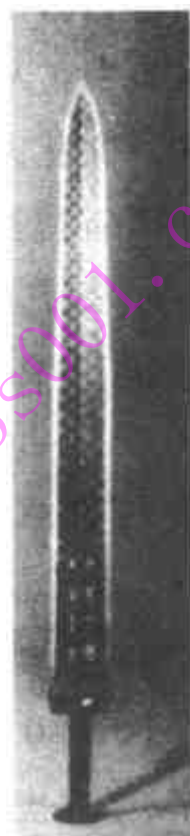
吴王夫差矛 春秋晚期。

1983 年出土于湖北省江陵市马山。长 29.5 厘米,宽 3 厘米。矛起中脊,短铍。其下端作鱼尾形。矛身通体有米字格暗纹,并有铭文 2 行 8 字,记此器为吴王夫差所作。吴王夫差兵器,已发现者以剑为多,矛仅此一器。夫差于公元前 495 年继吴王位,次年,击败越王句践,继而转师北上,争霸中原。其时吴国兵强气盛,中原霸主晋国不得不让其三分。当夫差与晋国在黄池争执牛耳之时,越王句践乘机袭击吴都姑苏。公元前 473 年夫差亡国自尽。此矛铍下端呈鱼尾形,这是吴器造型特征之一。该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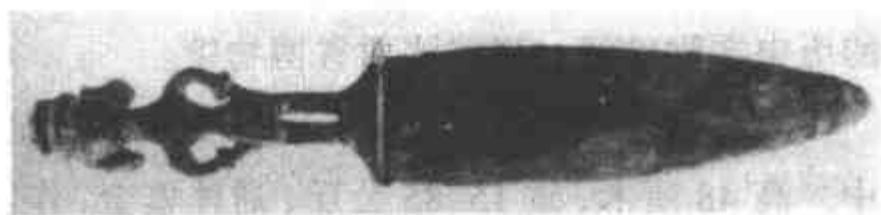
出自楚墓中，可能是楚人从越人手中辗转获得。现藏湖北省博物馆。

越王句践剑 春秋晚期。1965年出土于湖北省江陵县望山楚墓。长55.6厘米，宽4.6厘米。剑身布满菱形暗纹，剑格上花纹嵌有蓝色琉璃及绿松石。出土时，剑插于素漆木鞘中，茎上还有缠绕丝绳的痕迹，剑身近格处有铭文2行8字：“越王句践自作用剑”。句践是春秋晚期风云人物。公元前494年越国被吴王夫差击败，几乎亡国。其后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终于在公元前473年灭掉吴国。随后又率师北上，会天下诸侯于徐州，一时号称霸主。春秋晚期，吴越之剑天下闻名，此剑堪称吴越名剑之代表作。那时的铸剑师已经掌握了金属铬盐处理技术，此剑用了硫化处理技术，使剑之表面蒙上了一层黑色的硫化物护膜，这种先进的工艺是欧洲本世纪列为技术专利的。此剑至今光亮如新，剑锋寒气逼人，不愧为代名剑。现藏湖北省博物馆。



123

人形柄匕首 战国中晚期。1974年出土于湖南省长沙市树木岭。长20厘米，宽3.5厘米，其柄为立人形。立人双目圆睁，耳有大垂，叉手于腰，傲然而立。其上身赤裸，双手戴镯，着短裙。匕首即是短剑，为近身杀伤器，亦可作为抛掷



的短兵。先秦匕首出土甚少,大概是当时中原流行的短剑已可起匕首的作用,故出土的匕首均在湖南。此器立人柄十分独特,立人的衣着打扮像当地的土著居民,其发型与服饰与中原文化大不相同,故此器有着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杜虎符

战国中晚期。

1973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北沱村。长9.5厘米,高4.4厘米,厚0.7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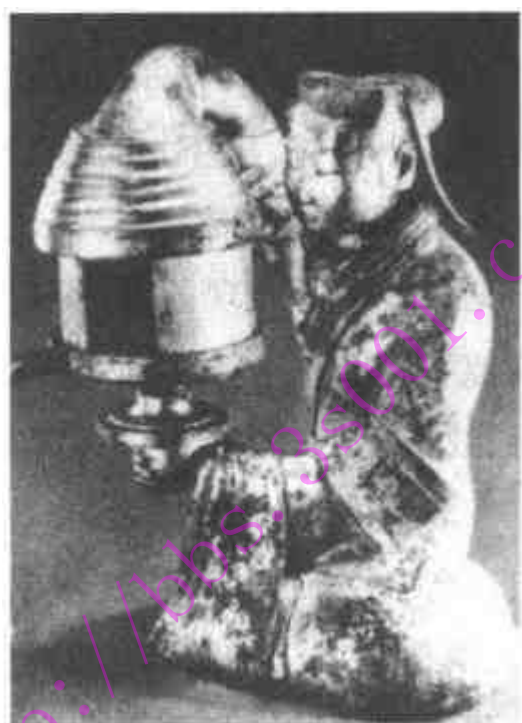


作立虎形,虎昂首立尾,作走势。器背面有槽,虎颈部还有一小孔。其身有错金文字9行40字。虎符是调兵的凭证,此虎符与著名的秦新郪铜虎符形制铭文基本相似。其铭曰:“兵甲之符,右在君,左在杜,凡兴被甲,用兵五十以上,必会君符,乃敢行之,燔燧之事,虽毋会符,行戍。”意为:这是调动军队之符印,右半符在君王手上,左半符在杜地的军官手中,凡要调士兵五十以上者,必须见到君王的右符。但若遇到紧急情况,可以举火,不必见君王的右符。此符铭文绝大部分是小篆,字体瘦劲有力,铭文明确记载了虎符的用途,故有着珍贵的历史文物价值。现藏陕西省博物馆。

长信宫灯 西汉。1968年出土于河北省满城窦绾墓中。高48厘米,重15.85公斤,通体鎏金,作宫女双手执灯



形。宫灯设计极为精巧,灯座及灯罩都可自由拆卸,灯罩可以开合,调整灯光的照度宽窄。灯罩下还有一柄,可以调整照射方位。宫女头部和右臂也可以拆卸,右臂实际上是烟尘的通道。当灯点燃时,灯烟通过宫女右臂到达体内,这样也就保持了室内的清洁。宫灯上共刻有铭文 64 字,记载其容量、重量、编号、纪年等。有 6 处刻的是“阳信家”,另外还刻有“长信尚浴”和“今内者卧”。“阳信家”是指汉文帝元年(前 179)封的阳信侯刘揭的家,传子中意后 6 年(前 151),有罪国除。这件灯可能就在这时被没收,归长信宫尚浴府使用。胜妻窦绁,是太后家人,此灯出自窦绁(死于公元前 104 年)墓中,大概是太后生前将此灯送给了她。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人面盃 商代后期。相传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殷墟。通高 18.5 厘米,为大口宽腹圈足式。盃有盖,为具有龙角的人面形,人之双耳为盖的半环耳。器较宽,颈部两侧有贯耳。腹前有管状



直流,其下腹鼓出,低圈足,圈足上有镂孔。器饰是由方格纹和鳞纹构成的龙身,接于人面之下,其前器两侧有前足及爪,足上还饰有小兽首,腋下加饰夔纹。管流上亦饰夔纹,流之基部两旁饰有变形夔纹。圈足上为云纹。此器形制、纹饰极为诡异,十分罕见。纹饰所表现的人面双爪的龙是很少见的。整个器物的纹饰似乎是以一定的神话传说为基础构思设计的。该器造型奇特,纹饰精致,是难得的艺术珍品。现藏美国弗利尔美术馆。

饕餮纹鼓 商代后期。1977年出土于湖北省崇阳县汪家咀。高75.5厘米,长49厘米。形似横置的筒形,上端较下端略长,两侧为鼓面。蒙革。两端周缘上各饰有乳钉纹三列,象征蒙皮用钉。鼓身中部上有一枕形座,用以插杆饰,两侧有圆孔。身下有方形圈足,每边设穿成四方足,作为鼓座。鼓之通体饰有饕餮纹,惟鼓身饕餮外环以简化成斜角形的夔纹。此器像鼓形,但非实用乐器。商周时期的实用鼓大部分是木质的,侯家庄大墓中曾发掘出蟒皮面大鼓的遗痕。鼓在古代应用范围极为广泛。《周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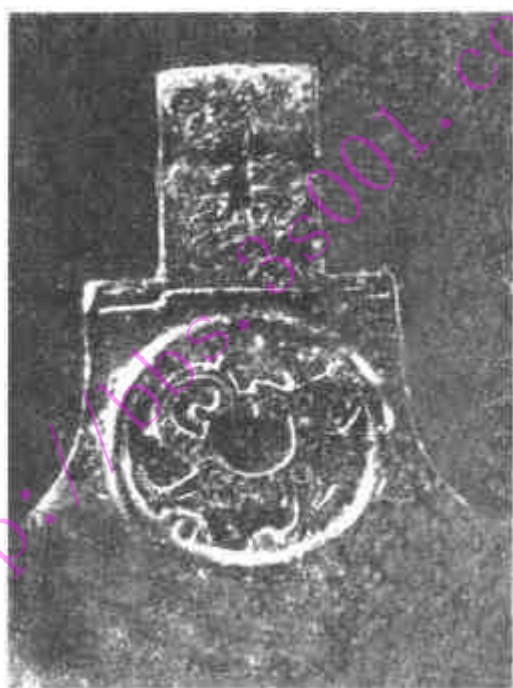


·地官·鼓人》记载:“掌教六鼓四金之音声,以节声乐,以和军旅,以正田役。教为鼓而辨其声用,以雷鼓鼓军事,以鼙鼓鼓役事,以晋鼓鼓金奏。”商周青铜鼓现仅存2件,出土地点确定的



仅此 1 件。现藏湖北省博物馆。

龙纹钺 商代后期。1964 年出土于陕西省城固县五廊庙。长 17 厘米，圆穿径 9 厘米。方内较长，其中央有一三角形穿。本部有二长穿。钺身有一大圆穿，穿周起沿。中央为透雕龙形，龙嘴大张，似在高吟。龙爪微向后摆，龙尾高卷，作飞奔状，其形象生动大方又十分自然。钺刃边圆，两角外侈。此器与中原文化的兵器在造型及纹饰上都略有不同，特别是内穿作狭三角形，明显不是中原兵器的风格。它出土于汉中地区，与巴蜀邻近，城固地区的铜器群里包含了许多巴蜀文化的因素，故此器的造型可能与巴蜀兵器有关。现藏陕西省城固县文化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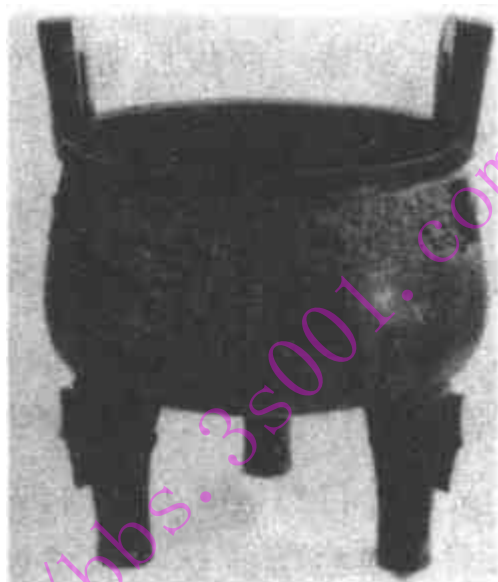


127

孟鼎 又称大孟鼎。西周早期。相传清道光初年出土于陕西省岐山县礼村。高 101.9 厘米，口径 78.4 厘米，重 153.5 公斤。立耳，腹下略鼓，圜底，三柱足。口沿下饰有饕餮纹带。足上部饰有兽面，并有扉棱，下加两道弦纹。腹内有铭文 19 行，共计 291 字。铭文首先叙述了周朝开国经验，告诫不得像商人那样酗酒遭致灭国，并赞颂了周初文王、武王的盛德。其内容与《尚书·酒诰》相似。接着记述了周康王对孟的册命，让孟接续了其父的官职，并赏赐给孟以鬯卣、命服、车马以及大量的臣民奴隶，并勉励孟要终身管理诸戎之事，要克己奉公，不辜负周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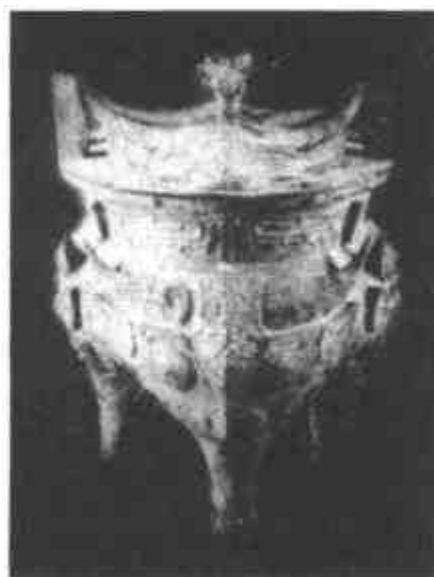


的信任。最后,孟为了感谢周王的册命。颂扬了周王的美德,因而制作此鼎以祭祀其先祖南公。铭文开始称“王若曰”,其他处则称“王曰”,反映了周初史官代替周王宣布册命的制度。此鼎作于周康王二十三年,造型雄伟凝重,纹饰简朴,是著名重器。其长篇珍贵的铭文为研究商末周初的历史提供了



重要资料。相传与此一起出土的还有小孟鼎,二器系一人所作。但小孟鼎已佚失,仅传铭文拓本。小孟鼎铭文记载了孟受命征伐西北强族鬼方,俘获告庙,受到周王赏赐之事,铭文亦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伯矩鬲 西周早期。1975年出土于北京市房山县琉璃河。高33厘米,口径22.9厘米。侈口有盖立耳式。平盖,盖钮为立雕牛首相背,盖面浮雕有牛首纹。器为侈口束颈,折唇上有二立耳。腹部较宽,分裆袋足,足根为粗柱形。器颈饰有夔纹,间以短扉棱。袋足上饰有牛首纹,牛角高翘。器内有铭文15字曰:“在戊辰,燕侯赐伯矩贝,用作父戊鬲彝。”西周早期鬲的形制与商代后期基本相同,惟有形体向低矮方向发展,另外,颈部多呈弧形或直圈形



收缩。此器纹饰十分精美,其主体图案皆用高浮雕制成,器上共饰有牛首七个,纹饰显得繁缛华丽,令人目不暇接。现藏首都博物馆。

天亡簋 又名大丰簋。西周早期。相传清道光末年出土于陕西省岐山县。高 24.2 厘米,口径 21 厘米。四兽耳,垂珥,有方座。腹与座均饰卷体夔纹,圈足饰有夔纹带。四耳簋这种造型及卷体夔纹仅流行于西周初年武王、成王时期。器腹内有铭文 8 行 76 字。铭文大意是:王有大丰,泛舟于辟雍的池中。王祭祀于辟雍内的明堂。武王降命于助祭的天亡,让他襄助衣祀王父文王和大祭上帝。武王受文武的护佑,灭掉了商。天亡为了称颂武王的功德,因而作此器以为纪念。铭文中的“大丰”即大礼,“衣祀”指遍祀先王;“事喜上帝”的喜,即禧,祭祀之意。天亡簋是传世的周武王时期的标准铜器。这一时期的铜器很少见,簋铭所记载的周初的祭礼情况是研究商周祭祀制度的珍贵史料。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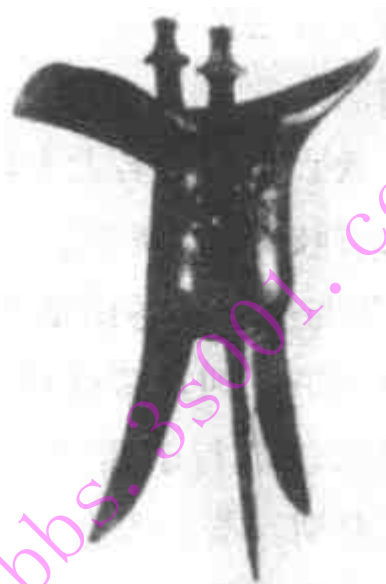


129

伯丰爵 西周早期。1965 年出土于河南省洛阳市北窑机瓦厂。高 22.2 厘米,流尾长 15 厘米。圆底高杯式。杯体偏长而优美,杯壁较直,口沿流折之后有二帽形柱。其鬲较细,上饰有牛首,腹部饰有一条鳞纹带,圈底。足为三棱,扁如刀形。形制高挑修长,廓线流畅优美,纹饰洗练但风韵自见。器内壁有铭文 4 字



曰“伯丰作彝”。此器纹饰较特殊。鳞纹带中有小日形，这极为少见。西周早期的爵大都承袭了商代的传统风格，但亦有一些特点。虽然其形体高低各有不同，但流部两侧前端高于后端。足变扁，向刀形足发展。此器正是这种典型的西周早期爵的造型。该器保存完好，通体光亮，非常精美。现藏河南省洛阳市文物工作队。



鸟盖壶 西周早期。1982年出土于江苏省丹徒市母子墩。高49厘米，口径20厘米。瓠形式。平盖，盖钮为飞鸟形，其首、翼高翘，形象生动。敛口，器横断面为椭圆形，颈部不分。口沿下有半环形耳，腹下外鼓，圈足。器身饰有由云纹构成的饕餮纹，框以绶带形装饰，上加方形乳钉。瓠形式壶见于商代，器体一般较瘦，西周很少见。此器形体较胖，大概在商器的传统上有所变化。纹饰粗率，风格质朴。器上所饰的绶带纹，过去被认为是北方特产，江南完全没有，此器的出土，纠正了前人的误解。丹徒一带的青铜器大都以鸟为装饰，大概当地人们与鸟的关系较为密切，这是当地铜器装饰的地方特色。现藏江苏省镇



江市博物馆。

保卣 西周早期。相传 1948 年出土于河南省洛阳市。高 25.8 厘米。扁圆体斜肩垂腹式。器盖上有捉手，可却置。盖面饰有顾首夔纹，并夹以联珠纹，其缘较高。器口微侈，两系在腹部上方，作龙首形。器口沿下花纹与器盖相同，中间加有小兽首，下有弦纹一道。圈足上饰有顾首夔纹。器盖有对铭 7 行 46 字。铭文大意是：乙卯，王令保进攻东国，保立下了战功，因此受到赏赐。保为纪念此事作了祭祀大父的宝器，这正是周王在周举行祀典的一月既望时。此铭文记时方法与常时的周器铭文不同，放在铭文的最后。这大概是保留商铭的特点。此卣器形完全继承了商代后期的传统风格。但其腹部的横向鼓出稍作收缩，盖相对增高，整体比例较高。现藏上海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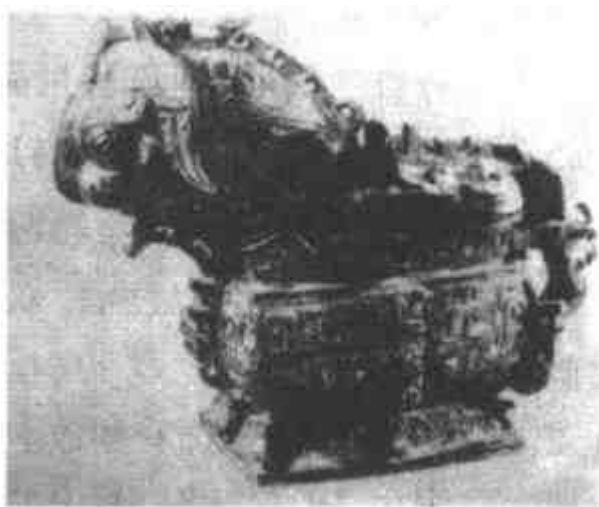
131

太保鸟卣 西周早期。传世品。高 23.5 厘米，长冠鸟式。通体作鸟形，鸟首似鸡，有双长冠垂于脊部，腮两侧似吐绶鸡，喙上片可开合以注酒，双腿粗大似鹰，爪和尾为器之支点。鸟顶后部有盖。提梁在颈部，上饰有鳞纹。器上有铭文三字曰“太保铸”。与大保方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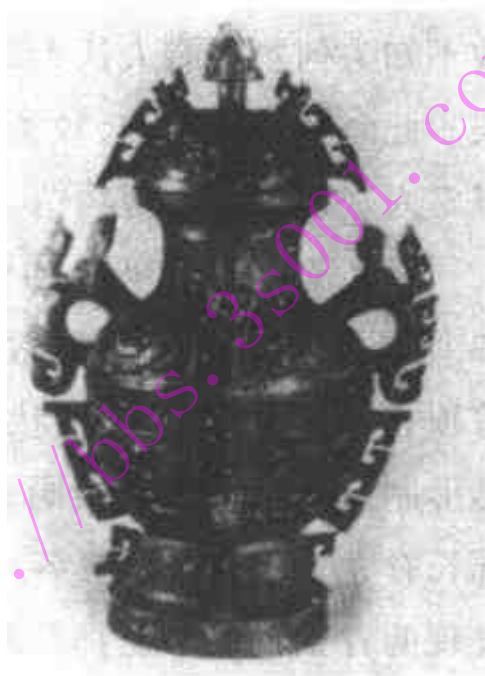
完全相同。周初,召公奭为大保。武王灭商后,为抵御戎狄南下入侵,封召公奭于燕,建国于河北北部。现在北京琉璃河及辽宁省凌源马厂沟均有带“燕侯”铭文的铜器出土,但无“太保”铭文的铜器。此器为传世品,无出土地点,故只能推测它可能与召公家族有关。全器造型奇特,十分传神,极富想象力,为周代青铜器之精品。现藏日本白鹤美术馆。

折 觥 西周早期。1976年12月出土于陕西省扶风县庄白家一号青铜窖藏。高28.7厘米,长38厘米,重6.7公斤。盖前端为羊首,曲角鼓目,獠牙巨鼻;后端作饕餮面,巨目咧嘴,眉作卷曲夔龙。盖面起有扉棱,前有伏龙为饰。盖上两侧饰有回首卷尾夔龙一对。觥体前上部有流,纹饰与觥盖对应一致。其下部呈长方形,腹外鼓,其中央和四角皆饰有透雕扉棱,稳重大方。腹的主体花纹是由两条夔龙组成的饕餮。圈足上饰有回首夔龙,长尾逶迤。觥采用浑雕手法,作成三种动物形象,上为兽首,中是鸮鸟欲飞,下为象鼻。三种动物虽没联系,但装饰安排甚为得体。全器造型美观,纹饰设计独特,是难得的艺术佳品。折觥盖和器同铭,各有40字,其大意是:在周王十九年五月戊子这天,周王在庠地,命令作册折去给相侯馈赠望土,赏赐给折青铜和奴隶,折便为父乙铸了此器。据学者考证,作册折应是昭王时期的人,故此器铸造年代应是



周昭王十九年。现藏陕西省周原扶风县文管所。

卷体夔纹罍 西周早期。1980年出土于四川省彭县竹瓦街西周窖藏。高69.4厘米，口径21.8厘米。高颈圆肩高圈足式。盖较高，盖面饰有卷角饕餮纹，角端高翘，其上还有四道对称的扉棱。盖钮上亦有四道扉棱。器为方唇，侈口束颈，颈部饰有两道弦纹。肩部饰有夔纹，中间有龙首，两侧有象形耳。龙、象首上均起扉棱。腹下内收，饰有卷体夔纹，夔鼻上卷如象；其上亦有四道扉棱。圈足上饰有牛形纹，亦有四短扉棱。在四川彭县竹瓦街窖藏的铜器中，礼器基本上与中原铜器无差别，仅是兵器的形制和花纹富有蜀文化的特点。此器装饰颇得商代后期大扉棱装饰之精髓，参差嶙峋神采飞动，又充满神秘怪诞的气氛。加之各种精致的动物形纹，整器也不失富丽华美之致。同出尚有一器与之相似。现藏四川省博物馆。



蟠蛇纹剑鞘 西周早期。1974年出土于北京市房山县琉璃河。长22.8厘米，宽10.3厘米。整器饰有镂空蟠蛇纹。鞘口两侧雕有两人形，人面皆向外。此系柳叶形短剑之鞘，原本有皮革、木片或漆皮衬于内部，出土

时已无。商周时期,剑一般较短,作护身兵器或投掷兵器,剑鞘讲究方便实用,主要以皮革、木片或漆片制成,故青铜剑鞘发现很少。这类剑鞘以往亦有发现,由于有的残损,造型不很清楚,故不知为何物。有人认为这可能是车马上的装饰器件,实为大误。此剑鞘铸工精细,纹饰繁缛,别于其他剑鞘,其主人当非同寻常人。现藏首都博物馆。

素面胄 西周早期。1975年出土于北京市昌平区白浮。高23厘米,脊长18厘米。素面,胄顶有一长脊,作镂空网状。此器形制与商代胄大致相同,顶部长脊尤为漂亮。世界各地所发现的青铜胄,形制都基本相同。古代希腊罗马的胄与此相似,但其顶部长脊更高,装饰也更漂亮。青铜胄出现于商代,流行于商代后期及西周、春秋和战国以后,由于铁器的出现,铁胄逐渐取代了青铜胄。此器出土地点属燕国,应为燕国器。与此器同出土的还有许多兵器。现藏首都博物馆。



卫盂 西周中期。1975年2月出土于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一号青铜器窖藏。高29厘米,口径20.2厘米,重7.1公斤。器盖上有半环形钮,有系环同器相连。盖缘与器颈均饰有夔首夔纹。腹前有管流,其袋足上饰有人字纹。这种盂的形制是西周穆王、共王时期盛行的式样。盂盖内铭文12行132字,记载了



周共王时期以物换出的真实情形：周共王三年三月，由于周王要在丰京举行建太常旂的典礼，矩伯向裘卫取了价值 80 朋朝觐用的玉璋，给予裘卫土地十田（一千亩）；又向裘卫取了两件赤琥、两件鹿黻、一件賁韜等玉饰和礼服，给予裘卫三



135

田（三百亩）。裘卫就把这件事报告了伯邑父、荣伯、定伯、隰伯和单伯等执政大臣，这些大臣就命令三有司会同矩伯和裘卫授田。这篇铭文记载土地的转让，为研究西周中期土地制度和社会经济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史料。铭文中的伯邑父、定伯、隰伯和单伯见于五祀卫鼎，他们是周共王时期的执政大臣，故此盂当为周共王三年三月铸造。现藏陕西省岐山县博物图书馆。

散氏盘 又名散盘或矢人盘。西周晚期。传世品。高 20.6 厘米，口径 54.6 厘米，重 21.31 公斤。敞口，浅腹，附耳，高圈足。腹部饰有夔纹，圈足饰有变形饕餮纹及窃曲纹。盘腹内有铭文 19 行 357 字。铭文大意是：矢国侵害了散国的土地，所以应赔偿土地给散国。矢人赔与散氏的土地共有两块，一块是眉地之田，一块是井邑之田。铭文对两



块田所在的位置、四界、某封、某树等均作了详细的记述。在叙述划定田界以后,列记双方参加定界、盟誓的人名,其中矢国有15人,散国有10人。接着记述了订约的时间和盟誓的内容。盟誓说:我既付给散氏田器、“濕田”、“墉田”,将来如若爽约,愿意承受惩罚。周王朝中管理诉讼的王臣也参加盟誓,以为佐证。这是一篇完整的契约,铭文中涉及的许多地名是学者们考证、争议的焦点。近年来,考古研究者通过发掘证实矢国应当在陕西省千河流域的千阳、陇县、宝鸡一带。铭文中的矢国赔偿土地的位置也当在这一带。此盘制作精美,纹饰细致。盘铭中详细记载的核定土地境界及誓盟经过,为研究西周孝王、夷王以后的土地制度提供了重要史料。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

秦公簋 春秋早期,相传1919年出土于甘肃省天水县西南乡。高19.8厘米,口径18.5厘米。夔口圆腹双耳圈足式。其盖有捉手,盖面饰有瓦纹,盖缘饰有细密的勾连纹,器口沿亦相同。器侧饰有两兽首形的耳,无垂珥。器腹饰有瓦纹,圈足上饰有波带纹。



器内有铭文共123字。铭文大意是:秦公说:称美我的祖先,我国受天命保佑,现已有十二代人。我虽小子,但勤于治民……现作此器以祭祖先,希望得到其保佑。铭文见《三代吉金文存》。此器形制及纹饰具有典型的秦国风格。其造型与宝鸡市秦家沟所出的簋器完全相似。其铭文字体接近于宝鸡市太公庙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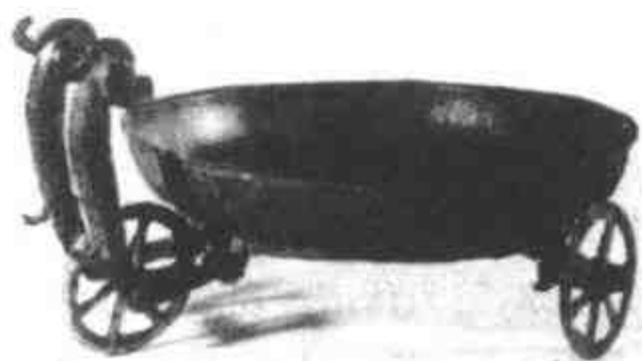
土的秦武公所作的钟、镈。故有学者认为它是秦武公作的器。容庚先生认为它应是秦桓公所作器。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侯母壶 春秋早期。1978年出土于山东省曲阜县望父台鲁司徒仲齐墓。高38厘米，腹径28厘米。其盖为蟠龙形，盖侧有两小系。器为直口，短颈，腹下膨，低圈足。器肩有四系，用以穿带。器肩部饰有两首相对的成横S形的螭纹。器腹饰有三角形的编织纹，其中央夹有卷曲龙纹带。圈足上饰有鳞纹。器颈有铭文1行，共15字。鲁司徒仲齐墓共出土壶一对，形制完全相似，此为其中之一。此器造型特异，极为少见。其主体纹饰编织见于山东省烟台市上乔及湖北省随县熊家湾所出土的壶上，亦是一种不常见的纹饰。由于这种形制纹饰的器物发现较少，故我们只能根据与此同出的铜器，断定此器大概是西周末、春秋早期器。现藏山东省曲阜文管会。



137

双兽三轮盘 春秋晚期。1957年出土于江苏省武进县淹城。高15.8厘米，口径26厘米，重1.65公斤。器无耳。其一侧有双兽首柱夹有轴，轴上套有一轮。另一侧圈足上附有两轮，与之形成三角



形,盘可推动如车。器身通饰几何形纹,此系印模制范而成。此器造型独特,至今尚未发现类似的器物。以三轮为足,兽首柱为舵,盘身为车体,这种构想令人称绝。双兽柱即是盘之鑿手,也是推拉之舵手。就整器来看,双兽柱似为某种爬行动物之首,而盘身似其体。此器全身所饰几何纹近似于当地出土陶器上的几何印纹。几何印纹代表了江苏地区地方文化的装饰风格。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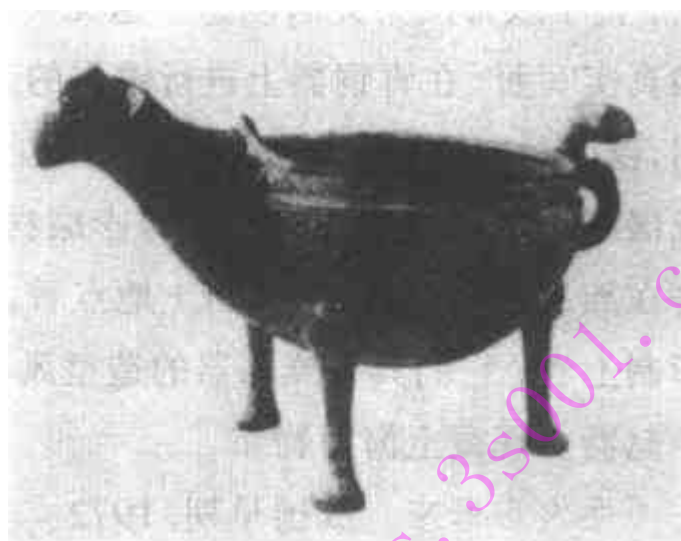
双龙蟠兽纹鉴 春秋晚期。相传 1941 年出土于河南省辉县。高 45 厘米,口径 73 厘米,重 54 公斤,为四耳平底式。其口缘较宽,口微侈,方唇束颈,腹下敛,平底。器前后两侧雕有兽耳,带垂环,兽首之上又有小兽首。器左右两侧雕有龙形附耳,双龙攀缘器口作探水状。器颈至腹饰有浪花状的变形蟠虺纹带三道,下加垂叶纹。此器形制巨大,其造型纹饰风格与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的吴王夫差鉴极为相似。且相传吴王夫差鉴亦是 1941 年出土于河南省辉县琉璃阁,故推定此器应为吴器。夫差公元前 495 年即位,公元前 472 年国亡自尽。吴器出土于晋国地区,大概是因为晋吴两国关系较密切,吴国灭亡后又有吴国贵族投奔晋国的原故。鉴流行于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其造型源于陶盆,其用途主要有三:一为盛水照容,二为盛冰,三为沐浴。现藏上海博物馆。



鸟流鼎 战国早期,1951 年出土于河北省唐山市贾各庄。



高 15.7 厘米,口长 11.9 厘米。其形体似缶形。有流状突出为鸟首,鸟有冠及耳,鸟首仅为装饰。与鸟首对应的后部有鋬,鋬上部亦饰有鸟首。器口沿下饰有绚纹,其腹部饰有鳞纹,腹下部为素面,圜底下有三



139

细长蹄足,足上部饰有兽面。此器造型别致,鸟首装饰,配之细足及周身鳞纹,使整器似一立鸟。以鸟为青铜器装饰图案是北方地区人们所喜爱的,这可能与他们的社会文化有关。唐山贾各庄所出土的铜器从历史地理上看,应为燕国器,故带有北方民族青铜器造型的某些特点。此器铸造时代大约在战国初期。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镶嵌红铜狩猎纹豆 战国早期,相传 1923 年出土于山西省浑源县李峪村。高 20.7 厘米,口径 17.5 厘米。有盖,盖顶有捉手,可却置。器身两侧有环耳,柄较短。整器从盖到足均饰有镶嵌红铜的狩猎纹饰,它生动描绘了狩猎者勇猛无畏、奋力拼搏及禽兽飞跃奔逃的场



景，整个纹饰图案充满动感。这无疑是当时贵族举行狩猎活动的真实写照。在青铜器上进行镶嵌的工艺，始于夏代。商代及西周，镶嵌材料主要是绿松石。红铜镶嵌技术出现在春秋中晚期，战国早期发展成熟。山西浑源李峪村 20 年代初所出土的铜器群在族属上尚有争议，从出土地点看，这批铜器应为赵国器，从形制上看，它们具有燕国器的造型风格。故我们只能定此器为燕赵器。现藏上海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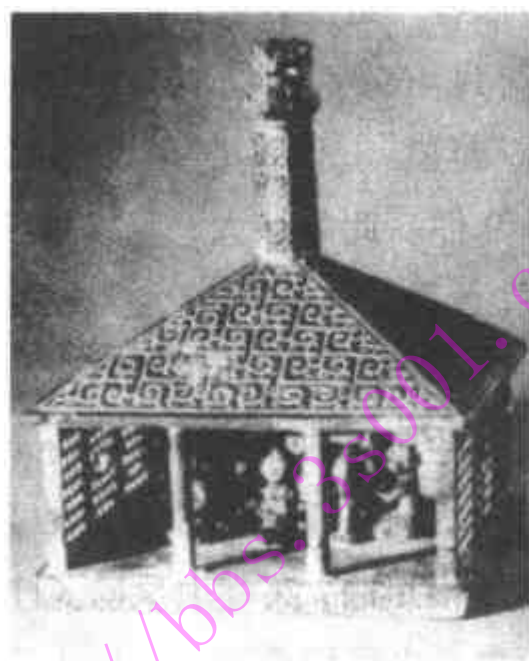
立人形器座 战国早期。1972 年出土于山西省长治县分水岭。高 13.7 厘米，均作人形。其头顶上有方形柱榫。人之造型头部较大，四肢纤细，作站立握持姿态。器身饰有点状纹。此人像的造型与当地所出的陶俑相似，面部扁平，鼻较长，脸部显得平板无神，这可能反映了当地民族的特点，也就是蒙古人种的特性。中国的青铜时代青铜装饰艺术及造型大都以神话传说为主题，而人的造型和图案显得不大成熟，远远逊色于古希腊罗马的青铜人像。其主要原因是文化的差异。这种人像造型在中国青铜时代持续时间较长，其衣着对研究古代服饰有一定的价值。现藏山西省博物馆。



云纹铜屋 战国早期。1981 年出土于浙江省绍兴县狮子山。高 17 厘米，面宽 13 厘米。屋形为三开间，屋顶有棱柱，柱上



端饰有伏鸟。柱面及屋顶面均饰有勾连形云纹。屋前面为四柱，左右壁皆为镂空，后壁中央有窗。屋底缘亦饰勾连形云纹。屋内有跪坐的6人，6人均作演奏状，有的抚瑟，有的吹笙，有的击鼓，其造型生动大方。此铜屋是一件时代较早的模器，模器盛行于汉代，但大都为陶质。该器造型设计独特，艺术想象丰富。其



房屋造型，对研究当地古代建筑有着重要的意义。屋内的音乐人俑的造型，对我们了解战国时代的音乐演奏景况亦有重要参考价值。此器出土自越墓中，其主人应为越国贵族。现藏江苏省博物馆。

中山王鼎 战国中晚期。1977年出土于河北省平山县三汲公社中山王墓西库。高51厘米，口径42厘米，最大径为65.8厘米。鼎体呈扁球形，其盖上有三环钮，使盖可却置。鼎两侧有一对大附耳，身下有三只粗矮的铁质蹄足。由于矮而粗，全器显得敦实厚重。鼎纹饰简单，仅腹



中部有一道凸弦纹，鼎盖环钮以下至鼎身足部以上刻有铭文 77 行，共 469 字。此鼎出自中山国王𫍇墓中。中山国，春秋时期也称“鲜虞”。该墓的年代约在公元前 308 年左右，墓中共出有列鼎 9 件。此鼎最大，足为铁质，有铭；余者皆为铜质足且无铭文。此鼎铭文在战国金文中是很长的，仅次于毛公鼎铭。铭文的主要内容是中山王𫍇颂扬其相邦𫍇的贤明和功绩，它记载了中山国趁燕国内乱，伐燕并夺取其疆土之事，并以燕王子哙让位于子之最终遭致国破身亡的教训告诫后人。铭文表面上颂扬中山国相邦𫍇，实际上反映了中山王对𫍇的猜忌。关于中山国的历史，史籍记载很少，中山王鼎铭对研究中山国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鼎铭字体修长秀丽，具有独特风格，对书法史及古文字学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现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鹰柱盆 战国中晚期。1977 年出土于河北省平山县三汲公社中山王墓。高 46.8 厘米，口径 60 厘米，形同一大豆。口为折沿，直壁，平底，底下有承柱，形如豆柄，柄下有圆座。器外壁四周有四鹰形铺首衔环，器体大部分为素面，仅内底中心饰有一螭，螭背负立柱，柱上有一立雕雄鹰，两爪攫蛇，傲然侧首，姿态雄健。器座上饰有镂空的蟠螭纹。此器造型奇特，其用途及名称不明，现只能暂名为盆。盆中有立柱，这十分少见，殷墟曾出上有有柱陶盆，其用途不明。像这种有



鹰柱的陶盆，在战国时代开始出现，河北平山县及河南辉县曾出土类似此器的陶盆。此器大概是仿陶器制成，这种形制的青铜盆尚属仅见，十分珍贵。现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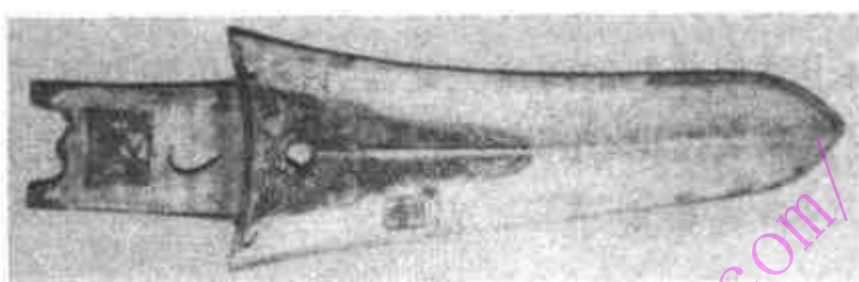
错金银虎子 战国中晚期。传世品。高13.6厘米，长22.6厘米。器身呈圜形，背上有环形把手，流较长，口浑圆，平底。其提梁上饰有几何形云纹，流口下饰有三角纹及几何形云纹。腹部饰有盘曲的云气纹，近底处饰有三角形纹。通体纹饰均错金银。



虎子出现于春秋时代，盛行于汉代，大都为陶质，青铜虎子较少见。古代虎子之用至今尚有争议，有学者认为虎子是由铜匜演变而来，故兽体形虎子应是水器，而圆体形虎子是褻器。有学者认为虎子应是水器或饮器，功能和盃相类似。但就目前所发现的资料看，凡是虎子，都是褻器（便器）。此器作工精细，纹饰艳丽。用错金银装饰褻器，这反映了当时贵族奢侈的生活。错金银虎子发现极少，仅此一例，故此器有着珍贵的文物价值。现藏故宫博物院。

兽面纹戈 战国中晚期。1980年出土于四川省新都县晒坝。长31.6厘米，宽9.4厘米。戈援呈狭三角形，中有突脊，近本处有一圆孔，无胡，上下各有一穿，内上有一穿呈水滴形，端部作山字形。援上刃面上有一巴蜀图语文字，近本处饰有云纹，

内上有一方框，内亦饰云纹。这种三角形的直内戈在商代十分流



行，巴蜀兵器里的戈器几乎完整保留了商戈的大部分特征，像是仿商戈而制。此器援上有着银白色的亮斑，这种亮斑是战国时代戈器上所常见的。戈上刃部的巴蜀图语文字是巴蜀兵器上常见的文字符号，但迄今不能解读。现藏四川省博物馆。

剑形戟 战国中晚期。拣选于河南省南阳地区。长34厘米。戟矛较长，作剑形，后部有圆銎。援下刃前部有一棘突，援后段较前段更为狭窄。胡部有双刺，内作弯钩形，下刃还有一刺。戟銎部饰有变形蟠螭纹夹垂叶纹带。此器形制奇特，前所未见。它既具有刺杀和勾啄的功能，也可以用剑刃砍杀，是一种杀伤力极强的复合兵器。可能由于戟秘较长，剑刃的砍杀功能不易发挥，故此器不能流行。这种剑形戟仅发现此一件，故十分珍贵。它为研究我国古代兵器种类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现藏河南省南阳市博物馆。



繁阳之金剑 战国中晚期。1974年出土于河南省洛阳市



凯旋路。长 45 厘米,宽 3.9 厘米,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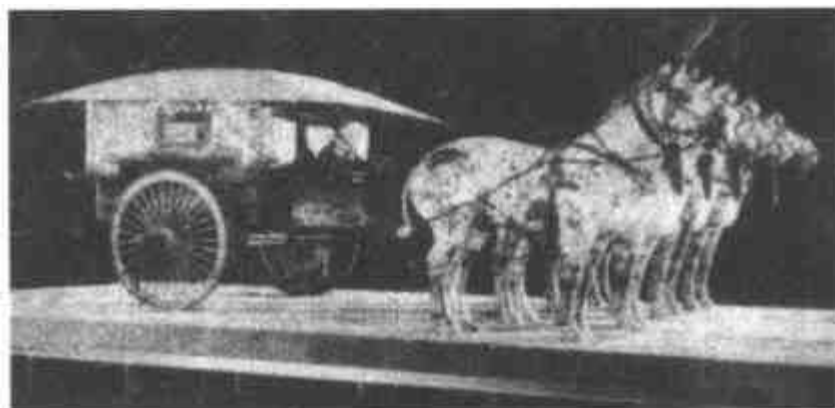
无格斜从扁茎式。扁茎侧有两枚不对称的小突,剑身正面有错红铜铭文 4 字曰:“繁阳之金”。剑系古人随身佩带用以自卫防身及进行格斗的兵器。最早的青铜剑出现在西周早期。西周的青铜剑,剑体较短。春秋晚期至战国是青铜剑最盛行的时代,这时,人们已有以佩剑来表示等级身份的意思,这种风尚一直流传到汉代。汉代出现铁剑后,青铜剑逐渐消失。此剑出土时插于象牙鞘内,装饰十分华丽。象牙鞘口饰有浮雕兽面纹,剑首原有垂饰,出土时已朽蚀,依稀可见垂饰由十二颗珍珠串成。春秋战国时,吴越所产的兵器很有名,一些名剑大多出自吴越。繁阳亦是南方著名的产铜区,在今河南新蔡县附近。繁阳所产兵器盛多,在当时大概亦是很有名的兵器产地。现藏洛阳市文物工作队。

树形灯 战国中晚期。1977 年出土于河北省平山县三汲公社中山王墓西库。高 82.9 厘米,由大小八节连接而成;每节皆有榫卯,榫口各异,移动时,便于准确拆卸和安装。整个灯像树形,其枝端有灯盘 15 个,树干上端饰有一盘绕螭龙,树枝上有群猴戏游,金乌啼鸣。群猴神态各异,最为生动者为



两猴引臂悬空，接取树下二身着短裳、上身裸露的男子抛予的食物。树本承以圆座，座上饰有镂空蟠螭纹。座下有三虎形足，虎口衔有六环可用以穿索。此灯装饰生动，猴鸟造型优美，令人喜爱，以树枝为灯体，猴鸟螭龙为装饰，其艺术想象可谓绝矣。过去一般认为青铜灯具在汉代才发展起来，由此可知其不然。此为中山王室用器，它是青铜灯具类中之精品。现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铜车马 秦代。1980年出土于陕西临潼秦始皇陵。高106.2厘米，长317厘米，车为双轮单辕，驾有四马。舆前部有御者跪坐，戴冠束带，腰有佩剑，后执辔索。御者身后为车箱，车箱后部有门，车箱前部及左右方各有一窗。舆底有方板，像车茵。车顶的车盖呈椭圆形，车内外均有彩绘，主要纹饰为云气纹、夔纹及几何形纹。御者的面部、双手及衣冠上也有彩绘，四马通体涂成白色，车马上还有一些朱书或刻写的文字。始皇陵共出土有两乘车马，其形制略有不同，此为二号车马。学者们研究后认为，此系安车，车马拟实物制成，其比例约为2:1。该车马是由许多部件组合而成，制作十分精细，其马具有许多金银质饰器，车上也有一些银质部件。各部件及饰件铸造精细美观，组合十分精确。这组车马不仅是一件卓绝的艺术品，它对研究古代车制更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现



藏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人面纹羊角钮钟 西汉，1976年出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县罗泊湾。高19厘米，作半橄榄形，顶上有羊角形钮，钮下有长条形镂孔，钟面饰有人面纹。此器形制奇特，造型与中原青铜钟器完全不同，它可能是边地少数民族的作品。广西的青铜文化是在中原文化的影响



147

下发展起来的。西周中期到战国，广西出现了一种含有中原文化、楚滇文化因素的土著文化。两汉时期，广西地方青铜文化仍很突出，此器造型自成风格，其面纹饰可能是受吴越文化的影响。江苏丹徒谏壁镇出土的春秋晚期吴国罍于上有人面纹与此大同小异。现藏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

曲管笙 西汉。1972年出土于云南省江川县李家山。高28.2厘米。其上段为曲管，顶端焊有一圆雕立中，下段为瓠瓜形状。正面上端有一孔，下端有五孔。笙之插管已朽，但由管内填满的汁汁上可知其原状。李家山共出土2件这样的曲管笙，此为其中1件。笙是我国先秦时



期的八大乐器之一，后盛行于我国南方少数民族中。古人对匏笙的形状有作具体的记载（如《新唐书·南蛮传》）。唐代以后，这种以匏安装若干竹管制成的乐器在我国西南古代民族中极为流行。在滇文化遗址出土的青铜器装饰图案中，发现有许多吹曲管笙的形象。此器装饰极有地方特色，笙顶端的圆雕立牛与滇文化其他青铜器上的雕牛形象完全相同，这是滇人喜爱的装饰图案。这种曲管笙目前只发现于滇文化中，大概是滇人独有的乐器。现藏云南省博物馆。

人形吊灯 东汉。1974年征集于湖南省长沙市。高29厘米，长28厘米。灯为吊灯，有挂链。粗大的主挂链连于半球形盖上，盖缘下又有三分链接在一铜人的两肩和臀部，铜人昂首前视，手托灯盘，身足向后平伸。铜人神态安详，作飞翔状，但身上并无羽翼，其造型与佛教传说中的飞天



形象有别。两汉时，神仙思想风行于世，羽人造型较为普遍。此灯铜人虽作飞翔状，但不似羽人，这种造型是否是以一定的神话传说为背景，还待研究。两汉发现的铜座灯较多，吊灯相对较少。因此，此灯在汉灯中尤为珍贵。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龙虎尊 商代后期。1957年出土于安徽省阜南县朱砦河。高50.5厘米，口径45厘米，为大口广肩式。上口侈大，口径



超过肩的直径,肩部凸起,折肩,腹下内收,高圈足。其颈部饰有三道弦纹。肩部饰有三组龙纹,龙体为半浮雕,龙首为立雕,作探出下视状。器腹有三道扉棱,其间分别有三组虎噬人纹。虎身与人为半浮雕,虎首为立雕,虎作一头双身状,圈足上饰有三个十字形镂孔,镂孔下为饕餮纹带。此器形制当为典型商代后期式样,其纹饰颇有创新。



149

肩部的龙首系用分铸法制成,它代替了常见的牺首。龙纹和一头双身的虎食人纹饰极富想象力和艺术概括力,加之采用浮雕与立雕相结合的装饰方法,成功地将立雕、浮雕及刻雕融为一体,起到非常完美的装饰效果。该尊腹部的扉棱亦很独特,它时断时续呈若干小钩状,制作十分精细。此器制作时代当为殷墟早期。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妇好鸛尊 又名妇好鸛尊。商代后期。1976年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殷墟妇好墓。高5.9厘米。形体似鸟。其鸟首微昂,颈部夸张,有兽形角状,卷喙较粗大,挺胸敛翅,双足极粗壮,尾下垂为支点。鸟首后部有半圆形口,口盖上饰有立鸟及龙形钮。背部有饕餮,饰有兽首。鸛鸟面至胸,有一道扉棱。



整个鸛鸟尊呈鸛鸟挺胸站立，睥睨一切的姿态。鸛鸟的头角上饰倒夔纹，喙及胸饰蝉纹，颈部饰夔纹。翅前端作蟠蛇形，后半羽上饰云纹。背部鑿与尾间作张翼的鸛鸟形。鸛鸟是鹰雕一类凶猛的鸟。此器以兽角卷喙及各种纹饰表现出鸛鸟威猛神态的同时，又以夸张的手法赋以它敦圆的头躯，使之又具有一种温驯的憨厚顽皮之态。器口下壁有“妇好”铭文。新石器时代晚期已有鸟形陶尊，如：陕西华县仰韶文化鸛尊，以爪、尾为器的三足，此器正好与之相似。故青铜鸟尊的形制大概是源于新石器文化的陶鸟尊。妇好墓所出土的鸛尊共两件成对，可能皆用于祭祀。此尊口小无流，恐非实用酒器。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琯生簋 西周晚期。相传出土于陕西省。高 22.2 厘米，口径 21.9 厘米。浅腹双耳高圈足式。无盖，侈口浅腹，腹壁上部较直，下部圜收，底部近平。圈足高于器体。双耳较粗，上饰凤首。耳下原有较长的垂珥，现已残。器腹部、圈足均饰有饕餮纹，中间有扉棱。器内底有铭文，共 11 行 103 字。琯生簋共有一对，二者形制花纹相同，铭文不同。一器为铭文上半篇，一器为下半篇，二者相连为一整篇。根据其铭文内容，我们一般把二器分别称为五年琯生簋，六年琯生簋。此器为五年琯生簋，其铭文上半篇、珥已残。六年琯生簋保存完好，现藏美国耶鲁大学博物馆。《商周彝器通考》著录有六年琯生簋，其上铭文为 11 行 104 字。整篇琯生簋铭记载了作器者琯生



要求改变税收,得到西周执政官员批准认可的事。西周时期,土地为国有,授田者必须付税。如要改变其授田及税收时,必须经高级执政官批准。西周金文中记载这类事者较多。铭文中的召伯虎,大概是周宣王时的名臣召穆公。故此器应为周宣王时代所作。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虢季子白盘 西周晚期。相传清末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虢川司。高 41.3 厘米,口长 130.2 厘米,口宽 82.7 厘米。直口鼓腹长方



体式。盘口呈长方形,圆角。深腹下敛,平底,四曲尺形足。四壁各有二兽首耳,衔环。口沿下饰有窃曲纹,腹部饰有环带纹。其内底有铭文 8 行 111 字。铭文大意是:在十二年正月,虢国的子白奉命征伐玁狁于洛水之阳。折首、执讯(斩获敌人的首级,抓获战俘),立下战功。周王褒奖子白,在周庙的宣榭里,举行了献俘、饮至之礼,庆贺战功,并赏赐给了白以乘马及弓、矢、旂,使他可以专任征伐蛮方。虢季子白因作此盘以为纪念。铭文中的许多语句与《诗经》的《采薇》、《出车》、《六月》、《采芣》语句相似;其史实也与之互相印证。关于其铸作时代,学术界还有争议,一般认为此器是作于周宣王十二年(前 816)。郭沫若先生认为是作于周夷王十二年。此盘形制巨大,是迄今所见最大的盘,其用途当为盛水或盛冰,沐浴时作为澡盆使用。其盘铭所记载的史实是研究西周晚期周王室与北方民族的关系以及西北地理的重



要史料。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上述所用图文引自漓江出版社《中国文物鉴赏辞典》)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中国青铜器概览

作者=

页数= 1 5 2

S S 号= 0

出版日期=

顶级地质论坛: <http://bbs.3s001.com/>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题记
引言

- 一 楚庄王问鼎中原
 - 二 风胡子讲述中国青铜器的起源
 - 三 中国伟大而辉煌的青铜时代
 - 四 青铜冶炼的曙光
 - 五 炉火纯青的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
 - 六 青铜器的发展阶段
 - 七 林林总总、异彩纷呈的青铜器
 - 八 星罗棋布、百花齐放的青铜文明
 - 九 文物鉴赏（附精美图片）
- 附录页

顶级地质论坛: <http://bbs.3s001.com/>